



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

高 岗 文 选

薛俊富 安明文 编辑

甲子岁的光阴弹指一挥间；
60 年的历史厚重而绵长！

在举国同庆共和国 60 华诞的时候，收录开国元勋、首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同志的重要报告、讲话等著作为主要内容的《高岗文选》终于与世人见面了！

文选出版，是对开国元勋的深切缅怀；是对人民领袖的热情讴歌。打开文选，仿佛是翻阅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前后厚厚的史帙，字里行间无不反映着曾经迎接中央红军“回家”，又描绘出中国经济建设蓝图，而至今仍然深驻人心文选主人的丰功伟绩；翻开文选，扑面而来的 60 年前就提出而至今仍多用与适用的词汇，一下就能感到毛泽东的主要观点贯穿其中和《毛主席语录》的影子随处可见。由此，时代变迁的风云跌宕、人民大众的心灵历史，就会撞入脑海；开国元勋的高大形象和他的背影足迹，就会历历浮现在眼前……。

阅读文选：是一次震撼心魄的回顾，是一次净化心灵的洗礼；能感受到平民领袖的崇高，能重温到耳熟能详的“信条”。

阅读文选：能想象到一个古老国度从“东亚病夫”到“少年中国”搭起“框架”的维艰与里程，能体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和巨变……。

编者

高岗同志对中央红军和抗战斗争立了大功，这种功劳与我党我们军队的历史所共有。在座的同志不要忘记了他的好处啊！不管是谁，只要对革命作过贡献，我们就永远记着他。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在边区党代会上演讲）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词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

各位参议员，各位政府委员，各位来宾：

今天是第二届参议会开幕典礼，我首先向各位参议员和政府委员表示诚恳的慰问，同时对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这一次参议会准备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慰劳。

这个参议会与上届参议会有很大的不同。时间已经有两年多了，在这两年当中，不管在国际上，不管在中国，不管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各方面都和过去不同了。

在国际上正是德意日法西斯结合起来向全人类进攻，企图毁灭全人类，企图把全世界变成黑暗的世界。在这两年当中，德意法西斯已经灭了西欧十四个以上的国家，两万万以上的人民，已经在他们的铁蹄下当了牛马。到今年六月二十日，德意法西斯又发动了进攻和平的苏联的侵略战争，现在正企图想把莫斯科列宁格勒打下来；另一方面苏联美国 and 英国团结得成为一个反法西斯的阵线，特别是全世界的人民都热烈的拥护苏联。许多被压迫的民族是站在民主国方面反对法西斯，最近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也是表示这一点。现在是处在人类存亡成败的关头，这一个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希特勒拿了两万五千辆坦克，二百万机械化师团，以及全部四分之三的飞机向着苏联进攻。正如希特勒所说的：“这一次战争，是空前的，也是最残酷的一次战争。”但是英勇的苏联红军，勇敢的苏联人民，他们为了全人类的和平，为了反对全人类的敌人法西斯，英勇的在那儿作战。他们有战胜德意法西斯的决心和信心，同时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结合成为一个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许多被压迫的民族也

非常需要这一个统一战线。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应该巩固扩大这一统一战线。打倒法西斯，是我们的任务，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在中国方面，我们看一看：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今天已经五个年头了，但是他并没有把他所谓“中国事件”解决，我们倒是把日本帝国主义的腿拉住了。日本内阁一次又一次的倒台，最近近衞内阁又倒台了，组织了军人的东条内阁，这一次的内阁更积极的准备扩大战争，参加世界的掠夺，但在今天它究竟是南进呢？还是北进呢？南进呢？“中国事件”还没有解决，它惧怕中英美澳联合起来包围它。北进呢？西伯利亚远东苏联还有强大的红军，另一方面西伯利亚很冷，现在的西伯利亚，倘若人们不注意，把鼻子都会冻掉的。俄日战争时，日本为此吃了很大的亏，所以它要南进、北进，都得考虑一下。行得通，行不通，它要考虑打得了胜仗、打不了胜仗。所以南进北进都有可能，但都有所顾虑。

自东条组织内阁以后，表现了更进一步的侵略中国，长沙、郑州、宜昌等地的战役，以及最近的黄河边上六七千军队天天在军渡、碛口、宋家川、丁家坪、禹门口等地方炮击，天天在答答的放机关枪，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紧其侵略了，它想迅速解决他们所谓“中国事件”。它的主要目的是把西南搞一下，把滇缅路的国际路线切断，同时它也想把西安搞下来，把通苏联的国际路线也割断，企图把中国与英美苏的交通割断，使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发生关系，把中国装在一个布口袋里面，没有人援助，使中国孤立起来。在这种压力之下逼迫中国投降，因为在那个时候，它可以说，苏联帮你不上，英美也帮你不上，你不投降？这是日本法西斯的企图，它企图把它的泥脚从中国拔出去，参加其他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全中国更加团结，我们的抗战就是由于中国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各个民族的团结，所以才能够有坚持五年的今天。因此在今天我们的任务还就在于全国团结一致，坚决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以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

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全国的人民，进步的人士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最近有民主同盟组织的发起是完全必须的。只有在中国大大的发扬民主，才能发挥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力量，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决的主张中国的民主，我们和全国人民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讲到边区，我们先说一说边区这两年来所处的环境。大家都知道，我们边区是西北国防的最前线，我们边区也是一个民主进步的地区，在西北有广大的蒙古民族，民族和广大的汉人同住杂处，在这一个地区里，过去我们的为政治是民主的，对友党友军蒙回族一般的说也是团结的；但在另一方面，当着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更加紧急的时候，在

抗日的堡垒里面还不免有少数亲日分子的活动，他们企图在边区，在全中国，那里都要钱一攒，打一打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造谣、挑拨，打算把团结阵线搞垮，使日本帝国主义可以趁机侵入西北，侵入西南。这样的事情当然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边区该伸出手和西北所有的党派，所有的军队，所有的民众，所有的民族团结得像铁一样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自己里面，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这是最愚笨的最有害的办法，是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办法，也是我们边区所坚决反对的办法。今天最好的办法是更加把民主巩固扩大，更加把民放提高一步，把西北的抗日阵线更加巩固起来，这样我们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就更有力量。这两年多以来的世界和边区有这样的变动，我们所处的形势就是这样。

诸位参议员先生：我们要看到这个战争，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结束的，这个战争是长期的，因此我们以后就要讨论如何能够坚持抗战到底，储蓄力量打退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在困难中，今后还要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的。

其次，我还要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届参议会应该做些什么事？首先是要检讨政府工作。固然在两年多以来，边区政府会进行了不少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不是就满足了我们的愿望，是不是我们拿这点成绩，就很容易的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诸位参议员先生，这是决不能够这样估计的。要知道我们政府工作仍然有许多缺点，需要我们各位参议员指出来，批评、指责。我们民主的政府，是不怕人批评的，因此我们要把缺点错误一点一点的指出来，使政府以后能够改正和避免这些毛病。第二，这届参议会是要确定我们今后的大政方针，我们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团结西北人民，积聚我们的力量，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当前要着手的工作，就是更加提高民主政治，发展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军事建设，把这些工作质量提得更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物质的保障，这就是我们这届参议会所要确定的大政方针。第三，在确定大政方针以后，要什么人来做，谁能做得更好，这就是必须要这届参议会上产生更好的更健全的更有威信政府机关，也就是要改选政府，这个政府不是那一党包办，更不是独裁，所有边区各个抗日党派、各个阶级、各个民族都有参加这个政府的权利，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团结全边区二百万民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最后，希望各位参议员先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一切意见说出来，使以往的错误能够改正，使政府今后工作有明确的方针，有健全的领导机关，把边区这块地方提得更高，团结得更好。这样才能够保卫西北，打退日本法西斯、求得最后的胜利（大鼓掌）。

关于五一施政纲领的解释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边区参议会上)

各位参议员：

现在我代表中共西北中央局向本届参议会提议，请大家采取本中央局在今年五月一日所发布的二十一条纲领为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我不准备把它逐条解释，因为从发布的时候到现在已有半年多，各位参议员对它的内容已很熟悉，同时国内外各处对它都表示了很大的注意。我准备讲到下面几个主要问题，也就是对于这个纲领颁布后各界人士提出的一些意见和问题加以解答。

首先，我要说为什么我们提出这个施政纲领，它的基本精神在什么地方？它的基本精神说来很简单，只有七个字，就是“团结，抗战，救中国。”我们看一看中国近数十年的历史上给我们的教训，在国家民族危难时，要是全国各党派、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团结得好就有出路，如果分裂就没有出路。我们看，当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全国团结，所得到的是北伐胜利，就有力量摧毁北洋军阀的统治，收复过武汉九江的租界。而团结破裂的时候呢？所得到的是东北四省被日本帝国主义拿去，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化基础的建立，以至日本这一次进攻中国，使我们民族遭受了千古未有的磨难！我敢说，假如我们全国在当时一直团结下去，有很强大的力量，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所幸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我们全国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又能团结起来，以此坚持了五年的抗战，从新奠定了民族解放的基础。由此可见，团结和分裂，利害是很分明的！所以我们的施政纲领开头就主张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个纲领是经过我党二十多年的斗争经验，探讨总结而制定的。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至今还是半封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国家里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是屈指可数，无产阶级也不过是几百万；但是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其中的绝大多数乃是农民和中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既不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某一阶级某一党派的独裁，而是实行真正的民主，大家来赶跑日本，大家来治理国家。同时由于中国长期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和统治，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等许多条件，又决定了中国的革命是长期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是一两天就可以赶出去的，全国民主化的实现，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正因为这样，就需要全中国的人民长期的团结，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是共产党从二十年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无论什么人物，要想违反这个结论来办事，都一定是行不通的。我们共产党一定要坚持这个方针，无论什么阻碍，什么波折，都不能使我们动摇的。

有些人说，施政纲领好虽好，怕只是口头上宣传号召的东西吧。我可以代表中共西北中央局郑重宣布，我们共产党不但要宣传这个纲领，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坚决贯彻这个纲领。我们共产党一向最反对的就是言不履言，行不履言。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保证这个施政纲领的实现呢？我以为要保证这个纲领的实现，首先就要保证政权三三制。谁都知道，一切实际政治的中心问题，就是政权的问题。我们要彻底的实现团结抗战，要真正的实现施政纲领，就要作到政权三三制，要大家都来参加政权，而不是一部分人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三三制政权，就是在政权机关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士占三分之二。共产党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显然绝不是请非党人士来装门面，而是真正的要共产党外的人士有实际作事的权力。中国是这样大，这样复杂的国家，有这样多的人口，共产党员才有五十万，共产党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包办的。全国的人才多的很，不让他们进来实际管理政权是要不得的，共产党绝不这样做。谁要是这样做了，谁要是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了，谁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三三制规定共产党占三分之一，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这是不是在法律上的规定呢？不是的。如果共产党做事不好，在选举时，老百姓可能不选一个共产党员，反过来说，老百姓也可能选很多的共产党员。不过如果共产党员当选过多，党可以决定党员退出，让出位置给其他党派或无党无派的人士。

今后政权三三制究竟怎样作事呢？共产党的斗争批评，党外的人士搞不惯，那么应该怎样呢？我们说，大家办事，大家负责任，大家都各有自己的意见，也可能发生争执，因为党派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习惯不同，自然会各有不同的主张。那就要有意见大家共同讨论，共同商量。假使有意见闷在心里不讲出来，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所以党外人士要敢于提问题，敢于讨论、辩论，而共产党员则应该虚心倾听旁人的意见，竭力注意不要乱用党内的工作方式来对待旁人，使旁人感到拘束。只要是为了抗战，为了民主，为了边区的进步，在这样的总的原则下，我相信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不管是个人生活方面，政治方面，或者其他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为要保证实现施政纲领，还要保证各级参议会确实成为一个有力的机关而不是请客吃饭的摆设。它是超乎政府之上的机关，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解之权。比如有的参议员讲某些区县的工作人员作风不好，强迫命令，不民主，把持包办，耍私情，这样不称职的人，参议会可以罢免他。参议会还有检查督促政府的权利。检查政府对参议会的决议案是不是执行了，执行的程度怎么样。参议会的一切决议，政府必须完完全全的实行。现在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里面，不管是共

共产党的也好，国民党的也好，其他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也好，有没有缺点呢？诚然，如各位参议员在昨天的质问当中所讲的，缺点错误是有的。我今天代表共产党来向大家声明，假使各级政府机关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有疏忽职守违犯法令的，不仅可由各级参议会弹劾罢免，不仅可以由高级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惩办处分，而且大家还可以向共产党的各级地方党部告发，还可以直接向西北局乃至共产党中央告发，由党给以党纪的制裁。因为施政纲领是共产党提出的，如果共产党不遵守，还教谁来遵守？所以那些贪污、腐化、不称职、耍私情的共产党员，应该受党纪和法纪的双重制裁。

在这次参议会上，各位参议员已经提出政府检查工作不够，对各种干部的了解不清楚，因此形成上下不通的现象，并且提出了各种检查工作的制度办法，这都是很好的，可以作为我们检查工作的根据。这个问题林主席已经讲过了。

为要保证实施行政纲领，还要各方面合作。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保留着“关门主义”的恶习，不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这是我们必须负责努力纠正的。但是这种毛病可能一下还不易完全克服，还希望各抗日党派，各阶层的人士大家来多多的批评，帮助这部分党员的转变，指出我们一切不好的地方。只有大家推诚合作，共同努力奋斗，互相检查、督促，施政纲领才能完全实现。

最后，我讲几个具体的问题：

关于土地的问题。没有分配的怎么办？我们党主张没有分配的土地谁的就是谁的，一方面交租交息，一方面减租减息。早已分配过的土地也是不动，维持现状。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对双方有利的办法。

关于负担的问题，如果因为过去是富农，今天就要他负担重些，这是要不得的。我们主张除了极少数最贫苦的人民不负担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都要负担，钱多的多出，钱少的少出，使负担合理公平。如有耍私情不公平的事情，大家应该揭发纠正。

还有一个问题，非共产党的人士到政府工作时待遇的问题。有人问，像共产党员一样一月三五块钱津贴，怎样能够养家呢？到政府工作，还能不能请假回去，能不能有交际的余暇呢？我们主张政府工作人员采取薪水制度，保证他和他的家庭的生活能够维持。至于其他一切私生活上的自由，只要不十分妨碍政府的工作，政府都一概不加以干涉。

总之，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就是要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打日本，一切问题，都以团结的利害为依据。整个施政纲领的立场，就是要加紧团结。我现在正式向大家提出这个加紧团结的纲领，请全体参议员讨论，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作为全边区政府与人民共同奋斗的方针。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闭幕词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各位参议员，各位来宾，各位政府长官：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经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于今天胜利的闭幕了。

在这次会议期间，各位参议员，各位政府长官，各位来宾，以及全体工作人员，都是不惧寒冷，不怕疲倦，有时还忍着饥饿，为国为民，克己奉公，从事于国家大事之商讨，此种精神，是我们这次参议会成功的基础，也是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能够精诚团结的证明，更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力保证。因此，当大会闭幕之际，我代表全边区人民，向各位参议员，各位政府长官，表示崇高的敬意，对各位来宾表示诚挚的感谢。对参加此次大会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热烈的慰问。

我们这一次参议会是开成功了，历史和人民交给这次参议会的任务，我们都已顺利的圆满的解决了。

我们这次参议会的第一个成功，就是以全体一致热烈的精神，通过了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的五一施政纲领，做为今后边区施政的方针，这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第一，这是证明共产党所提出的施政纲领，既不是口是心非，也不是一党营私，更不是上宽下紧，言行不一，恰恰相反，正是要坚决见诸实行的，为国家为民族，大公无私的纲领，也是继承与发扬孙中山先生四十年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三民主义的精神。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这次参议会就不会如此热烈的讨论与通过这个纲领，并把它做为我全边区人民一致奋斗的目标。因此，对这个纲领一切恶意的嘲笑曲解造谣中伤，就都是没有根据的了。第二：这是证明了这个纲领的确是代表了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的利益，也就是说，是代表了全民族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才能为全体人民所一致拥护。并证明只有实行这一纲领，才能保证团结，坚持抗战，战胜日寇，挽救我中华民族。第三：有了这个纲领，我们边区今后的进步发达与提高，就有了确定的指针，就有了基本的保证。因为在这个纲领的实行之下，边区人民将更加团结，民主政治将更加完备，经济建设将更加发展，文化教育将更加提高，而所有这些，就要使边区抗战力量将无限的提高。第四：这个纲领如果在边区能够适用，能够把边区真正创造为坚固不拔的抗日民主堡垒，那么，他在全国范围内也应当是可以适用的。没有任何理由把边区与全国分开，在落后的边区能够做好的事情，我相信在全国更是能够做好的。因此，我们应号召全国上下来研究讨论和实行我们边区的施政纲领；我们应以边区实行这个纲领的实际榜样来影响来推动全国。因之，边区施政纲领是有全国意义的。

这次参议会第二个成功就是我们全体参议员团结一致的合作精神。大家都晓得，我们这次参议会的议员，以党派来说：有国民党员，有共产党员，有救国会派，有清洪帮人士，有无党无派人士。以阶层来说：有地主，有农民，有工人，有商人，有学生，有兵士，有海外华侨。以民族来说：有蒙古人，有回民，有印度朝鲜等国际友邦人士。以信仰来说：有共产主义者，有三民主义者，有天主教徒，有回教徒，有佛教徒等。以性别年龄说：有男人，也有女人，有青年，也有老年。然而，不管我们在党派、阶级、民族、信仰、性别、年龄等关系上是多么多么不同，而我们为抗战，为团结，为民主，为进步的精神，是始终一致的。这里具体的实现了蒋委员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与“精诚团结”的号召。实现了中共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政策，也充分地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与团结。只有这种团结，才是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所最惧怕的，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与解放的大道，才是我们施政纲领实行的基本保证。

这次参议会的第三个成功，就是我们大大的发扬了民主，具体的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这种民主的发扬，不仅是表现在边区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各个民族以及具有各种不同信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们，都有自己选出的代表来参加参议会，这具体的实现了中共所提出的三三制政权。而且也表现在我们这次参议会上，以无拘束，无成见，无强制，无私情的精神，批评了政府的工作，指出了政府许多的缺点，这就是大会上热烈的质问。这是最明白的说明了边区政权是属于人民的，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说出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意之处，而政府只有纠正缺点的义务，没有包庇缺点的权利。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说出对政府的希望，而政府只有义务实现人民的希望，没有权利拒绝人民的希望。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选出自己信任的人为政府行政人员，罢免自己所不信任的行政人员，而政府只有尊重与实行民意的义务，没有把持包办政权与庇护渎职犯法人员的权利。这就是我们边区民主政治的实质，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求之四十年，而未能实现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最近民主政团同盟及全国有识人士所要求的民主政体。没有这种民主，就不能保证团结，而没有团结，就不能坚持抗战与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这已是人人明白的真理了。因此，我们希望能将边区这种民主精神，推广到全国去，也希望全国人士以团结一致的精神，来争取民主政治在全国的实现。

这次参议会第四个成功就是通过了四百余件具体的提案，这些提案关联到边区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社会、民运，所有内外诸政策之具体的部分，是代表了边区全体人民对边区施政的要求与呼声。这就是说，我们这次参议会，不仅通过了作为基本施政方针的五一施政纲领，而且通过了实施这个纲领的各个具体方

面的具体办法，作为政府会后施政的根据与准绳，我们要求新的政府一定要好好切实的实行这些议案，希望新的参议会常驻委员要好好切实的督促与帮助政府来实行这些议案。当然，我们也相信新的政府和参议会新的常驻委员是能够忠实于他们的职务而努力实行这些议案的。

这次参议会第五个成功，就是产生了新的有力的边区最高行政机关，改选了边区政府。这次边区政府的改选，大家都已看到是完全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其中没有丝毫包办或限制。而选出的政府委员，有国民党员，有共产党员，有救国会派，有少数民族，有地主，有农民。在十八个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六个，九个常驻委员，共产党员只有三个，这就是说，边区政权已从下而上的实行了三三制。而这样的政权，我们相信是能够代表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的利益，为边区之进步，为全国之团结，为抗战之胜利而奋斗不息的。

我觉得以上五点是我们这次参议会最大的成功之处，至其他细小的地方，我就不说了。然而，能不能说，我们这次参议会没有任何的缺点而一切都是满意的呢？不，还不能够这样说，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关系，还给了我们若干以下不能避免的缺点。

首先，这次参议会进行的过程中，表现出在民主的修养与民主的作风上，还有不够的地方。由于我们中国是缺少民主传统和生活的国家，所以大家对于民主的运用还不习惯，还不熟练，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这就使得这次参议会的工作进行会有一些零乱之处，会有一些不充足的地方。希望我们全体参议员同仁以后在这一方面多加注意，多加研究，多加学习，使我们每一个参议员都真能成为更健全的人民代表。

其次，由于我们对民主作风的修养不够所以也就在某些方面多少影响到我们更进一步的商讨问题，更进一步的互相争辩，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谅解，来发扬团结合作的精神。造成这个缺点的原因，应当说主要的是由于我们某些共产党员中的关门主义残余，因为不可讳言的过去在政府机关中，共产党员会占多数，他们大都习惯了过去的一套做法，而不善于在新的情况下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因此，我们要求在政权机关中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依照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参议会所讲的话：“共产党员只有义务在政权机关中与党外人士合作，没有权利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来彻底转变过去的作风，来诚心诚意的与一切党外人士合作，同时也希望一切党外人士不论用何种方式来批评与督促政权机关中的每一个共产党员，甚至向党的领导机关控告他们，以求得在三三制的政权中，达到真正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民族不分信仰诚恳密切的合作。

再次，由于缺乏经验，在这次参议会的一切技术事务工作方面，无论是关于会场的主持、议员的招待，以及内外各种关系都是表现了许多缺乏。因此，也影响到各位议员的生活与大会更有组织更有计划的进行。我希望以后的参议会能吸收这次大会的经验，能更有准备，更有计划，更有组织的进行以达完善的地步。如果我们要把本次参议会的工作做一结束，以我看来，大体上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的第二届参议会闭幕了，我们在本届参议会所讨论的一切，都还是我们所要达到的，而不是我们所已经达到的。要把我们的希望变成了现实，还必须我们全边区人民，首先是我们二百余参议员同仁和所有政府机关的行政人员，把此次参议会的精神与决议贯彻到全边区每个角落，每个部门和每件具体的小事情上去，为实现本届参议会所通过的“边区五一施政纲领”而不屈不挠的奋斗下去。我们的条件是艰苦的，困难的，而我们的敌人还时时在准备着向我们进攻，只有更高度的发扬边区民主团结的精神，集中边区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到抗战的需要上，并和西北及全国各党派各友军各阶层各民族加强团结，我们才能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正像蒋委员长在这次国民参议会闭幕词中所讲的：“敌人要中国灭绝，我们一定要使中国永生，敌人要太平洋成为黑暗的地狱，我们要使太平洋成为光明的火炬。为了替民族报仇，替国家雪耻，为了民族的生存，历史的荣誉，为了世界的福利，人类的自由，我们不辞一切苦斗。”

让我们高举抗战、团结、民主、进步的鲜明旗帜，向前迈进，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被我们打倒，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最后胜利万岁！[NextPage]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闭幕宣言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全国同胞们：全边区父老兄弟姊妹们！

今天的世界，民主和法西斯两大营区的决斗，是更加分明和剧烈了。一方面是德意法西斯匪帮在欧洲灭亡了十四个国家，现在正疯狂地进攻民主和平的苏联；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进攻了中国五年，现在又企图在远东更加扩大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自由的国家民族，已经团结起来，结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心协力地制裁国际法西斯匪帮。全世界已经站在光明与黑暗的交叉点上。我们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前卫，是挺立在反法西斯最前线的民族，在今天，日本强盗正在我国南北战场上和一切抗日根据地，用更大的兵力，进行新的进攻和毒辣的“扫荡”，我们只有全国更加团结，才能发挥更大的抗战力量。只有民主才是巩固团结的武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就是在这样总的目的和精神之下来进行的。

我们这第二届参议会的召开正在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宣布陕甘宁边区五一施政纲领以后，是在认真实行三三制的原则下进行的。被邀到本届参议会的议员，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工农的代表，有地主绅商的代表，有回蒙少数民族的代表，并有住居边区的东方民族的代表（日、韩、荷印人士均有），他集合了全边区二百万人民的优秀代表，精诚团结的聚于一堂，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大会在听取边区政府三年来的工作报告，并详细加以检讨之后，一致认为边区政府在这三年期间，是忠实执行第一届参议会所指示的三民主义方针，不但克服了一再笼罩着边区周围的危机，渡过了重重的难关，并且发展了边区的抗日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增进了边区人民的福利，坚持了团结抗战，坚决保卫了边区，保卫了西北。但是应该看到：目前边区东面日寇军队无时不在企图渡河进犯，而边区侧后，又遭受反共势力的包围封锁，必须更进一步去提高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才能巩固边区内部，与促进全国团结抗战。

这次参议会最大的成就，第一是全体一致的接受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所提出的“五一施政纲领”。认为这个纲领，不但完全适合于边区的需要，而且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国情，是唯一正确的边区施政方针，也是团结、抗战以救中国的良策。大会号召我全边区二百万人民紧紧的团结在政府的周围，共同加紧努力，把它加以全部实现。

第二个伟大的成就是依据“五一施政纲领”的原则，又通过了许多有利团结抗战的决议和条例。其中最主要的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确定：边区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并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保障边区一切抗日人民的私有财产及依法使用自由权。在土地已经分配的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的区域，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确定凡居住在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有“确定税收原则案”，指出抗日经费应由全体人民负担，不分地主、佃农、自耕农、或雇主、工人，除极贫者外，均应按照现有的财产等等，或所得多寡，缴纳统一累进税，并确定负担人口，应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些决议和条例的主要内容，大部分都是过去边区已经实行了的，而在这次参议会上，更加使之发展和完备，保障了边区广大民众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利，同时也增强边区内部各阶层的团结。

第三个伟大的成就，是大会详细查了边区政府三年来的财政收支，讨论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的民国三十一年度总概算书，责成政府实行精兵简政，本开源节流原则，加强生产，发展经济，厉行节约，避免浪费，推广土产出口，争取出入口之平衡，平抑物价调剂市场，提高边币，巩固金融，并须经常检讨工作，确实执行计划，以期达到收支平衡，不超出预算。

第四个伟大的成就是改了边区政府并选出了本届参议会的常驻委员会，在十八个政府委员当中，和九个常驻委员当中，共产党员都只有三分之一，真正符合于“三三制”的原则，这是保证全体抗日人民坚固团结最好的组织形式，也是上述一切政策和决议能彻底执行的最大保证。参议会常驻委员会，有经常督促检查和帮助政府工作的责任和权力。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不是单纯咨询和建议的机关，它不仅仅有创制权和复决权，而且有选举和罢免行政长官的权力，它真是边区人民自己的最高权力机关。

以上就是我们这第二届参议会的特色，也是它伟大的收获和成就，这是新民主主义伟大的胜利，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边区的具体实施，我们将坚决的遵依着大会指定的方向，保卫边区，提高边区，为建立抗日民主的模范根据地而奋斗到底！

我们很高兴，在大会闭幕的今天，恰逢国民参议会开会，我们仅代表边区二百万民众，敬祝国民参议会这次会议的成功，使全国民主团结抗战力量，更加发扬，并愿在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下与全国同胞亲密团结，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共同努力。

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廿五周年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

苏联一区，终于挡住了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希特勒及其欧洲匪帮的疯狂进攻，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终于使纳粹的战略进攻归于破产，认定了同盟国转变主动的局面。为什么苏联能替全人类完成这样伟大的任务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因为苏联有一个布尔塞维克党，斯大林领导的一元化的联共党。

在保卫苏联的战争中，全苏联的人民都在联共党的领导之下无分前方和后方，士兵和工人，老人与小孩，像一个人一样的和法西斯德国搏斗着。这次斯城战役中，斯城的人民最好的表现了布尔塞维克这样优良的品质，创造了人类新的英雄主义精神。这样坚强团结，步调一致，就是苏联能够战胜纳粹的最基本的条件。别的国家没有这个条件，就吃了纳粹的大亏。

今天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边区党要向联共党学习的，主要就是这布尔塞维克的一元化、统一性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步伐不齐，各自为战，是无法战胜敌人的。

在边区的某些地区、某些部门和党政军民关系中，还存在着一些本位主义，门户之见，以及党员对党的领导闹独立性的现象。这些现象都是妨害抗战，妨害根据地的建设，妨害党员进一步布尔塞维克化的。一个人、一件事闹独立性，其影响决不止一个人、一件事，甚至会影响到全党的。特别是比较高级的领导机关与负责人员，更要注意。今天战斗所处的环境更困难，党的任务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重大，所以就更要求党的领导的一元化。

党领导的一元化，首先依靠于思想上的一致，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就是要求得全国党员的思想、观念问题的方法的一致。而反对宗派教条主义，就是在党内的上下以及各部门相互关系上，求得上下步调上的一致。在党政军民各部门党员中，要承认我们边区党普遍的存在着自由主义作风，对危害党的言行熟视无睹，对“不利”于个人的小节，却斤斤计较，这种自由主义不克服，领导的一元化也是无从实现的。

我们边区党比其他根据地的党都要更幸运些，我们更应亲近的在中央领导之下。此纪念十月革命廿五周年之际，我现在向我们全边区的党员号召，向所有党政军民各部门工作中的党员号召，我们要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我们要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周围。我们一定要在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领导这方面做模范！

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十八两日在 陕甘宁边区党高干会上的讲演)

引言

同志们：

关于边区党在中央未到达前的内战时期，特别是其后期的历史争论问题，这次高干会讨论了十天，讨论得很好、很详细。这个问题在过去曾经争论了很久而未彻底解决，经过这次会议的检讨，可以说是在基本上把问题搞清楚了。边区党这一段历史争论问题，不能把它孤立的只看做是肃反错误问题。主要是属于路线问题的争论。朱理治、郭洪涛同志曾经诬蔑刘志丹同志和我们过去所执行的路线是右倾取消主义，然而历史证明了刘志丹同志和我们当时所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刘志丹同志和我们这一方面，恰恰相反，错误的是朱理治和郭洪涛同志，他们所执行的不是什么“马列主义”的路线，而是反马列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以这种“左”倾

机会主义路线来与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并以其错误路线来打击正确路线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现在当我们全党正在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这个问题若不检讨清楚，就不能贯彻整风学习和根绝三风不正的残余，就不能获得全党在思想上的一致，因而也就不能获得团结全党的巩固基础。所以我们把这次高干会对于这段历史问题的检讨，看做是边区具体的整风学习，看做是对于每个干部和党员最大的最生动的马列主义教育，是完全有理由的。为要有系统的说明边区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关于路线问题的争论，就不能割断历史，就必须从整个陕甘党与革命运动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说明它。因此，我的讲话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一）陕西党的建立到大革命时代。（二）国共分家到九一八事变。（三）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以前。（四）肃反事件。（五）肃反事件以后。（六）结论。

一、陕西党的建立到大革命时代

陕西自一九二二年及二三年起，即已开始共产主义运动，当时由旅京旅沪陕籍学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和少共(SY)团员，把共产主义思想散布于陕西青年学生及文化界，先后在渭华交界之赤水职业学校，华县咸林中学，三原渭北中学，西安一中及二中，绥德四师，榆林六中等校建立了党和团的支部。这时陕西在北洋系军阀刘镇华、吴心田统治之下，政治环境异常恶劣。党除以先进知识分子为对象在各地学校吸收优秀分子入党与建立党的下层基础支部外，并在党外进行各种政治文化活动，组织了许多青年学生的革命团体，如共进社、青年社、学生会、非基督教大同盟等，发行革命的书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在这些政治文化活动的基础上，党曾经领导了两次有名的政治运动：一是骗刘（刘镇华）骗吴（吴心田）运动，一是非基督教运动，前者是反封建运动，后者是反帝运动，这两次运动都带有普遍的性质，是陕西党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开始。经过这些运动，党内已涌现出了当时知名的优秀的政治活动家，如西安之魏野畴同志及陕北之李子洲同志等。

上述时期是陕西党的创立时期，亦是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在思想上、政治上及组织上准备了基础。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由共产主义的思想到共产主义的组织，由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活动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活动，但均尚未超越知识分子范围。

大革命时期，陕西革命运动会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二六年秋冯、于入陕与西安解围（西安被刘镇华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围起直至十月国民军入陕始解围），是陕西大革命运动开始高涨的标志。当时北洋军阀在陕西的支派刘镇华、吴心田的势力被驱逐了，代之以冯、于国民军的势力，冯、于在当时是代表国民党进步势力一方面的。因此，陕

西由反动局面转入革命局面，成为西北以至整个北方革命的中心，所谓“南有广州，北有西安”，这就是指当时陕西革命运动的发展，是可以与广州相比拟的。为什么革命运动能够在陕西比别的地方更为发展呢？是有其客观有利条件的：第一、陕西有革命的历史传统，如辛亥革命时期，陕西的反满运动，袁世凯反动时期靖国军的反袁运动，以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军的反北洋系军阀运动等等。第二、陕西有利革命进行的地方特点，陕西自民国以来，长期处于军阀土匪割据状态，群众的革命要求是很高的。第三、当时冯、于是进步的，我党与冯、于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遂推动革命运动在陕西迅速发展起来。

陕西党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一）在军队方面，党积极的参加了国民军的政治工作，选派了若干干部党员到国民军中去负政治工作，刘伯坚、邓小平、李林、刘志丹等同志，都是当时参加国民军政治工作者。同时西安创办了政治保卫部及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由共产党员史可轩担任部长及校长，其中亦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参加。

（二）在政权方面，党积极参加了改造各级政权的工作，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为国民党之左派于右任。同时有共产党员参加省政府任厅长，从省政府到各县县政府，亦有若干共产党员参加或在共产党员影响之下。

（三）在文化教育界方面，由于党在文化教育界中有相当的基础，故经过各中等学校及各县教育机关培养了大批的进步青年，而各种文化活动，基本上也是在党领导之下，如当时民国日报及西安著名的甘八书店，各种革命团体所办的刊物，大都有党员参加。

（四）在国民党方面，在西安围城之前及围中，在我党党员推动之下建立了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当时还是半公开的。在西安围城解围后，陕西各地国民党，更积极与公开的活动起来。当时省党部的刘含初、李子洲、张含辉、王授金等，都是共产党员。关中及陕北各县国民党县党部亦有共产党员参加。

（五）在学生运动方面，更有了广泛的发展，许多中等学校在党的领导之下，成为该地区革命活动的大本营，如西安之一中、二中，三原之渭北中学，华县之咸林中学，渭南之渭阳中学，绥德之第四师范，榆林之六中，延安之四中等。在学生中普遍建立了各种进步团体，并经过这些团体及广大学生，在城乡群众中进行了革命的宣传与组织活动。

（六）在工人运动方面，当时党在西安建立了若干手工业工人的工会，并建立了陕西省总工会。

（七）在农民运动方面，当围城前后，由广东农运讲习所派回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参加了各地农民运动，并于国民军入陕驱逐刘镇华的战争中，由党员经过各地红枪会发动农民配合冯部作战，参加反刘运动，如在郿县、三原、蓝田等地农民会袭击刘镇华的粮台兵站，并于蓝田解决了刘部一营武装。由于农民的积极援助，才使冯部驱刘解围战争迅速的走向胜利。其后在革命高潮之下，长安、蓝田、渭南、三原、绥德等地农民协会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建立起来，并进行了反苛杂反土劣的斗争。如长安农协农民自动的逮捕并打死了当地大土豪徐大汉。一九二七年召开了陕西全省农协代表大会，并成立了省农协。

（八）党的组织于此时有大的发展，并在领导上也统一起来了。一九二七年春，开了全省党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区委，统一了陕北与关中党的组织及领导，出版了党报《西北人民》，党员数量由数百人发展到数千人。其成分虽然大部分还是青年学生及参加党政教军民各项活动的知识分子，但在农民士兵及工人中也开始发展了一些党员，使党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党。

一九二七年的郑州会议，是陕西大革命阶段结束的标志，因为从这时起，国民党实行清党，地主向农民反攻，于是结束了大革命发展阶段。总结大革命发展阶段中，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显著的成绩有三：第一、建立了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同时相当普遍的党，散布了共产主义思想及影响。第二、培养了党的骨干，特别是军事干部。第三、在相当限度内发展了农民运动。这三项就成为党在下一阶段进行武装斗争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但从另一方面来检查，又是有缺点的，主要的缺点是：第一、党在与国民党统一战线中有右的倾向，这就是以当时省委书记耿炳光为代表的“只有团结没有斗争”的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两面性，只看到革命方面，忽略了反动方面。因而就看不到严重形势的到来，没有适应环境的变化来转变党的工作，使西北党与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第二、统一战线中的下层工作即农民运动发展的不足，尤其是没有注意土地问题。第三、武装工作虽然做了，但只做上层政治工作，不注意掌握实权，不懂得自己组织军队，未能取得确实的基础。这些缺点就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所受损害的根源。

二、国共分家到九一八事变

大革命失败后，当时党外情况是由革命局面转入反动局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者，随着全国反动逆流的弥漫，在陕西亦进行“清党运动”，将大革命时期在军队政权国民党部及文化教育界服务的共产党员，一律洗刷或迫走，若干共产党员被屠杀（如刘含初等），工会农会被解散，青年学生的一些革命团体，或被解散，或被迫处于秘

密状态。这是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反动局面的开始。但这只是矛盾的，在当时来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当时的西北系与国民党中央间仍存在有矛盾，这种矛盾以后会发展为军阀战争。

在这一反动潮流袭击之下，当时党内情况是如何呢？由于耿炳光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在思想上及组织上都没有过渡到反动时期的准备，当着反动局面已经到来的时候，党又没有适时的有计划的组织退却，故在政治上及组织上造成很混乱的状态，党员大批的退党或消极，一部分党员被捕或被杀，少数愿意继续革命的党员，也一时失掉方针和自信。这种混乱状态，直到八七会议的决议与精神传达到陕西后才被逐渐克服，才使坚决革命的党员获得了自信和方针。

大革命失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曾在党的工作方向上发生分歧，就是说，情况已经变了，党应向何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呢？一部分党员主张党的方向应由城市转入乡村，应拿起枪杆子来进行武装斗争，就是说，党的方向应以乡村与武装为主，刘志丹同志就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他为这个问题曾和当时陕北特委书记杨国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对的，许多党员在这一思想和方针下走入农村和武装部队中去，开始了党的武装活动。但有不少的党员，特别是当时的领导机关，还不认识党的方向应转入农村和武装斗争的重要与必要，仍迷恋于城市，舞弄文墨，进行空洞的宣传号召。他们在思想上是以城市与非武装的秘密的工作为主的，这就一方面使党不能聚集更大的力量于武装活动方面，另一方面在当时无保障的脱离群众的秘密工作之下，使党的组织不断的遭受破坏，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党的组织的大破坏。历史完全证明了当时把党的主要方向放在乡村与武装方面是正确的。正是这一正确方针，使党创造了革命的武装与根据地，而把党的主要方向，放在城市和非武装方面则是错误，正是这一错误使党不断的遭受损害。

我们现在不来详细总结秘密党的经验，这件工作以后有时间时再做。现在我们专来讲一讲武装斗争方面的经验，这个时期，党虽然确定了要进行武装斗争，而且也有武装斗争的条件（大革命时期党所创造的一些军事工作基础以及大革命失败后党不断的派干部到军队中工作所创造的基础），但如何进行武装斗争，许多同志还是没有经验的。自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党曾领导了多次的武装起义，著名的有清涧兵暴、渭华兵暴和旬邑农民暴动。清涧兵暴是一九二七年九月在唐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下发动的。清涧李象九旅（当时李亦为党员）兵暴，暴动由清涧开始，南下进攻延长、宜川、韩城等县，结果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政治上没有把枪杆子与农民结合起来，形成单纯的军事行动，没有依靠农村而企图攻占城市。在军事上不懂得打游击战而只是进行阵地战。渭华暴动是一九二八年七

月，在刘志丹、唐樹等同志领导下发动的许全忠旅的暴动（当时许亦为党员，其基础就是史可轩同志领导的中山学院学生及政治保卫队队员，后归李虎臣编旅），发生于潼关、渭南、华县一带，暴动后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并发动了渭华广大群众参加暴动，坚持了一个半月之久，最后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中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政治上虽然开始懂得了枪杆子要与农民结合，懂得了要依靠农村，但是认识还很肤浅，并且发生了盲动倾向，如片面的强调“以赤色恐怖对白色恐怖”“反对书生姑娘习气，提倡暴徒泼妇精神”等口号，如地点选择在西潼大道的要卫，如在军事上（和清涧兵暴一样）还不懂得进行游击战，仍是打阵地战，如没有发动农民的土地斗争等等。旬邑暴动是渭华暴动之后不久由许才升同志领导的旬邑农民暴动，暴动的农民攻下了县城并组织了苏维埃政府，但却没有彻底收缴地主豪绅的武装来武装农民，也没有深入农民斗争；结果在地主豪绅以牢笼计诱杀了许才升同志后就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虽然有了农民，却没有枪杆子，同时不懂得如何深入斗争与依靠农民进行游击战争。此外还有大大小小许多次的武装斗争（如在关中之礼泉、扶风、乾县，陕北之绥德、横山以及甘肃之靖远、两当等地），或因是单纯兵暴，或因是单纯农暴，二者没有互相结合起来，并且在路线上多带有盲动性，所以没有例外的都失败了。

上述这些兵暴农暴虽然都失败了，但却在党内培养了一种坚定的武装斗争的决心，并且由失败中获得了经验，就是：（甲）军队必须与农民结合，单有武装没有农民不行，单有农民没有武装也不行。（乙）必须依靠乡村并进行游击战，打阵地战不行，在城市要道不行。（丙）必须有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盲动主义不行。

真正领悟了上述兵暴农暴失败教训的，首先是刘志丹同志。刘志丹同志熟知地方情况和群众条件，有长期军事斗争经验，并亲自参加了渭华暴动。他在这些暴动失败的教训中摸索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要胜利的进行武装斗争，必须依靠山地打游击。因此，刘志丹同志于一九二九及三〇年间就独立的奔走于陕甘边境一带，进行军事活动，夺取军阀土匪部队的武装，来进行游击战争，虽遭多次挫折以至被捕下狱，毫不灰心。他的这种坚定的方向与斗争的收获，终于成为党建立陕甘革命武装与根据地的基础。

然而当时陕甘党的领导机关，并没有很好的认识到这些经过多次失败所得来的教训。相反的却执行了极“左”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以杜衡为首于一九三〇年秋组织行动委员会，毫无根据的要在关中陕北和甘肃建立三个军，并提出于是年十月革命节召开陕西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计划。到处空喊暴动，甚至在西安市内也要号召暴动（当时西安只有二三十个党员和数十个所谓赤色群众）。这些计划有的因

为受到下级党员的抵抗没有实现，有的因为根本没有根据无从实现，所以没有看到什么暴动出现，反而使党的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四中全会后党开始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实际上只纠正了立三路线某些比较突出的部分，并未根绝立三路线“左”的思想，所以后朱理治、郭洪涛的路线比立三路线还有了新的发展），正在这时，陕西环境起了变化，由于蒋、冯战争的结束，冯玉祥在陕西的统治倒台，代之以杨虎城的统治，同时陕西农村经济经过几年大旱灾后，亦于此时有了某些开始复原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党内滋长了一种右的倾向。这一右倾当时是以张文华、张资平等为代表的，后来这种右倾思想又为黄子文利用来一贯的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认为在杨虎城统治之下，由于实行经济改良与政治欺骗，陕西群众斗争情绪已降低了，革命已进入低潮时期，并诬蔑南方红军的发展为“流寇行为”，认为是“没有出路的”。这一右倾在实质上是想否认陕西武装斗争有利条件，并取消党的武装斗争方针。但这一右倾立刻受到打击，一九三一年四月的省委全体会议坚决与这一右的倾向进行了斗争，开除了张资平、张文华等的党籍，确定了游击战争的方面，并于是年十月正式决定成立反帝同盟军。总结这一时期党的基本特点是转入地下活动与武装活动的时期，当时党虽已部分转入武装活动，但一般的还是以地下的秘密活动为主，这是不正确的，其思想根源是对武装斗争的重要与有利条件估计不足，而党的武装活动虽均失败，但由这些失败中却积累了经验，摸索到了正确的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没有这一时期武装斗争的失败，就不会有下一时期武装斗争的胜利。陕甘红军与苏区的创造是与这一时期党的武装斗争不能分开的。这就是这一时期党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意义。

三、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以前

从一九三一年反帝同盟军的成立到一九三五年十月的肃反事件以前，是党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时期，其中又可分为五个阶段来说明：

（甲）反帝同盟军成立与土地革命的开始

（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首先应说明反帝同盟军（即以后的陕甘红军）成立于九一八事变后不是偶然的。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当时西北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加深（这种矛盾一直到西安事变以后还继续存在），使西北阶级关系起了很大的变化。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抗日倾向，中下层则要求抗日。这一变化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许多军队的中上层分子找党的组织和红军进行抗日合作的谈判。许多地方著名人士倾向抗日与接近共产党员。西安、汉南、渭华各地学生组织抗日团体，游行示威。打国民党部，西安全市学生于四月二十五日把戴季陶

的讲演变为反戴季陶的斗争，包围戴季陶并焚毁其汽车。二十六日全市学生进行抗日驱戴运动，发生了枪杀学生的事件（四二六惨案）。这一切都是说明新的形势到来了，可是当时党对于这一形势在发展红军这一方面有很大成绩，但另一方面却拒绝与一切倾向抗日的中上层谈判与合作。这就是关门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直到一九三五年中央来到陕北才被克服。

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月，党决定以刘志丹等同志在陕甘边一带领导的武装和由山西过来的晋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反帝同盟军，不久又改为陕甘红军游击队，以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新宁、宁县一带为活动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创造陕甘新苏区。这是第一次在陕甘举起了工农红军的旗帜。开始一个时期，部队成份较复杂，以后在斗争中逐渐淘汰了无法转变的土匪成份，同时吸收新的积极农民参加，使部队在政治上及组织上逐渐巩固起来。当时在陕甘红军游击队积极行动与直接领导之下，发动了旬邑、淳化、三原、耀县、正宁、宁县一带农民的各种斗争（如分粮抗捐税反豪绅等），并开始分配地主豪绅的土地给农民。在群众斗争发展中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发展了地方党组织，游击战争的局面日渐扩展起来。这一时期陕甘红军游击队所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第一时期。

（乙）杜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红二十六军的失败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三年七月）

一九三二年的中央北方会议后，决定把陕甘红军游击队扩编为红二十六军，首先成立红二团作为二十六军之骨干，并派杜衡为政治委员。杜衡是一贯的“左”倾空谈家，是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四中全会后并没有彻底转变。他参加了北方会议，携带着北方会议的精神到了二十六军，从这时起，二十六军就在杜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以至最后遭到失败。杜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打倒一切反对一切，拒绝任何的统一战线。对土匪民团不加任何区别一律主张肉体消灭。即使当时真正愿意和我们合作并在物质上援助我们的民团土匪（如夏老么等）也是如此。对白军进步的军官，拒绝谈判合作，并辱骂当时与白军。进步军官建立统一战线的某些同志是“勾结军阀”，结果就造成了所有白军民团土匪部队与我们的对立，使自己孤立起来。

杜衡“左”倾机会主义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在农民运动中执行过“左”政策，火烧香山寺（这就是有几百和尚道士，几省知名的大庙），引起农民不满。在反对富农路线的口号下，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的打击。无计划的号召农民来分粮，地主富农的粮不够分，结果把中农的粮也分了，侵犯中农利益。这样反对地主、打击富农、侵犯中农的政策，

就使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缩小到只有贫农雇农，甚至使贫农雇农对党也抱有疑虑。

杜衡“左”倾机会主义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军事上的冒险行动，他初到红军中主张坚守照金根据地，在庙湾雨原两次战争失利后，又主张无目的的乱窜，违反省委决定和部队多数同志意见，主张北上，并提出计划要组织骑兵师，打通所谓“国际路线”。这一行动遭到省委及部队同志反对后，又主张南下，提出在渭华建立新根据地。其理由是“渭华有华山之险，群众斗争条件好，且为敌人交通大道，给敌人威胁更大”等，不管北上南下，都是纯粹主观主义的军事冒险行动。北上计划，虽已阻止，但南下计划，未能阻止，结果红二团渡泾河、渭河由高陵、临潼转入渭华，在敌人优势兵力围攻中全部失败，只跑出刘志丹、王世泰等几个同志。这是一九三三年七月间的事。

杜衡“左”倾机会主义的四个表现，就是实行宗派主义，对于一切不赞同不执行他“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同志完全采取打击政策。打击刘志丹同志，说刘志丹同志是机会主义动摇。打击谢子长、杨重远、阎红彦等同志，把谢子长、阎红彦同志以派赴上海受训名义调开部队。我也是受到了杜衡打击的一个，当时把我调开部队，派到陇南做兵运工作。这种宗派主义执行的结果，就造成党内的不团结，使歪风压倒正风，而杜衡最后亦由动摇被捕而叛党。这是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第二个时期。

（丙）恢复红二十六军继续展开陕甘游击运动与反右倾斗争

（一九三三年八月至一九三四年三月）

红二十六军二团失败后，省委恢复二十六军整顿陕甘边党的任务委托于我，这时正是陕西党与部队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二十六军全部失败了，由王泰吉骑兵团暴动过来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也失败了，（由一千六七百人的部队只剩下几十个人）。陕西党的领导机关及各地组织，差不多破坏光了。敌人天天在报上宣传说“红二十六军失败了”。“刘志丹梟首了”等，叛徒杜衡的自首宣言也接二连三的在报上发表出来。当我到达陕甘边时，只有王泰吉一点残部和渭北几个小的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人枪约七八十）。由于继续的失败与敌人反动宣传的影响，这些部队的士气当时是很低的。可是部队中和地方上党的骨干还保留着，如张秀山、杨森、张邦英、习仲勋、强世清等同志。依靠他们把部队在照金集中起来，重新整顿，继续游击战争。当时行动方针是打小仗不打大仗，由小胜变大胜。在这一方针下，慢慢的打了若干次胜仗，把部队情绪提高起来。但这时部队中发生了以黄子祥（当时渭北游击队长）为代表的右倾，他认为省委破坏了，二十六军义勇军失败了，游击战争没有出路了，由于对当时形势悲观失望的估计，就主张把部队解散，把枪隐藏起来，宣传所谓“不成不成，回家

务农”。或者主张把部队分开行动，各干各的，或者主张先找省委关系，找到关系后再谈别的。这些意见显然的是悲观失望的右倾表现。当时在陈家坡会议上受到多数同志坚决的反对，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终于打击了这种右倾思想。这个斗争的胜利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如不战胜这种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及情绪，则二十六军的恢复与发展就是不可能的。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在陈家坡会议之后，干部的信心增强了，战士的情绪提高了，一、三、五、七、九、十一六个游击支队建立起来了。接着就攻下旬邑，消灭了全部民团的武装，扩大了部队。这时刘志丹同志和王世泰同志由南山失败化装跑回来了，部队增加了新的力量，继续攻占合水，又在庆北毛家沟打了胜仗，故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拈花寺正式恢复了四十二师。并根据退出照金苏区的经验，决定游击队根据地不能只是一个，应当多建立几个根据地。当时在关中、陕北及陇东各建立一个根据地，每一根据地组织一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四十二师则不固定地点而灵活居中策应。这时黄子文又由西安跑来了，他提议要成立陕西省委，名单是些什么人呢？他提出李桀夫、张文华、蒲建生，还有他自己，并且要我参加。我晓得这些人全是右派分子，可以看出黄子文当时是想进行右派活动的，所以不但没有同意他，而且把他留在苏区，加以考查。并写了反对右派活动的文件派骑兵团到处散发揭破其反革命活动的阴谋以后，黄子文就到处散布谣言，如说刘志丹和我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专政”，说我们“不要陕西省委会走到反革命道路”等等，于是我们就将黄子文关起来进行考查，并揭破了黄子文的政治面目。这就是继陈家坡会议后第二次反右倾的斗争。可以看出在恢复红二十六军的这个期间，主要的是反右倾的斗争，并在反右倾斗争基础上展开了陕甘边及陕北一带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华池、庆阳、合水、保安等苏区（即第二路游击活动区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党的特委。不但恢复与发展了二十六军，并且更加扩大了游击战争区域，奠定了陕甘苏区的基础。这是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第三时期。

（丁）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与反郭斗争

（一九三四年三月至一九三五年五月）

一九三四年一月郭洪涛同志回到陕北，这时，不仅陕甘一带红军与游击战争已有很好的发展（如上所述），而且陕北之吴堡、清涧、安定、神府各处，也已经开始了游击运动。红二十六军不断的到安定、安塞、保安、鄜县、甘泉、延长一带活动，直接推动与组织陕北游击运动的发展。陕北特委早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就有开展游击运动的决议，陕北有党与群众斗争的历史，有过去二十六军不断的直接行动并派送干部和武装的扶植，游击战争的发动与发展是势所必然的，然而，郭洪涛同志在瓦窑堡时所写的陕北党史中，却把自己描写成为陕北红

军与苏区的创造者，这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不对的。郭洪涛同志回来是拿着北方会议的决议当做自己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武装。首先，他对于当时形势，有一种极“左”的估计，认为“西北和全国一样，已经到了两个政治前途决定的关键，一个是苏维埃的前途，一个是殖民地的前途”。认为“中国工农红军英勇的斗争与胜利，苏区的空前扩大与巩固及经济建设的发展与工农生活的改善，继续不断的前仆后继的在暴动着，在为争取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三月扩大会议决议）。认为“西北劳苦群众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开展与扩大，游击运动普遍的汹涌的发展与巩固，苏维埃运动烈火般的扩大”（同上）。认为白区群众“只有站在我们的领导之下，誓死为争取工农政权与土地革命而斗争，以求得劳苦群众的彻底的解放与自由”（同上）。认为白军士兵“斗争与哗变的潮流，广大的发展，士兵群众日益深刻了解白军长官是反动的压迫群众的，他们只有打死反动长官投降红军中来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同上）。显然这些都是片面的夸大的甚至是全无根据的估计。

郭洪涛同志从对政治形势极“左”的估计出发，来检查陕北党当时的情况，自然是完全不能令他满意了。郭洪涛同志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党的扩大会议上是如何估计陕北党呢？他认为“陕北劳苦农民的英勇的斗争当中，党的富农路线的领导，障碍了实际工作的推进，使党远远的落在群众斗争的后面……充分地表现陕北党对于领导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的消极怠工”（同上），对游击队也认为“各支队都充分的表现对于领导游击队的保守消极与怠工，都充分表现富农路线的右倾残余仍然残存在各支队的实际行动中，领导中”（同上）。不过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天津召开的所谓陕北党团联席会议后，“各地工作已由富农路线部分的转变到正确的中央路线上去”。就是说在郭洪涛同志未回来前，陕北党完全是富农路线，给当时陕北党的主要领导者马明方同志带上右倾富农路线的帽子。而自郭洪涛同志回来后才部分的转变了富农路线，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呢？是不正确的。因为陕北党在郭洪涛同志未回来前，即已开始领导群众斗争，并发动游击战争。既然是富农路线，为什么还要领导群众斗争和发动游击战争呢？只不过陕北党在当时还没有执行像郭洪涛同志那样“左”的路线罢了。在郭洪涛同志看来，这就是因为受到“富农路线”的障碍，于是就举起反富农路线的幌子来掩盖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

郭洪涛同志的这种“左”倾机会主义是继续发展的，他在一九三四年七月的阎家窑子会议上对二十六军的估计是“一贯的拘泥于逃跑主义与窜森林主义”（见郭著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一文）。对杜衡领导红二团走到失败的“左”倾机会主义，还认为“左”的不够，而估计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对红四团在狭窄的平原地区

与敌人绝对优势兵力进攻下退出渭北苏区（所谓渭北苏区不过是三原武字区二三十里的一个平原地区）估计为“逃跑主义”。对领导骑兵团全都哗变成立义勇军并最后为革命牺牲的王泰吉同志估计为“没有丝毫的阶级立场”，“没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与勇气”，“纯粹是革命高潮下的投机”。对在一时不利条件下退出照金苏区而同时向新的地区发展的方针，估计为是“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是“招兵买马的拉拢土匪流氓的发展”。批评当时还是游击状态中的革命委员会政权“没有一条正规制度”，要求革命委员会的政权正规化。批评当时还处在游击战争时代的游击队“游击习气很大”，要求游击队要建立红军的正规制度。最后就认为“陕甘边区游击运动，在富农路线的脱离群众的领导之下，断送了边区的游击运动”。就认为是“干部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不足和一贯的右倾”。然而实际是如何呢？历史证明了二十六军并未右倾，而是郭洪涛同志太“左”倾了。

郭洪涛同志对于土地问题及对富农政策也是“左”的。二十六军和陕甘党会把富农多余的土地和牲畜分配了，但给富农留一部分土地。而郭洪涛同志就认为这是富农路线，他主张对富农和地主不加区别，一样分配他们的土地。当时许多边境的土地未分，是因为那些地方政权尚未巩固，白军常来扰乱，分了地不能巩固在群众手中，地主来了又讨回去。但郭洪涛同志毫不估计这种实际情况，把一边境区暂时未分土地的事实也看做是机会主义表现。甚至“分地连分了七天”，也是严重错误。郭洪涛不但主张分富农的地，不但主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一齐分地，而且主张实行集体农场。看起来郭洪涛同志是非常革命似的，其实他还丝毫不懂得革命的常识。

阎家窑子会议之后，八月间红二十六军主力与第一路游击队（即陕北游击队）粉碎了敌人的一次“围剿”，缴枪二百余支，俘虏一百余名，肃清了数股进攻苏区的反动白军和民团武装，攻占了许多为土豪盘据的寨堡，克服了由于敌人“围剿”所造成的当时群众中的恐慌以至反水现象，将游击队集中扩编为红一团，冬季又在清涧成立了红二团，并在安定成立了陕北第一个革命委员会。这时游击运动开展的局面，向党提出了统一陕甘与陕北党及政治军事的要求，故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周家硷会议中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陕甘与陕北党的领导，同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陕甘与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正因为有了这次的统一，粉碎敌人二次“围剿”与争取苏维埃运动的更大胜利，才有了可靠的保证。

当周家硷会议的时候，敌人对陕甘苏区的二次“围剿”已在开始部署，二次“围剿”的规模，比起一次“围剿”要大的多和严重的多。周家硷会议对于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曾展开激烈的争论，当时提出了两个战略计划，一个是刘志丹同志和我们提出的，

主张进攻延长、延川、保安、安塞以与陕甘苏区打通。这种战略方针之所以有利，就是因为它是靠近山地和我们的根据地，是有阵地的出击；而郭洪涛同志所提出另一种战略计划，就是主张向绥、米、葭、吴进攻，以与神府苏区打通，这在当时情况下，显然是对我们不利的、带有冒险性质的军事计划。因为绥、米、葭、吴一带，敌人统治较为强固，要进攻势必走到攻坚，攻坚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山西方面的敌人也容易过来给我以威胁，是既不易攻又不易守的。周家硷会议反对了郭洪涛这一“左”的冒险的军事计划，赞成了刘志丹同志的战略计划。郭洪涛同志初回陕北当游击队力量还很小的时候，就曾提出“练习阵地战和平原战”的口号，以后他又反对二十六军和陕甘游击战争中所执行的正确路线，主张二十六军应当攻坚，应当向城市及平川发展。这次对粉碎二次“围剿”的战略问题，又提出攻坚和向平川城市发展的计划，可见郭洪涛同志在军事上也是一贯的抱有极“左”的思想的。他这种军事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虽然对陕甘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影响，但对陕北某些部队和游击队是起了一些影响的，使他们在军事上受到一些失败。

郭洪涛同志在干部政策方面，一贯的实行宗派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他不从政治上原则上来团结干部，而是以个人好恶为标准。凡奉承他的，不论政治上好坏，均提拔之，反之，均排斥之。所以他提拔的干部，有许多品质很不好的，并且有一部分当时就背叛了革命。另一方面就采取许多办法来打击不同意他错误路线的同志。郭洪涛同志一回到陕北，就拿富农路线的帽子来打击马明方同志，在阎家窑子会议上又给我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撤销我政治委员的工作，并给我留党查看的处分。又以“白军军官”、“一贯的动摇怕死”等诬蔑来打击刘志丹同志。对谢子长同志也是采取了许多方法来打击的。至于对其他许多干部，不说是“右倾”，就说是“富农”，不说是“土匪”，就说是“流氓”，一样采取各种方法来打击，甚至无辜的枪毙同志，造成党内浓厚的无原则的空气，歪风压倒了正风。

郭洪涛同志在政治上、组织上所有这一切“左”的错误，当时已逐渐为大多数干部所认识，大家一致认为他在政治上无原则和幼稚的，是一个“左”倾空谈家，而在品质上是极端个人主义和极不正派的。于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的玉家湾会议上和郭洪涛进行了斗争，严正的批评了他这一切错误，特别是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并调动了他的工作。和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到这次玉家湾会议为止，可以说在基本上结束了。但玉家湾会议对郭洪涛的斗争是不彻底的。因为在组织上只是给以批评和调动工作，并未撤销他西北工作委

员会的委员。同时调动工作，又是换汤不换药的，所以他以后仍能继续做了许多有害于党的事情。

玉家湾会议后，党在正确的战略路线指导下，粉碎了敌人的二次“围剿”，击溃敌人二十营以上的兵力，缴获了大批的武装来武装了红军和游击队。当时红军有一倍以上的发展，游击队有二倍以上的发展，占领了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六个县城，使陕甘与陕北苏区完全打成一片，苏区得到空前发展。这是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第四时期。

（戊）朱理治“左”倾机会主义与反朱斗争

（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十月）

敌人的二次“围剿”被粉碎后，由于红军迅速壮大和苏区猛烈的发展，使得敌人调动更大的兵力来布置新的三次“围剿”。当时军事委员会对粉碎三次“围剿”决定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先打东线敌人，再打北线敌人，然后打南线敌人。在这种战略方针下，东线敌人被红军击溃了二个旅并消灭了二个团，将敌人赶过了黄河，这是粉碎三次“围剿”的开始。正当这个时候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了陕北。朱理治同志到了陕北后，首先选择郭洪涛同志做他第一个助手，并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加发展了。朱理治在文安驿和永坪两次会议所做的报告和决议以及他在“西北斗争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对当时形势是怎样估计的呢？他说“中国目前存在两个政权，一个是日益动摇崩溃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权，另一个是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国民党政权是“民族的社会的武断宣传大大破产了，财政更大的恐慌了，内部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了，军事上的困难与军队的崩溃大大的增加了，国民党的碉堡政策在群众力量之前必然的会达到失败”。又说“国民党区域日益缩小”，国民党最大的困难是“武装力量的削弱，剿匪战线的延长，东至关东，西至西康，北至府谷，南至云、贵，在广大的战场里使国民党军队不敷配备，是白军士兵一天一天走向革命的道路，一般的极端动摇与不愿进攻真正抗日反帝的苏维埃红军”是“国民党的招募新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招募新兵的来源日益缩小”等等，苏维埃政权是“苏维埃区域日益扩大”“苏维埃区域占有全国的四分之一，苏维埃的人口占有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争取一省数省首先的胜利口号是早经完成的，苏维埃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地已经胜利的发展着”，因此就认为是处在“伟大的阶级决战的前面”，不仅是阶级的决战，而且是“我们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的阶段迫在我们面前”。对粉碎二次“围剿”后的陕甘形势又是如何估计呢？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定有条约，出卖华北，要在西安设立领事馆，把军队开到西安，亲自出马，直接干涉”。“三次‘围剿’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西北最凶恶的步骤，冲

破三次‘围剿’对于阻止殖民地化西北有决定的意义。”“在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二次‘围剿’的战斗中，由于苏区扩大，工农群众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汹涌斗争，由于全国革命发展与白区群众斗争的响应配合，特别由于中央主力红军与全国红军的胜利……获得了伟大胜利，……，给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平津察省侵略西北以迎头痛击，……使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形崩溃，使全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形尖锐化”；陕甘党对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不仅完成而且超过了，因此就认为“三次‘围剿’中我们占绝对的优势”，“战争的优势是属于我们方面的”，这些就是朱理治同志对当时形势所做的所谓“列宁主义路线”估计。

朱理治根据他对形势的上述估计，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就是：“陕甘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巩固与发展陕北陕甘边区并与陕南的红军游击队联系起来，建立陕西的广大苏区，更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使川陕苏区有伟大雄厚的根据地，能够有阵地的有后方的发展伟大的战争，并进一步的使川陕苏区与新疆、青海、甘肃的伟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不仅如此，并且要“实行对帝国主义直接作战，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武装保护苏联，为了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同样成为我们党的当前任务”，这就是朱理治对当时陕甘党规定的所谓“列宁主义路线”的任务。朱理治为了完成上述的政治任务，在军事路线上也提出了他的一套主张，提出“全线出击”和“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持点”，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又要红军“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阵线”，又要红军“运动用红军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坚决的进攻敌人，在新的‘围剿’未布置之前先行打碎”，更要“争取神府和吴、绥以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邵发展，恢复已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酆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洛川在南，定边在北，如何能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发展呢？朱理治同志连地理都没有弄清楚），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富平、耀县、泾阳发展，坚决和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与二十五军北上抗日部队取得响应，争取这次战役的全线胜利，巩固发展陕甘基本苏区，创造新苏区与新游击区联系陕南及四川苏区为一片”。这些就是朱理治同志对粉碎三次“围剿”提出的所谓“列宁主义路线”的军事方针，请问当时陕甘红军游击队全部不到数千人，有什么办法能执行这样大而且多的军事任务呢？最可笑的是在粉碎三次“围剿”决议中说：“在粉碎三次‘围剿’的战斗中，首先要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倾向与取消主义的观点”，既然要粉碎“围剿”，粉碎“围剿”就要和敌人打

仗，打仗首先就要有枪杆子，为什么却首先要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呢？这真是亘古未闻的奇谈。

关于朱理治同志这一切高超的所谓“列宁主义路线”的估计和计划。当时许多同志是不赞成的，特别是他对粉碎三次“围剿”所提出的军事计划，在文安驿会议中曾受到刘志丹同志的嘲笑和反对，说他在“做梦”。现在大家如果把当时的实际情形与朱理治同志的估计和计划对照起来看一下，那么，这不是做梦是什么？文安驿会议后，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执行朱理治的路线，仍是按照我们原定的战略方针行动，于打走了东线敌人之后，又集结力量打击北线的敌人（进攻横山未克）。这时二十五军来了，与二十六军在永坪会师，并由朱理治召开了永坪会议，以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三人成立中央代表团，改组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陕甘晋省委，以朱理治、郭洪涛二人为正副书记，改组军事委员会，以聂洪钧为主席，决定成立十五军团，以徐海东、刘志丹为正副军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我为政治部主任，这一切组织上的变动说明什么呢？说明是把刘志丹和我从党及军事的主要机关排挤出来了，而郭洪涛、聂洪钧等却被提拔到极重要的位置上去。如果说在文安驿会议朱理治虽已提出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但因有刘志丹同志和我们的反对未能立即执行，那么，在永坪会议后，因为他得到了二十五军主要领导者和郭洪涛们的帮助，就取得了党和军队的全部领导权，所以从这时起，朱理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就统治了陕甘的党，使三风不正发展到了顶点。

因为刘志丹和我们对朱理治“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不赞成的，所以朱理治、郭洪涛就给我们戴上了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请看他们在粉碎三次“围剿”决议中对粉碎二次“围剿”是如何估计的，他说：“总结二次战役中的经验与教训，虽是我们初步的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普遍的发展广大的群众进行革命战争，在某些地方允许组织清乡会，和敌人和平苟安的进行妥协。在敌人进攻前面悲观失望，在战略上的退却逃跑，以及执行单纯的坚壁清野政策，阻碍了革命战争的开展。没有充分开展在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完全忽视地方暴动之配合，没有及早定出军事计划，既经决定计划之后，军事行动的迟缓，不得迅速执行。红军没有应有的扩大。白区与白军士兵工作的忽视，苏维埃的民主制度没有广泛的建立起来。这都是我们在二次战役中没有能全线的冲破‘围剿’与得到应有收获的最大原因”。由此种估计出发，朱理治、郭洪涛在彻底粉碎二次“围剿”后的永坪扩大会议上，就大开展其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

以后他又写了一篇题目叫做“打倒反党的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斗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说：“在陕甘阶级决

斗的前面，有一种不相信革命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不相信我们事业能够成功的人们，便表示了极大的恐慌与动摇。他们主张退却逃跑，主张放弃苏维埃与红军，主张取消白区的工作，主张取消党的领导，他们形成另一条路线——右倾取消主义的路线——来和党的路线对立起来”。这是指得什么人呢？他虽然提出了蔡子伟、黄子文、张庆孚等人的名字，但实质上主要的是指刘志丹同志和我们，因为朱理治说革命发展的是那样的大，而我们说没有那样大，就说我们是“右倾取消主义，认为全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朱理治说在粉碎三次“围剿”中我们的力量占绝对优势，而我们说还没有占绝对优势，就说我们是“估计不足”，是“右倾机会主义”；朱理治说要把陕甘陕北苏区与陕南四种以至新疆、青海、甘肃联系起来，而我们说这个暂时还没有可能，就说我们是“取消革命”；朱理治说任何一个地方的群众，只要党去领导就会革命起来，我们说不能一概而论，陕甘有陕甘的特殊条件，就说我们是“陕甘特殊论”，是“用一种特殊论的说法来掩盖其对革命工作的消极怠工”；朱理治说要大大的加强陕甘工人运动，要提拔工人到领导机关以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我们说陕甘无产阶级不多，这个问题没有像天津、上海那样重要，就说我们是主张“党与无产阶级的领导应当停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于是就说：“这种主张与策略是在敌人的进攻下，解除革命的武装，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使陕甘革命走到失败的道路”，是“更进一步的暴露反革命的实质”，是“反动统治各派别在党内的同盟军与应声虫”。既然是如此罪大恶极的右倾取消主义，那当然就“必须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与调和主义的残酷的斗争”，就“必须采取组织上的制裁一直到开除党籍为止”。甚至我们在前方已经打了大的胜仗，反说我们“个别的右倾取消主义者，已显露了反革命的原形”。这就是朱理治、郭洪涛当时和我们在政治路线上的斗争。

朱理治、郭洪涛在组织路线上是实行极端宗派主义的，朱理治对地方干部只信任郭洪涛一个，对其他许多创造苏区有政绩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地方干部，大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并指责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加以打击。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马文瑞、张邦英、张仲良、朱子休、杨祺等都曾受了打击的。他对张庆孚忽而拉他参加中央代表团和当军委会副主席，忽而又说他是反革命逮捕起来。他在永坪会议上关于党和军事机关的改组，是有计划的把刘志丹和我们一批人从党和军事指导机关赶出来，他成立中央代表团，代表团下又成立小代表团，以这种形式来达到夺取高级领导权的目的。他在提拔工人干部的口号下，打击当地有威信有能力的老干部，如把习仲勋同志的革命委员会主席撤销，而代之以毫无经验的一个所谓“雇农”同志。总之，凡是奉承他和赞成他路线的人（如郭洪涛）就提拔，凡是不赞

成他和反对他路线的人，就打击，一直到把他们当作反革命逮捕起来，这就是朱理治、郭洪涛同志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试问这样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与党的原则有什么相同之点？

最后再看朱理治、郭洪涛的各种社会政策。首先在土地政策上，进行了一个查田运动，就是对地主富农实行肉体消灭，对中农也给了打击。好些共产党员在地主富农的名义下受到残酷的打击，美其名曰“深入阶级斗争”，其实是使群众发生恐慌，军队发生动摇，造成很严重的形势。朱、郭在劳动政策方面提出实行八小时的工作制，他不晓得陕北农村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是没有表的，八小时制如何实行呢？这是把大城市的一套搬到落后的陕北来了。朱、郭对知识分子是采取排斥和打击的政策，对游民哥老会分子是采取消灭的政策。至于朱、郭对肃反的政策，那更是实行疯狂的极“左”的政策，造成了许多罪恶的行为。

永坪会议之后，十五军团南下，于劳山战役中消灭了一一〇师大部，并击毙其师长，继包围甘泉未克，复将一〇七师的四个营消灭于榆林桥，接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配合下，歼灭敌一〇九师于直罗镇，敌人对陕甘苏区的三次“围剿”至此时彻底粉碎，使陕甘苏区的形势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是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第五个时期。但在劳山战役之后，中央红军未到之前，在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等主持下，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以下我就要专门讲这个问题。

四、肃反事件

正当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紧急时候，陕甘苏区内部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在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四人的主持与策动下，将刘志丹等一大批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老干部（我也在内）以莫须有“反革命”罪名逮捕起来，并且枉害了好些同志，造成当时陕甘党与苏区极严重的危机，如果不是中央及中央红军及时到达陕北，这一肃反事件就会引导陕甘党与苏维埃运动到失败的道路。因此，我们对这次肃反事件必须加以深刻检讨，得出教训，使这种错误今后永不重复。

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严重的肃反事件呢？其根源何在？

第一，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上面我已讲了这个问题。朱理治、郭洪涛不论在政治路线，军事战略，社会政策及组织路线各方面，都是错误的，形成一条有系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另一方面，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一方面却是执行着正确的路线。而朱理治、郭洪涛就以他们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与刘志丹同志等的正确路线相对立，在政治上军事上及组织上展开各种争论。朱理治、郭洪涛

因为要保留与坚持其“左”的错误路线，就不能不推翻我们的正确路线，所以就给我们带上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他们在政治上拿这个法宝来打击我们，同时在组织上又实行各种只有剥削阶级才采用的挑拨分化手段，企图拆散团结在正确路线下面的同志。当这些手段无效时，又将刘志丹同志和我们从党与军事的主要领导机关排挤出来，以扫清其贯彻错误路线的障碍。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屈服了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于是在二十五军来了之后，当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就将这种党内路线的斗争转入党外斗争，于是发生了这次“肃反”事件。

第二，是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能否说两条不同的路线斗争就一定要发生“肃反”事件。这样说，从路线斗争转变到肃反的关键是个人品质的问题，就是说朱理治、郭洪涛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在那里作怪，不然在党的路线正确的时候，朱理治在河南、郭洪涛在山东为什么又搞了许多错误呢？这次大会的检讨已经把朱理治、郭洪涛的个人品质完全彻底的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两个是毫无党性的极端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一个追求的是“钦差大臣”，一个追求的是“土皇帝”，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把党的利益服从于他们的个人利益，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一直发展到牺牲别人来满足自己个人主义欲望。

第三，二十五军到来与鄂豫皖苏区张国焘的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很显然的，如果没有二十五军的到来，朱理治、郭洪涛就没有军事力量的依靠，就不容易发动肃反，而二十五军当时又是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到陕北的，特别是戴季英同志当时任保卫局长，就把鄂豫皖苏区错误的肃反经验应用到陕北来了，所以二十五军到来也是促进这次肃反事件爆发的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在这次肃反事件中，朱、郭等的错误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想用肃反的形式来达到其夺取党及军队领导权的目的，肃反只是借题发挥。因为陕甘红军与苏区是刘志丹同志和我们创造出来的，刘志丹同志和我们这一批干部，是与陕甘党及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如果朱、郭既不能在政治上屈服我们，而又要执行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满足其个人主义的欲望，除了利用肃反名义来打击我们外，是很少有其他办法的。肃反事件在实质上正是这样。其次是帮助了敌人。朱、郭既然把党的同志，把苏区的创造者与红军的领导者和干部当反革命逮捕起来，甚至加以杀害，这当然是只有对敌人有利的事，是完全帮助了敌人。肃反是在打垮了东线敌人又在南线取得劳山战斗胜利之后，试问这些胜利是谁领导的呢？正是被朱、郭逮捕起来的这些人。既然这些人领导的打了胜仗，反而把他们捉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难道还不是帮助敌人的行为吗？当时大家都已知道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刘志丹同志和我们在前方曾经讨论和计划要率领陕甘红军出击以迎接中央红军，但朱、郭等又不许陕甘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这又是什么

意思呢？这难道不是帮助了敌人吗？再次，当朱、郭发动肃反的时候，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北上到了甘肃，既然知道中央红军要来，这么大的事情，又不等中央来解决，自己就动手了，这也是错误的。同时朱、郭在大会上发言中说他们当时已知道肃反是错了，既然错了，为什么不制止呢？为什么还继续捕人呢？可知这些话不是事实。最后就在肃反中采取指名问供和野蛮残酷的方法，朱、郭、戴等把人捉起来，不进行任何的调查研究，不重证据，只想拷打，虚拟出许多名字向被捕人提出，硬打得要他们承认是“反革命”，这种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次肃反的恶果是很大的，它使许多忠实于党的同志蒙受陷害，使许多创造苏区和红军的老干部蒙受冤屈并进而影响到红军发生很大的动摇恐慌，使红军的力量受到削弱，影响到许多地方的群众逃跑，使苏区缩小。不仅如此，更大更严重的危机还在酝酿着，如果不是中央到来制止与纠正这次肃反，其前途更是不堪设想的。这样大的错误和罪恶，到底谁应该负责任呢？我以为朱理治、郭洪涛应负第一等的责任，因为朱、郭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下不论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最主要的负责者，并在二十五军未到之前，朱、郭就已确定了这个肃反的方针，而在肃反的全部过程中，朱、郭都是主谋者。在这次会议检讨肃反问题中是完全证明了。聂洪钧、戴季英要负第二等的责任，因为聂、戴不但未能丝毫制止肃反，而且火上加油，协助朱、郭扩大肃反，当时聂在前方，戴在后方，都是坚决的实际的执行肃反的人。至于其他人，都是盲从者，但盲从者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虽是盲，但都从了，也应有责任的，应当在这次整风学习中好好的反省自己的错误。

五、肃反事件以后

中央来到陕北，及时的正确解决了肃反问题，认为这次肃反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均释放，给直接执行这次肃反工作的聂洪钧、戴季英二同志以处分。这时“左”的路线，已被中央纠正了。但朱理治、郭洪涛的宗派主义，并未停止，且在继续发展着。

朱理治、郭洪涛在中央来了之后，把真实情形隐藏起来，想尽一切方法，歪曲历史，蒙蔽中央。朱理治向党表示他曾创造了十五军团，郭洪涛却把自己描写成为陕北红军与苏区的创造者；另一方面，把肃反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聂洪钧和戴季英身上去。中央召开保卫委员会，当时郭洪涛是参加了的，但他没有讲一句老实话。当被捕的同志出狱后，中央又召开了活动分子会，在这个会议上郭洪涛还说“我是不赞成肃反的，我早就说肃反是错了”。中央召开两次党务委员会讨论被捕同志党籍问题的时候，郭洪涛一再坚持的说刘志丹和我们是右倾取消主义，说我们对反革命是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使得一九三五年党务委员会的决议中仍然说我们是有右倾错误的。当郭洪涛负责陕

北省委书记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时，仍在暗地里继续打击陕甘苏区过去的老干部，说这个无能，说那个不行，说这个曾经动摇，说那个过去右倾，于是把他们连降几级，一个一个压到下层去。一九三七年的苏区党代表大会，张秀山同志和我都没有出席的资格，而没有做过什么工作，但和郭洪涛要好的一些人却反而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郭洪涛仍是伪造历史，欺骗中央，当时曾遭受多数同志的反对，不赞成把他的名字列入边区党委委员的选名单上。这次会议之后，朱理治、郭洪涛又写了一个关于肃反问题的解释书，表明他们在这次肃反事件中是没有责任的。要负这次肃反责任的仅仅是聂洪钧和戴季英同志，并强制的要我和王世泰在这个文件上署名，企图以之来达到其继续欺骗中央欺骗党的目的。其后在一九三八年中央的两次会议上（一次在蓝家坪，一次在城内），郭洪涛的态度，一点也没有改变，不讲老实话，继续欺骗党。今年春天在枣园的座谈会上，郭洪涛还是没有丝毫自我批评精神，隐瞒了事实而吹嘘他的“功绩”。直到这次高干会的发言，依然千方百计的设法隐瞒真实情况，企图逃避自己在肃反事件所应负的责任。这样计算起来，郭洪涛对中央的欺骗和蒙蔽，已经不下十次了。此外，他还到处造谣、挑拨、诋毁党的领导，破坏负责同志的威信；对中央和西北局，表示不满，公开说中央“不公道”，说西北局有“宗派主义”；说这个同志如何如何，说那个同志如何如何；在这个同志面前说那个同志不好，在那个同志面前又说这个同志不好；利用某些同志政治上的落后，或曾犯过错误，进行挑拨，煽惑他们对党不满的情绪。像这样一类事实，真是举不胜举。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朱理治和郭洪涛虽是在中央正确路线之下，还丝毫不愿改正自己的错误，还在那里发展着他们的宗派主义。

六、结论

以上所述，就是西北党的历史发展的几个时期。从这个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甲）历史上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

从反帝同盟军成立后整个创造红军与苏区的时期，包括三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另一条是以黄子文、黄子祥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三条则是从杜衡到来，其危害也较轻，因为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很快的为党克服了，并且已经做了结论。但与“左”倾的斗争就不同了；与“左”倾的斗争时间很长，范围很大，其危害也极严重，并且至今还没有做结论。所以现在我们应该着重的来清算“左”倾机会主义。

根据以上所述的历史，可以明显的看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正确路线，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对立的。

首先在政治上，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以下各点：

第一，不了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的革命，必须以武装为主，以乡村为主。就是说，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以乡村为主要的斗争根据地。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他们“反对枪杆子万能”，就是说，反对以武装为主。他们“反对乡下党”，就是说，反对以乡村为主。他们抄袭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斗争的经验，强调城市工作与工人工作，就是说，主张以城市与工人为主。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不了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民族民主革命是要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因此必须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联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力量进行斗争。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反对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打倒一切，实行反富农政策，其结果就必须削弱革命的阵营。

第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与长期性。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这个特点，所以在经济政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反映到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同时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他们否认北方特殊，否认陕甘特殊，就是说，他们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因而他们主张两条道路的决战，就是说，他们否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幻想革命一下子就要在全国胜利。

第四，不了解敌我力量的对比。中国革命力量，经过多年的斗争是日益强大起来了，这是事实，然而反革命力量还是更为强大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了解此点，他们否认客观的事实，认为革命的力量已占绝对的优势，因而就主张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其次，在军事上，在革命战争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以下各点：

第一，不了解游击战问题。中国武装斗争的经验，完全证明了游击战乃是发展革命战争强大的革命武装的唯一正确战术。没有游击战这个正确战术，就不会有今天强大的革命武装。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他们咒骂游击战是“逃跑主义”，主张阵地战和平原战。在“肃清苏区中的白点”的口号下主张攻坚。事实证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这种军事路线，是只能断送革命武装的。

第二，不了解根据地问题。中国武装斗争的经验同样证明了根据地的建立不在平原而在山上，不在城市而在乡村。因为革命武装与革命战争的发展，离开山地与乡村就没有可能。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他们咒骂在山地和乡村建立根据地是“梢山主义”，他们总是想到城市里去。如果照“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做法做去，那么，根据地是永远不会建立起来的。

第三，不了解建军问题。中国武装斗争的经验同样证明了革命武装的建立，是与白军兵变和土匪运动不可分开的。最初总是由这些武装开始，然后建立党的骨干并与农民结合而成为革命武装，并由小的游击队而为大的正规军。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他们认为“武装斗争一定要群众运动发展到最高点”。所以对利用白军或土匪武装使之转变为革命武装的做法就认为是右倾，是“单纯兵变与土匪路线”，并反对游击队的所谓“游击作风”，希望游击队一下子就变成正规军。这些都是说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完全不懂得建军问题的。

再次，在政策上，在各种社会政策问题上，也都是错误的。

第一，对农民土地问题，实行一连串的极“左”政策。如主张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给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实行极“左”的查田运动，迟分几天土地就认为是机会主义等等。

第二，对同盟军问题是完全不懂得的。不要任何的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军队、民团、哥老会及各种中上层分子，统统不许接触联络与争取合作。

第三，对知识分子，不懂得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而采取严厉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

第四，对会门游民分子，不懂得争取感化与转变他们的必要，而采取消灭会门、游民的政策。

第五，对肃反问题，是夸大反革命力量，把有错误的革命同志与反革命分子混淆，甚至把执行正确路线的革命同志当做反革命对待，执行疯狂的肃反政策。

第六，对政权问题，是不了解游击运动中政权的特点，而要求这种政权要正规化。

第七，对边界工作不与中心区工作区别，在边界实行“左”的政策，造成严重的赤白对立。

第八，对白区白军工作方针，完全不懂得精干隐蔽与积蓄力量，而空喊白军哗变与地方暴动。

所有这些极“左”的社会政策执行的结果，就是把革命力量缩小与孤立起来，使党与革命力量受到削弱。而在另一方面，却正好是扩大了反革命的力量，帮助了革命的敌人。

最后，在组织上，在干部政策上，是完全不正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合自己“左”的口味的干部，无条件的拉拢，不合自己“左”的口味的干部，无原则的打击。他们对地方干部，不管这些干部如何忠实于党，如何与群众有联系，如何在创造红军与苏区斗争中有功绩，总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总是以钦差大臣的眼光排斥与打击他们。并且在提拔工农骨干的幌子下面，借口

成分问题来排斥有能力的干部。这些都是为了达到其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的目的，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斗争，经过一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以杜衡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杜衡的“左”倾机会主义虽然断送了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破坏了党的工作，但不久就恢复了。第二时期是以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虽然也给了党一些损害，但其以“左”倾机会主义统治党的企图，受到了抵抗，未能完全实现，所以给党的实际损害也还有限。第三时期则是以朱理治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朱理治的“左”倾机会主义虽然为时最短，但其对党的损害最大，因为这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统治了党。开始一个时期，军队还未统治到，但在十五军团成立与肃反事件发生后军队也受到了“左”倾路线的统治。这是“左”倾机会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期。

所有杜、郭、朱这三人的“左”倾路线，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路线，是三风不正必然产物。他们对政治军事民运党务及一切政策问题，不从实际出发，不进行调查研究的，而只凭书本上的教条子里的空想办事，是标本的主观主义。他们在党内排斥与打击优秀的干部，在党外又拒绝与一切同盟军合作，是十足的宗派主义。他们写文章发表议论，言之无物，夸夸其谈，是典型的党八股，我们从杜、郭、朱三人的“左”倾路线中非常明确的看到三风不正对党的危害，非常深刻的体验到三风不正是足以亡党亡国亡头的滋味。而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则不然，刘志丹同志之所以能执行正确路线，就是因为他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他对政治军事民运党务及一切政策之决定，一般的是从实际出发的。他的正确路线是从无数的失败的经验中摸索出来的，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虽然也还有缺点，还不是一个完整的马列主义，但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这是检讨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所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并对于目前我们全党进行整风学习是有实际意义的。

（乙）“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

过去陕甘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是否陕甘地区特有的现象呢？不是的，它是带有全国性质的。就是说，杜衡、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有来源的。其来源有两个方面：

（一）政治上的来源：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党内的关门主义与“打倒一切”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北方会议的决议。北方会议的决议，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有一种错误的估计，认为国际一切帝国主义都要进攻苏联，认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化西北，而国民党开发西北是要进攻苏联和外蒙。对当时北方革命形势的估计，也是过“左”的，如认为

北方已到了普遍创造新苏区的时期，提出反对北方落后论和特殊论的口号，认为北方不搞苏维埃运动就是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对二十六军的问题也有不正确的指示，如反对二十六军逃跑主义，要学平原战阵地战等。其后北方代表继续发展北方会议的路线，一方面认为陕甘苏区已超过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另一方面又认为陕甘苏区工作是一贯的右倾取消主义，特别在陕甘边要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北方会议的决议与北方代表的指示，以及苏维埃后期所谓“两条道路的决战”，“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等口号，都直接影响到陕甘，成为陕甘“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据和出发点。

（二）组织上的来源：就是当时党内的组织路线是有毛病的。如提拔干部不是以党性、实际工作经验及与群众关系等条件为标准，而是以会不会在口头上说几句马列主义词句为标准。是“本本主义”的干部政策，及至把这种干部提拔起来，又实行钦差大臣制度，委派他们以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的代表之名义，以“统治”某些区域党的工作。于是这些钦差大臣们，就是觉得自己有无上的权威，可以不管任何党的原则，对党的干部采取打击政策，以维持其“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从杜衡到郭洪涛、朱理治的“左”倾路线，都是与这种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有密切联系的。

（丙）革命家的品质

以上我们对过去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这一点已经指出了，但过去的错误不单是路线问题，还有个人品质问题。这就是说，由路线的错误，变为肃反的错误，其重要关键是人的关系，是朱理治、郭洪涛个人品质的恶劣所造成的。历史上犯错误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自觉的，一种是不自觉的，而朱、郭则是自觉犯错误的。这十天大会对于朱、郭错误的检讨，完全证明了这种论断。不然，以后路线正确了，为什么他们还继续做坏事呢？

历史的事实，证明朱、郭的个人品质是非常恶劣的。他们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一切不从党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其个人利益出发的。为了达到其个人主义目的，甚至不择手段，采取剥削阶级所惯用的手段，来对付革命的同志。其党性就可想而知了。同时，朱、郭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无论政治或军事，苏区或白区，党内或党外，这些方面的实际经验都是缺乏的。但他们还要自以为是，到处打听别人，以为自己是马列主义而别人都是机会主义。由于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历史上最重的错误。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鉴的。

另一方面再看刘志丹同志，他不但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而且他的个人品质，是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典型，他一贯的坚持党的立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在法庭上，在无数次战斗中，充分证明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他与

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非常熟悉群众的情况和要求，他能独立的识别方向，并为此方向百折不回的斗争。他能遵守党的纪律，又有高度的原则精神。他在这一切方面，都是完全合乎季米特洛夫同志所讲的布尔塞维克干部标准的，他有虚心学习的精神，一切是从实际出发，能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具体的运用于西北的斗争中。他不论对政治军事，苏区白区，党内党外，都是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的。特别在军事方面，他是有天才的。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刘志丹同志，应当把刘志丹同志做为我们前进的方向。

（丁）思想斗争问题

我们这次高干会的检讨，是反映历史上的一场大论战，也就一场大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有正确的思想斗争，也有错误的思想斗争。朱、郭的思想斗争是以错误路线来反对正确路线，是借思想斗争之名，来达到打人之实，这种思想斗争是错误的。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思想斗争是以正确路线反对错误的路线，是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的两条战线斗争，是治病救人的精神。这种思想斗争是正确的。我们党要反对前一种错误的思想斗争，而提倡后一种正确的思想斗争。这种正确的思想斗争，在目前对于我们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党里现时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斗争，就不能克服这种自由主义，就会使我们党逐渐腐蚀下去。因此，我们要提高政治嗅觉，以这次大会对历史问题检讨的精神，来展开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我们从这次对历史问题检讨中得到教训并应当坚决相信，正确的路线一定要胜利的，而错误的路线最后必然要垮台的。

（戊）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历史给了我们最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过去“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是脱离了实际，他们的理论是教条主义的。而我们呢？我们过去虽有实际经验，但缺少理论，还不善于把我们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以更好的抵制与克服错误路线。因此，历史的教训就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必须努力学习理论，有了理论才能使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才能抵制与克服错误的东西，为了学习理论，首先要学习文化和一般知识，因为没有文化和一般知识，就不可能学到理论。另一方面，一切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则必须到实际工作中去，取得经验，学会把自己与农民和枪杆子结合起来。必须如此，他们才不会重复历史上那种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样从两方面努力，使我们的老干部也好，新干部也好，都能真正学会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我党进一步布尔塞维克化的重要关键。

尾 语

根据以上检讨，我有下列几个具体的提议：

(一)对过去在错误肃反中一切被冤屈的同志,应当替他们申冤,脱去他们“机会主义”的帽子。

(二)请求中央取消过去认为被捕同志是“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决定。

(三)希望犯错误的同志痛改前非,继续为革命工作。希望其他同志本治病救人精神对犯错误的同志多加帮助。

(四)对所有到会同志,希望都能认识这个思想斗争,同时也是教育了我们自己,应该用这个精神来贯彻整风学习,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整自己和整现在。

(五)提议把这段历史做为干部教育材料。

这次会议对历史问题检讨,时间很长,开得很好,很有意义,解决了边区党的一个大问题。以后,我们必须在中央与西北局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弱点与缺点,以迎接我党当前的任务。边区党在全国是有特殊地位的,因此,在边区工作着的每一个同志,也是有特殊责任的。希望全体同志努力前进!

附:西北局关于高干会对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在中央未到前内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前),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同志对此问题所做的报告,并决定陕甘宁党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做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NextPage]

今冬工作中心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冬季一向是我们总结一年工作,布置来年工作的季节。今年冬季应当做哪些中心工作?应当怎样去做?这是环绕于我们许多同志心目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谈到边区的全部建设,一年以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是更加繁重和复杂了。但综合起来,仍不外乎民主建设、军事训练、发展生产、干部教育及文教工作这五大项。这些都是我们建设边区的长期工作。其目的都是为着战胜日寇,求得中国人民的解放。但我们进行这五项工作,并不是同时并重、分头奋进,而是在每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抓住一项两项,作为中心环节,用以推动全盘工作。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今年冬季工作的最中心环节究竟在哪里?我们把冬季应做的事情计算一下,为数实在不少。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冬季工作的重心,势必忙于应付,工作不能深入,费力多而成绩少。

我们各地同志埋头工作，又快一年了。在工作中，我们得到了什么成绩？这些成绩是用什么方法得来的？怎样才能发扬这些成绩？在工作中，我们还有什么缺点和错误？怎样去克服它？在工作中，我们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如何执行？如何理解？我们的工作作风还有什么毛病？有无强迫命令与形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怎样发生的？应该怎样纠正？工作有些什么困难？怎样去克服它？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忙了一年之后，应当利用冬季的空隙，很精细地加以思考和讨论。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一年来辛苦积累起来的经验，很好整理出来，以供改进工作之用。如果不这样做，把一年来自己做过的工作，不加研究，对于工作的成绩和缺点没有系统的分析，只有笼统模糊的印象，那么就没有办法发扬成绩和克服缺点；来年的工作一定会比今年更加繁重复杂；假若我们还是固步自封，那么对于党的工作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自己则有落伍的危险。对于这种危险，我们应当加以警惕，引以为鉴。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深刻了解西北局为什么有这样的指示：“各分区各县今年冬季均应以训练区作为最中心的工作，作为转变与推动一切工作的关键”。（见西北局关于冬训的指示）这就是说，今年冬季工作的中心环节，就是训练区乡干部。只有抓住这个中心环节，按照西北局指示的方法——不是教条主义的，而是与实际联系，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与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认真进行冬训，“把区乡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所反映的材料加以分析，综合与充实，区别优点、缺点，区别何者是模范例子，何者是坏的典型，又根据各县的具体情况，提出明年的工作计划，展开讨论，批评与修正，得出结论，使大家正确的认识工作的错误、缺点，接受经验教训，学习新的工作方法，去为明年的工作计划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和改造我们区乡干部的思想与作风，才能保证明年工作获得更大的成绩。

训练区乡干部，是今年冬季工作的中心环节。除此以外，还有几件重要工作，必须配合进行，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训练自卫军，特别是训练基干自卫军的工作，我们必须利用今冬农闲的机会，把自卫军特别是基干自卫军训练好。训练的方式不要形式主义，不要过分集中，而要切合实际，根据农村的分散环境，一般的以乡为单位，教自卫军学会打手榴弹、埋地雷、步枪射击，以及阻击埋伏等基本功能。

正因为自卫军里面，包括生产能手及乡村中的积极分子，所以通过自卫军的组织，我们可以推动其他各项工作，如：（一）自卫军不仅学武艺，而且还要学文化（识字、卫生），这样来配合冬季运动。

（二）在自卫军里面，可以检讨本村的本乡一年来生产的经验，变工变得怎样？杀虫、防灾等问题有没有新的办法？合作社是否为大家谋了利益？有无摊派股金的毛病？今年怎么办？去年选出的劳动英雄，

起了什么作用？有无不好的表现？今年应当如何选举？耕三余一做的怎样，有何困难？不解决植绵纺织等问题，行不行？明年的生产如何等。（三）发动大家对区乡工作提出意见，是否有强迫打骂现象？工作中有无只追求数目的形式主义？应当怎样纠正这些毛病？群众对于这些毛病应采取什么态度？干部如何倾听群众意见来纠正自己的毛病？

只有认真进行冬训工作，才能消除领导上与群众一些隔离的现象，使我们的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完全打成一片。

以上所说今年冬季的工作，望各地领导同志，切实注意根据当地情况，适当地配备干部，很好地配合各项工作，并按时检查，总结经验，向下传达，向上报告。

党在春耕运动中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四日）

对于发展边区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春耕时期，已经到来了。今年春耕与往年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经过了高干会，使党政军民对生产运动的注意更加强了；就在于政府实行了大量的农贷与移民，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土地上去；就在于劳动英雄的辈出与生产竞赛的发动，使广大群众的劳动热忱更加发扬。加以最近全边区都落了雨雪，春耕的进行可以格外的顺利。这些都是今年春耕中有利的条件。然而决不能以为有了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坐待胜利到来了。今年春耕是否能完成预期的任务。除了天地条件外，最基本的将决定于党政军民的具体领导。但是这个认识还不是在所有同志中都已经普遍了的；相反的，在我们不少同志中，还有一些很错误的看法。我以为下面三种错误看法，是目前特别需要纠正的。

第一：有些同志想：“群众自己懂得种庄稼，这个又开了高干会，大家情绪高得很，党何必去找麻烦呢？”所以他们觉得不必去领导，可以睡觉去了。他们不了解群众虽然懂得种庄稼，但要是让群众停止在现有的生产水平上，要是党不努力提高这个水平，则今年的增加八万石细粮，扩大十五万亩棉田，以及发展运盐、组织合作社等生产事业的计划，就不可能完成。为要实现高干会发展边区经济的方针，党就必须做一大串的工作。党应该发动农村和部队的领导，像吴满有、申长林那样，不但自己站在生产运动的前线，还要以自己的社会关系，去推动与组织周围的群众积极生产，使生产运动的洪流有确实可靠的基础，党应该经过支部和党员，去帮助每家农民制定今年的生产计划（如开多少荒，增加多少粮，增种多少棉花，纺多少线子，增多少羊只猪仔等），要他们把这些计划逐条贴在脑上，以便跟上计划生产。党应该调查群众有什么闲难，并且实际解决这些困难。党应该利用一

切可能，以党员为核心，像申长林那样组织农民在生产中自愿的变工，使每一村庄所有的劳动力都能充分发挥。党应该发现每一地区的劳动英雄，把他们的姓名事迹在群众中广为宣传，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同时动员社会群众舆论来反对好吃懒做，不学生生产的二流子，以提高农民的生产情绪。党应该仿照吴满有与杨朝臣的例子和延安县与安塞、志丹县的例子，在群众有真正的自觉性与可靠的积极分子作骨干的条件下，发动户间，村与村间，乡与乡间，连队与连队间的生产竞赛运动。并使这种生产竞赛有一定的目标，具体的计划，和确切的领导。不要只图表面好看好听，幻想只要到处提出了竞赛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没有持久的领导恢复，它一定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党还应该保证党政军民各部门在春耕期间少开会，少动员，对于运盐工作也要适当的调动人力，以免违误农时。从此一切工作，都是为保证今年生产任务的完成所不可缺少的。因此那种以为生产可以顺其自然，用不着领导的保守观点，是完全错误而必须立即抛弃的。

第二：有些同志想：“我们的生产计划已经做了，县上区上活动分子的生产动员会也开了，任务都分配下去了，因此，一切都没有问题了。”这些同志不知道开会订计划，虽然是领导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工作，但这绝不等于完全领导了生产运动，因为开会订计划只能表示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并不等于已经做了什么。要使这种计划变为实际，就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说，需要把我们的计划拿到群众中去讨论，由群众来感觉这些计划是否合乎实际；需要群众完全了解和接受我们的计划，使基础为群众自己的计划；需要定期检查计划的执行程度，看是否发生困难，并研究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需要随时调查研究运动发展的情况，并总结经验，以便选出好的例子，纠正坏的倾向等。在这里，特别需要讲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使群众实行我们的计划，和学习先进的经验呢？有的同志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他的法宝就是开会，就是写指示。但是他们碰了钉子以后，就埋怨起群众“太落后”，埋怨起高干会的群众“太主观了。”他们说：“农民不愿变工，不愿纺线运盐，没有办法。”他们没有看到所倡导的变工，纺织运盐等，都是对群众有利，并为许多群众烈属都愿实行的事，而有些群众所以还表示迟疑，则正是这些领导者自己的工作，不深入的原故。正确的领导，主要的应该是经过群众的认肯，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深信不疑，乐于跟上先锋队的脚步。我们试看：刘建章的合作社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他既不是一个人心血来潮，凭空订出个计划，也不是依靠什么公式化的“动员会”，公式化的“宣传”和“组织”。他是根据各种具体情况提出具体办法，用实际的行动从小范围内做起，让群众亲眼看见了好处，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他所领导的南区妇幼，是从移民李国泰老婆一个人身上开头的；李国泰因老婆纺织得

穿上一身新的芝麻呢，这就是刘建章的唯一宣传队，而结果证明这却是最有力的宣传队。同样，南区的运输队，也不是在窑洞里开会开出来的，这是他一个人一个人的“瞅目标”，制定了像刘永洋、冯世英出头有经验有办法的脚户，让他们自己由经验证实了合作社合作运盐的厚利，再由他们来拉其他脚户参加，这才发展起来的。再如申长林向党提出组织变工队的计划，这个计划又是怎样的呢？申长林并不想到群众中去大吹大擂“号召”组织变工队，这样的号召是不会在群众中生根的，他只打算由他自己，他的兄弟，他的姨兄，他的“伙子”，他的伙子的丈人和保人，和他同小组的一个党员，以及这个党员的兄弟，由这样几家人先动手干起来，才能够真正说服群众，才能够真正完成任务。因此，反对那种对领导工作简单化的粗枝大叶的做法，学习刘建章式的具体领导，就成为党在领导今年春耕运动中的一个成败的关键。

第三，有些同志把春耕和整个生产运动看做是可以和和平平的进行，而不会遇到什么阻碍的。他们忘记了整个边区是处在抗战环境中，他们把春耕的工作孤立起来了。他们忘记了春耕也和其他的工作一样，一定包含着许多斗争，不但要与党和群众中间许多错误观念作斗争，并且还要与边区内的敌探汉奸，及其他破坏分子作斗争。对于破坏分子我们是万万不能睡觉的，胜利的春耕，是和消灭这些破坏分子的活动分不开的。最近安定、延安、郃县等地已经发现这些破坏分子有计划的散布“移民就是扩兵”，“扩军就是扩兵”，“今年运盐比去年重几倍”等反动的论言，在别的地方一定还会继续发现。破坏分子的这些谣言虽说荒唐到愚蠢的地步，但在一部分落后群众中，还是可能产生某种影响，减弱他们的生产情绪。因此，各地党必须有足够的警惕性：如在春耕中发现这类谣言与其他破坏活动时，必须一方面揭穿这些谣言，使群众不受其欺骗；一方面迅速调查追究破坏者，把他们的面目在群众面前暴露出来，并予以必要的制裁。这是春耕运动胜利完成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些问题，就是党的实际问题，我们同志们思想与作风的进步以及党与群众更加密切的联系，都要从这些实际问题上具体表现出来。

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

春耕领导的两个典型 与安塞二区六乡乡长和志丹一区一乡支书的谈话 (一九四三年三月)

《解放日报》按：四月廿八日，高岗同志在赴志丹县的道上，乘休息之余，找了当地的区乡干部进行春耕工作检查性的谈话，虽然谈话时间短促，但内容甚为丰富。兹由鲁直同志将高岗同志与安塞二区

六乡乡长马彩旺同志及志丹一区一乡支书姬海潮同志谈话的记录，整理发表，以供各地春耕工作领导上的借镜。从这两个乡级干部的谈话中间，可以看出春耕领导的深入与否。

（一）与安塞二区六乡乡长马彩旺同志的谈话

高问：你们现在做些什么工作？

马答：在区上开会时，讨论了今年的两大任务——生产与教育。我们乡政府也就照这个讨论去做，目前中心工作，就是春耕工作。教育工作还没有开始啦。

高问：春耕工作你们怎样领导，现在做得如何？

马答：今年春耕我们抓得紧。全乡共有二百二十一个劳动力，区政府计划我们六乡今年要开荒二千零八亩。在春耕未开始时，我们就动手把这两千零八亩荒地，和每家每户商量，做了春耕计划。县上发来一种农户生产计划表，照表每家去调查，写成计划后，给老百姓留一半，一半存在乡政府，老百姓就照计划做，我们就照计划检查（说到这里，马彩旺同志把一本很厚的铅印计划簿子拿出来，兴奋的说：“就是这个，你们看对不对”）。另外我们在每一个农村里，推举了一个热心积极生产的人当生产组长，他的主要任务是监督二流子参加生产。因此，我们乡的二流子大部分都在转变的过程中。

高问：你乡二流子是怎样转变的？请你说一说。

马答：好，你不怕麻烦的时候，我可以一个一个的给你们说一说，全乡共有七个二流子，今年是把他们抓紧了，现在大部分都开上荒了，计有：

一行政村宋家洼沟村的二流子李开元，以前就很懒惰，后来老婆死了，就完全成了一个二流子。过去他还当过战士，后来落了伍，有些兵痞味道，天天东家，西家，今天不管明天，吃一顿，搞一顿，又染有不良嗜好。今年定要他开荒十亩，告诉他再不能当二流子了，他不大愿意，后来他说没有镢头，政府就给借了一把镢头；又说没有土地，政府又给他了土地，又讲他没有食粮，政府又给他调剂了粮食。问题都给他解决了。这时候他就没话说了，只好儿子给人家揽了工，他自己在家开荒，三个牛工，他的十亩荒地估计是可以开完的。该村还有两个二流子，一个叫白德玉，一个叫刘锁子。这两个都是败家子弟，从来没有劳动过，住的又是近川畔，来钱比较容易，这两个人也都有不良嗜好。今年乡政府给白德玉地指定六亩。刘锁子指定也要开荒十亩。现在白德玉完了，又用人工变来四个牛工，准备开荒。刘锁子现在当过二流子比较顽皮些，转变得不快，我看主要因为他，庄稼，逛游逛荡，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孩子，他也不管。今年乡政府指定他也开十亩荒地，他心里不愿意，后来逼得紧，他说没有镢头，政府就给他借了一把镢头，现在开过荒地够三亩，还种了二垧熟地。

武家圪台二流子胡生熬，是最难搞的一个。他在旧社会里当过豪绅，又有不良嗜好，又有杨梅疮，一叫生产，就说有病，现在还没有动手。贺家圪二流子刘子谦，才二十多岁，是个没有老婆的光棍汉，又当巫神，曾在旧社会里靠神吃饭，幸而他还没有洋烟瘾。今年禁止他当巫神，劝他好好生产，现在他和他哥哥一犏牛。这人还有志气，已经开过十五亩荒地，转变得还快。

暖水泉二流子师海玉，他有嗜好，又好耍牌。他有老婆和两个娃娃，衣裳都穿不上，今年我痛痛的把他指教一顿，说得他下了决心，现在变来八个牛工，已开过九亩荒地。前天我去检查时，他说：“乡长，请你放心，我保险完成，我不当二流子了。”

咳！二流子的道理多得很，心眼很稠，你要把他说得没法抵赖，他就再不好“流”了。在这七个二流子中间，五个有嗜好，一个巫神，一个豪绅。现在他们都开始转变上了，以后还要经常监督，否则他明年可能再流起来了。二流子转变的情形就是这样。不对的地方，请你指示。

高岗：二流子你们抓得紧，都要以后教育他们经常下去，不要再犯二流子病。请你再把变工队和运盐队的问题讲一讲。

马答：变工队我们没有像二乡魏家塔（见四月二十三日本报）那样的去搞。但是小变工是做了，如二流子的牛工变人工，就是我们宣传去变的。这个工作，在开荒时我们没有做，在锄草时，我计划要组织七个村工队。这件事一定要搞起来，再不能放纵了。

再说到我们组织运输队的事情。今年区政府给分配了我们八百二十驮公粮，一百八十驮食盐，任务很大。我们全乡统计共有长脚牲口四十六个，里面有十一个驹子，只有组织运输队。乡上人都说：“刘主任能那样干起来，咱们难道就不行吗？”大家纷纷议论，后来有些人说：“干吧！”起先资本有些困难，我们要求得南区合作社投资三万元，再到本乡公社代金内抽了十四万元，其余群众自己入股，至多一人有六万元股金的。现在一月多时间，约了一百万元股金。群众自己商议，定名“民办社”，内设正副两个主任，一个管账先生，一个运输队长，都在群众中自己选出来的。现已买到三十一个牲口了。全年计划运输九次，不足之数，在七八月间再动员私牲口运一两次，这样全部公私任务就可以完成了。

高岗：这样组织运输队和民办社，群众愿意吗？

马答：愿意得很，没有费多少工夫，就搞起来了。主要原因，我估计是这样的：群众自己办，公家来帮助，干部是群众自己的，群众都相信。再就是南路运输队上下当当走，给了群众影响。大家都说：“人家做得好，我们为什么做不起来。”

（二）与志丹县一区一乡支书姬海潮同志谈话

高问：你是哪里人，现在光景怎样？

姬答：我的老家是横山县人，到志丹县很多年了。我分得土地十多垧，得到革命的利益，现在住在一麻地坪，光景过得还可以。

高问：你乡共有多少村？多少人口？多少劳动力？

姬答：你把我问住了。共有五个行政村，约一百七十多户，人口我不清楚，劳动力我和乡长都没有统计，大约二百多个吧，我不敢肯定说。

高问：你乡共种多少地，今年计划开多荒？支部怎样领导今年的春耕？

姬答：共种多少地，我不清楚。全年多少荒地，乡长知道，大数是五百多亩，支部是宣传动员过今年农耕的。

高问：你们开过会没有？开会时你怎么讲的。

姬答：我们开过会，我说：“今年我们两大任务是生产和教育。”我说：“大家要好好生产，大量开荒”。有些人说：“没有草料种不过。”有些人说：“种上谁来锄地。”

高问：你们今年发动春耕竞赛运动没有？

姬答：发动过，我们一乡和二乡竞赛。

高问：有些什么条件？怎样赛法？

姬答：没有什么条件，就是说，我们要开十来垧荒地。（笑）

高问：你乡有多少二流子？转变了没有？

姬答：大概七八个吧，一家一家没有调查，二流子好好转变，今年都要生产。

高问：现在究竟转变了没有？是哪些二流子？

姬答：宣传了。转变了没有，具体的情形还不清楚。（笑）

高问：你乡共运多少盐？怎样运法？

姬答：不记运多少。区上说要大量组织运盐队，公家都收了代金，准备动员群众牲口去运。

克服春耕运动中领导上的弱点

（一九四三年四月八日）

高干会后，各地春耕运动热烈展开；在农村和部队中，竞赛浪潮高涨，劳动英雄不断勇现。自三月十二日西北局发出关于加强具体领导春耕的指示，党政军的各级许多负责同志，均亲自深入农村，深入部队，帮助下级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他们不仅正在积累着领导生产的经验，掌握着领导生产规律，而且也正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改进着工作作风。今年的春耕运动，无疑都获得了不少的成绩。然而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在春耕运动中，还存在一些领导不够深入具体及形式主义的现象。

首先在生产计划方面：今年各分区、县的生产计划的订定，大都经过对情况的考察和干部会议的讨论研究，不仅估计到那些事应当办，而且也考虑到那些事是否可能办到的具体条件。一般地说，今年的生产计划，是比较切实具体，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可是在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在订定生产计划时，满足于任务的提出和数目字的规定，而没有定出实现它的具体步骤，有了计划以后，便以为万事大吉，从上到下把数目字分配下，从分区、区一直分配到乡，都有了计划，可是对于怎样帮助每一农户来制定目的计划则往往未加注意。有些干部不管农户的条件和愿望，而硬要代他订一个计划，这样的农户计划，是不会有什用处，甚至会起相反的副作用。其实每一农户对于自己的生产，本来是有打算的，如开几垧荒、种多少地、养几个猪等，只要我们和他谈通了，扼要的把他们自己所说的记下来，并和他们商量一下，那些项目可能提高一些，某些困难如何得到解决，告诉他们一些增加生产的具体办法，这样订出来的农户计划，是农户自己所心愿的。有些地方农户计划搞得不好，并不是这样办法不好，而是由于自己的工作作风有毛病。有些同志还以为了解，如果没有农户计划，那么我们领导机关所订出的生产计划，一般的生产方针，变为群众自己的计划。至于农户计划的好处，西北局的指示已经说过，现在再引一段合水县委书记的话，来说明它：“作农户计划，不仅是一个群众性的宣传教育，而且在实际上能够提高生产刺激群众生产，增强干部完成生产任务的信心。比如当二乡布置生产工作时，支部的同志，乡长和行政村主任，对开荒六百五十亩、运盐一百七十驮的计划，信心很差，他们认为全乡只能开荒四百亩，运盐四十驮，但是当我们一百六十九亩计划作成后，总计可开荒一千三百一十七亩，运盐一百驮，这样一来，干部的信心提高了，县长也说，开荒不难，就是运盐”（见解放日报十三日载李子川同志谈农户计划）。

其次，在奖励劳动英雄方面，各地劳动英雄的涌现和生产竞赛的开展，对于春耕生产的大力开展有推动作用。例如安塞县生产动员大会，奖励了劳动英雄杨朝臣、张万库，不仅给他们以荣誉，而且奖了他们两条耕牛，同时在动员大会上还惩处了二流子师保锐，这一光荣和耻辱的对照，特别是奖励劳动英雄两条牛的奖励，传遍了安塞，打动了每一劳动农民的心，使他们感觉到劳力生产，有名有利；而安塞的同志们又能利用这一具体的事件，来推动群众的竞赛。如在该县四区某乡发动了全乡人民向所谓二流子村的刘庄竞赛，因而，大大的激起了刘庄全村人民的生产热情，参加竞赛；在延安、延川、固临等县，也还可以举出这类生动的例子。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有些县还没有发现和奖励劳动英雄。有些县奖励了，可是没有用来推动群众竞赛。有些地区竞赛是开展起来了，表面上很热闹，可是没有深

入群众，在群众中打下坚实的基础。有些同志把竞赛看作只是劳动英雄的竞赛，而忘记了奖励劳动英雄和提倡竞赛，是为了鼓舞群众热忱，使他们卷入生产竞赛运动中来。有些同志把注意力放在上层领导机关之间，如他们为提出分区间的竞赛条约，而不估计划分区间的状况是无法定出竞赛的统一标准，也不估计划分区间领导机关相互号召，是不能起动员群众的实际作用的。

还有，在组织劳动力方面，各地劳动互助的组织纷纷成立，大大促进了劳动的效率，如在延安，变工每人七天即可开一垧荒，而不变工的要十天；在安塞，变工每人八天即可开一垧荒，而不变工则需要九天，或十天。有同宜耀，一天每人只开荒三分，五人组织起来，一天就能共开荒二亩。劳动互助既然有这样的好处，为什么有些地方已经实行，有的地方还没有搞起来呢？这并不像有些同志所说的“当地群众没有变工的习惯，春耕时期用不到变工，锄草时才需要去组织，”等等。真正的理由，还是领导是否具体。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引延安柳林区念庄阳背庄的例子一下。背庄的劳动力和畜力都胜过阳庄，前者有二十一个劳动力，后者有十二个劳动力，六犏耕牛，可是阳庄的党员能够起核心作用，耐心的向群众讲解变工队的好处，于是变工队组织起来了，我们的同志模范的作用，使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没有一个人耽误过工，上午耕地，下午还用人力刨梢、开荒，这样紧张劳动的结果，除了耕种原来地以外，新开荒一百垧的任务，已经有了把握完成。在背庄，情形完全因为没有具体领导，变工队组织不起来，有的有了人力，没有耕牛，有了耕牛，人力不够，力量不集中，劳动情绪不高：天天高叫“完成任务是一个月的时间很快的过去了，而开一百垧荒的任务”已经是没有方想的了。这个事实，证明具体领导，是党在领导春耕运动中的一个成败关键。领导如果不具体，劳动互助是无法组织起来的，即使组织起来，也是表面，甚至发生相反的作用，如在新正马栏一乡，曾发生集体劳动的形式低于个体劳动的事情。

为什么在春耕运动中还存在着领导不够深入具体及主观主义的现象呢？这是由于有些同志还没有深刻了解西北局指示关于具体领导的真义。这个真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领导与群众密切结合的问题。

我们的生产计划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研究和综合群众生产实践的经验，并根据当前的情况订出来的；如合作社，劳动互助等等，都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而是老百姓中间已经有了这些东西的萌芽，我们把他“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和整理，规定目前任务，指出发展前途。因此，我们的生产计划，必须是从群众中间来的，必须从总结群众生产实践的经验中产生出来。而领导者的责任是在于不断的抓着

普遍运动中的典型例子，研究和总结它的经验，并及时把这些经验推广到普遍的运动中去。

生产计划制定之后，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组织群众去实现这一计划。例如一县的生产计划制定以后，想着就必须有一个系列的大大小的计划，不仅区县要有计划，而且还要帮助乡村节制定它的生产计划，帮助他们自愿的组织变工队，发动户与户间，村与村间，变工队与变工队之间的竞赛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计划变成群众自己的计划，才能使我们的计划和群众亲密的结合起来，发挥它的力量。可是，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而是极其繁重复杂的组织工作。它需要脚踏实地，周密细腻的作风；我们再不要保留有了生产计划，便可高枕无忧的观点，而要想出种种办法，使我们的计划能够成为农户生产计划的坚实基础；我们再不要把竞赛运动的重点，放在上层领导机关身上，而是要把它放在直接参加生产的个人农户、村庄和连队身上；我们帮助农户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再不要把我们凭空想像的计划，硬套在农民的头上，而是要细心的启发他们，从他们已有的生产基础上提高一步；我们再不要对竞赛运动采取草率随便的态度，而要实事求是，认真考虑竞赛的目标和条件，是否适合于双方的实际情况；我们再不要像延安县柳林区念庄的背庄那样空喊口号，无益于实际，而要像阳庄那样具体领导，组织变工队，保证完成任务。

总之，在订定生产计划的时候，必须估计到群众生产的经验和可能条件；在实行生产计划的时候，各地同志必须深入群众，随时检查，吸收新的经验，发扬好的例子，批评坏的例子，并在党报上发表，以供大家参考。只有检查，才能发现缺点和错误，加以克服；只有检查，才能发现成绩和经验，把它推出去。这不仅是为目前推动工作所必需，而且也是为了和交换我们领导生产的经验。这就是春耕运动中领导与群众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

现在清明已过，春耕时间只剩下一个月多了，各地同志必须抓紧时间发动群众努力耕种，以保证今年生产任务的完成。

向刘志丹同志学习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日)

刘志丹同志逝世七年了。我和志丹同志前后共患难十年。志丹同志忠心耿耿，艰险备尝，为党为国，十二年如一日，其革命毅力和伟大气魄，至今回忆，犹历历在眼前。

志丹同志是陕西保安人。于民国十三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十四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大革命时代，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处处长，积极参加了反北洋军阀的战争。大革命失败以后，在白色恐怖下，奔走于鄂皖陕诸省，屡谋起义。民国十七

年，与唐澍、谢子长等同志，共同组织了陕西省渭华起义，同年在保安团聚革命力量，打击了贪官劣绅。“九一八”事变起，志丹同志鉴于民族危急，和谢子长等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民国二十一年初，建立红二十六军，因遭叛徒杜衡陷害，于廿二年夏，全军失败于终南山地带，旋与王世泰同志等数人化装潜回陕甘边区，重新恢复并扩大红二十六军，组织陕北、关中、陕甘等三路游击队，更加推动了土地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创造了陕甘边苏区，先后粉碎陕甘宁晋绥五省反革命军队的“围剿”。志丹同志被公认为西北党和西北人民最好的领袖。他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他深谙战争的艺术，特别擅长于运动战和游击战争，是西北党的军事家。

民国廿五年，志丹同志奉党中央命令，率部东征，北出葭吴，由神府渡河南下，击败了黄河两岸阻挡红军抗日前进道路的军队不下数十营团，威声大震，不幸于同年四月中旬，志丹同志在猛攻三交坚固工事的战役中负伤阵亡。志丹同志之死，实是我西北党的重大损失。

志丹同志在十余年奋斗史中，曾经屡次失败，然而他一心为党为国，从不灰心。记得当渭华起义失败于华山终南山地带时，反革命势力顿显猖獗，到处屠杀工农青年，一些未经过实际锻炼的知识分子，灰心动摇以至于投降反革命，而当时志丹同志等，不屈不挠，继续与反革命作无情的斗争。记得民国十九年，志丹同志在彬县遭军阀苏雨生逮捕，在反动的法庭上志丹同志坚持革命气节，抵抗反革命的审判。当他被严刑拷打，逼供“里面到底有多少共产党员”时，志丹同志顽强的回答道：“只有我一个”。反革命把他加上重镣囚禁于监狱，当我去探问时，他笑着说：坐监狱等于休息罢了。在监狱中，他仍暗中策动同志继续革命工作。当反革命一度判决枪毙他的时候，他毫无畏惧，并委托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保同志，叫他自己小心。”我还记得在准备打击张廷芝时，志丹同志把全付精力贯注于争取战争的胜利，路过家门而不入。我还记得当反革命把志丹同志全家捣毁的时候，志丹同志闻讯后丝毫无动于衷。这种公而忘私，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的品质，是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

志丹同志不仅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而且与广大群众有着最密切联系。他善于接近群众，关心群众的利益，倾听群众的称呼：“咱们的老刘”。在革命战争时期，西北人民每遇刘志丹部队到来，纷纷开门迎接，慰问备至。志丹同志还善于同兵士打成一片。他经常找兵士谈话，关心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情绪，兵士们对他毫无隔膜，称他为“我们的老刘”。志丹同志的无数轶事至今十传百、百传千地流传

于陕甘宁民间，就充分地表明了志丹同志与群众的联系密切，达到何种程度！

志丹同志是西北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一贯地代表着西北党的正确路线。他曾经反对叛徒杜衡等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城市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曾经停留在喊口号、贴标语、闹学潮、游行示威等等有害的斗争形式上面，而不知深入农村组织武装力量，于是一批一批的青年学生被反革命屠杀监禁。志丹同志当时批评这种斗争方式说：“这等于蒙古人向喇嘛跪求布施。”志丹同志之所以这样批评当时旧的斗争方式，因为他从多次失败与胜利的战斗中，逐渐体验了“枪杆子和农民结合起来”这一真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要靠枪杆子，枪杆子要靠农民。因此他号召同志们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西北党内曾经有人反对志丹同志，说志丹同志这一主张是“机会主义”。事实证明：志丹同志的方向是正确的。志丹同志的方向是西北人民的方向。而反对志丹同志这一方向的，恰恰就是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后来这些人中的多数都成了革命的叛徒。

志丹同志曾就学于陕西榆林中学，品学兼优，毕业时考第一、二名，深为师生器重。后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考第五名。他的智力胜人，善文能武，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革命斗争的知识，但他从来没有自骄过。他虚心向群众学习，眼睛向下，因此他的工作作风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为人则沉默寡言，长于思考；对待干部大公无私，克己待人，豪爽，诚恳，坦白。

当志丹同志临死时，还给我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即志丹同志艰苦的精神。他除遗给我们的革命财产——边区而外，自己只剩下一个破被褥，一身破大衣，一个纸烟盒子，六根纸烟和几份被翻得烂熟的党内文件。志丹同志一生为党为革命奋斗，从不想到个人利益。他不计较职位的高低，工作的轻重，党派他做任何工作，无不赴汤蹈火以完成任务。他胸襟宽大，坦荡自如，大公无私，遵守党的铁的纪律，是我党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志丹同志逝世七年了，今天纪念志丹同志，我们要向志丹同志学习：学习志丹同志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学习他同群众密切的联系；学习他的艰苦和遵守党纪的模范。

志丹同志逝世七年了。我们秉承志丹同志的遗志建设边区，坚持抗战，巩固与发展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志丹同志虽然死了，然而志丹同志生前的战友和全党同志及西北千百万人民仍继续着他的事业。

志丹同志精神不死！

向志丹同志学习！

**在延安县民众反对日特国
特动员大会上讲词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

同胞们！同志们！今天早晨到各个山坡的大坪上，看见你们精神抖擞的上操，也看见你们一队队打着旗，扛着枪，背着背包的雄纠纠的自卫军，走进蟠龙镇。现在又来参加你们的大会，使我很高兴。我们开这个大会，是为了反对日本和国民党的特务，这些坏种破坏我们的边区，破坏我们的生产，他们是奉着日本和国民党内反动派的使命来的。你们知道国民党里有很多汉奸，那个什么副总裁参政会议长，叫什么汪精卫的家伙，现在到哪里去了？（台下高呼投降日本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跑了二十几个，司令军长师旅长跑了六十个，他们还带了好多万军队投降日本了，这是已经跑过去了的。还有许多坏种暗暗的躲在抗战阵营里，就是这些坏种，派了好多特务，来破坏我们的边区！（台下高呼消灭特务……）这些人你们说好不好？（不好！）假使我们办的事不好，做的事不对，派人来破坏还有话可说，那么，现在我来问一问你们：过去鸟阳区、金盆湾、姚店子这些地方有土匪没有（有！）现在呢？（没有！）难道我们消灭了土匪，消灭错了吗？

（没有错！）宋应昌、薛生华这些压迫老百姓的土豪劣绅的土地分给谁了？（分给穷人！）穷人有了土地有了牛羊种地过好光景，好不好？

（好！）现在当乡长当区长的是些什么人？（都是老百姓）这些人好不好？（好！）我们发动大家纺纱，开荒，翻熟地，多锄地，安毛坑，多打粮食，穿好衣，吃好饭，禁止抽洋烟，禁止赌博，教育二流子也生产，这些没有错吧？（没有错！）照这样说来共产党是不是替人民办好事的？（是的！）国民党委派的宋应昌、薛生华办过这些事没有？

（台下高呼：没有！）我们打日本救中国，但人家还要来破坏我们，应不应该？（不应该！）那么为什么要派人来破坏？（台下齐声高呼：他们混蛋！）反对特务应该不应该？（应该！）既然应该反对，我们就要有反对的办法，过去人家打明枪我们看得见，现在特务躲到里面来撒坏种子这就不容易看清楚，因此现在我们要开大会，要大家注意这些坏种，坚决肃清这些坏种，大家还要明白国民党反动派的目的，是想把边区消灭掉，好安然自在的宰割人民投降敌人。吴满有说得对，我们老百姓给国民党养了几百万军队，原在保国安民，现在他们不把军队带去打日本，反回过头咬主家，真是岂有此理！（高呼：拿起武器，打死疯狗！）

大家还记得吧，民国十六年大革命失败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清党”和十年内战中屠杀了几百万共产党员和老百姓，又十二事变时，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捉住了，共产党为国家民族着想，不记前仇，力主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回去，因此蒋介石才免得一死，

但是在抗战以来的六年当中，国民党反动派的领袖仍是以怨报德，千方百计的想危害我们，而且越来越毒辣，派特务调军队来抽我们的后腿！（台下高呼：反对抽后腿的！）大家再看我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了三十五万日本军队和极大部分伪军，蒋介石这几年来不但不发一个钱，一颗子弹，一寸布，反而把边区封锁起来，这叫什么道理？（汉奸道理！）这算个什么人！（不算人！）这样的边区能不能取消？（不能！）为什么？（共产党办事好！）该取消的是国民党特务，你们看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如像神木府谷榆林横山，这四个县（实际上只有三个县，因其中有一部分地方是归边区管辖的）年年年成不好，又是些沙子地，可是去年国民党征收了十万石公粮，每石公粮下面，还要挂一千斤干草五斗黑豆五斗麸子，折合起来就等于二十万石公粮，这些地方的老百姓简直没法生活下去。河南饿死了好多万老百姓，还有一千多万老百姓将要饿死。甘肃、伊盟老百姓包括蒙民回民都没法活下去，逼得他们造起反来。贵州四川有好几十万老百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横行暴敛，老百姓说“房子是军队的，土地是保长的，养下个女子是工厂的，养下个小子是老蒋的！”大家看老百姓对国民党愤恨到什么地步！

你们想想国民党反动派是实行什么样的三民主义？过去延安也有国民党党部，他们给你们计划过什么生产没有？（没有！）那时你们有权没有？（没有！）是的，这就是边区过去的情形。现在的大后方呢？也还是是大多数人没有丝毫民主权利的，只有那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特务机关横行霸道无所不为，这就是他们所实行的“民权”主义。过去你们这地方谁的土地最多？（宋应昌、张家来的最多！）他们给你们减过租吗？（台下喧哗，有的回答说减什么租，欠下的租还要加息。也有的说，种一辈子的地自己吃不饱还不上算，总还是欠人家的。）对了！边区过去的情形就是如此。但现在国民党大后方的情况并不比这好些，大多数农民没有土地，被剥削压迫得要死，这就是他们所实行的“民生”主义。不少司令军长中央委员都投降敌人，最近欢迎汉奸吴开先回到重庆，和敌人勾勾搭搭；对国内少数民族采取欺骗压迫剥削的政策，最近。把蒙古的沙王赶得到处逃生，这就是他们所实行的“民族”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好不好？（台下齐声高呼：不好！）那么什么是好的呢？（台下高呼：毛主席好，共产党好！）是的，只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真正为全中国人民着想，到处为咱们老百姓着想，边区老百姓在毛主席领导下，光景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台下高呼：拥护毛主席！）我们在边区发展生产实行民主，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之下坚决的打日本，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这些都得到了全国以及全世界的同情，引起了大后方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因此国民党内反动派就千方百计的想消灭我们，

他们派军队包围边区，从经济上封锁边区，这是大家看得清楚的，但还有一个毒辣的办法是大家不大知道的，这就是特务的破坏，现在大家来看这些破坏的事实吧！

首先就看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杨志功、黄流在你们这个地方是怎样进行破坏的。第一他们拿着上级的名义，利用感情拉拢某些比较幼稚的共产党员，如他们给崔树贵找了一个老婆，给在病中的鲁世曾送了一斗麦子，在新文字训练班故意给史云才打一百分并答应提拔他当乡长。第二，等到感情拉好后他们就准备圈套来进一步的利诱威胁，如对崔树贵史云才等说：“我们都是知心人，做朋友要做到底，现在时局不对，国民党就要占领边区，那时要杀掉你的头，因此不如现在参加我们的秘密组织（肃反会），将来国民党军队到了，再以保全性命。”有些不坚定和糊涂的人就被拉进去了，这些特务份子到处进行破坏活动，挑拨干部中间的关系，破坏政府在人民中的信仰，去年我们实行精兵简政，他们宣传要征兵，我们说全边区只征收十六万石公粮，他们造谣说要征收廿万石，引起几百家搬家，他们组织黑军暗杀队，杀我们的好共产党员，好老百姓，组织在坐的高老五、蒋五成、李旺清这些流氓建立秘密点线，准备和国民党里应外合。现在再看绥德安定各县特务的罪恶。绥德有个丁生组织黑军，忠义救国军，反同盟军到处抢人暗杀人，他自供在今年八月要配合南线顽军的进攻在边区实行暴动。交通工厂的建筑花了好多万，结果一下雨就倒塌了，这也是特务份子搞的鬼。他们到处宣传“时势要反了，边区小不顶事”，来煽动人心。总之，这些特务一心一意的想破坏我们的边区。现在我告诉你们，咱们边区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是几条枪搞起来的，现在咱们有五十万军队，八十万党员，好几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还怕什么！你们记着一条，以后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发现他做这些坏事，说共产党不好，说破坏边区的话，做破坏边区的事，你们说怎么办！

（捆起来！）对！就捆起来送到政府去。（此时台下众情激奋，人们的吼声震撼山谷：枪毙杨志功！枪毙黄流，用矛子把他们穿死！）请你们静一静，这些人虽然作了这些坏事，但现在他们已向政府坦白了，我们不杀他，只要他真个保状，负责声明以后不再做坏事，为老百姓做事就行了。（台下高呼：所有上当的失足的赶快向政府报告，坚决实行宽大政策！）有的如崔树贵史云才等过去还闹过革命，一时上当，我们应当原谅他这第一遭，可是再一次就不行了。（台下喊再做坏事都要杀掉！）现在不管是谁派来的，只要良心发现，坦白出来，一律从宽处理！但是不报告就一定要严办！（台下高呼：坚决镇压顽固不化的特务份子！）知道谁是特务份子不报告要关起来，包庇特务份子更要绑起来，我们要把所有的坏种都挤干净，大家才能一条心，才能打胜日本。

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们自卫军要做的几件事：第一，农闲时要加紧训练，每个自卫军都能够打手榴弹，都能打得好打得准，还要学会用各种枪及一切自卫武器。

第二，在农作时要努力参加生产，保证乡村中没有一个二流子。

第三，把特务份子都搞出来，到处搜一搜查一查，你们回去查不查？（齐声高呼：查！全体自卫军武装起来响应高岗同志的号召！）要严防敌探，捉拿坏人。赞不赞成？（赞成！）回去给家里老婆村里同志乡亲们讲不讲？（讲！）延安县的自卫军不仅要在劈刀刺枪打手榴弹生产中做模范，还要在反特务斗争中做模范，这样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更好，我们才能够胜利！（台下呼声掌声澎湃不绝；响应高司令的号召动员起来学习使用武器，加强自卫军整训，坚决保卫群众自己的利益，肃清特务份子！）[NextPage]

在那素委员追悼会上演词记略

（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

高岗同志以悲恸的心情，劈头就说：“八年的老朋友那素先生死了！”一九三六年四月，在藏汉边境的房子里，高岗同志和那素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素先生说他和石尼喇嘛、蒙克耳纪两次革命运动的故事，那时他曾教给高岗同志一个歌子，高岗同志现在还记得，汉文的大意是“高高举起解放的旗帜，把一切阻碍解放的势力都推翻，不管他是藏人或汉人，我们要求光明，我们要求解放……”以后，他们的关系就更好了，由于彼此深相敬慕，便于同年十月，在定边结拜为把兄弟，那素先生行四，高岗同志行七。那素先生也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乌审旗有正规军队，他是第一个组织者。记得在一九二八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反动派进攻他们的革命队伍，侵占他们的肥沃土地，抢掠他们的蒙旗良马的时候，那素先生即奋起抵抗，保卫蒙土。在土地革命时，顽固分子又促使他攻打苏区张家畔，但是那素先生是不干的。在一九三七年，顽固份子派了些土匪来扰乱边区，同时又抢了蒙胞的马匹，掳掠蒙胞和喇嘛士官的财物，而在这时，八路军的前身红军却从土匪手中，把掳掠蒙胞的牛马、财物，都交还了蒙胞。这些事实，使那素先生经常向人宣传一个真理，他说：“人家抢了我们的东西，共产党帮我们夺了回来，并且毫无报酬的还给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打共产党呢？”这样，他非但没有打共产党，反更和共产党接近了。今年二月间，顽固份子又来向蒙胞要肥马了，当时天还未暖，草木仍然枯萎，那有肥马？可是不讲道理的顽固份子，却指明要王公、喇嘛、士官的马，并且要骆驼，要土地和牌子地。必须说明，这些牌子地是蒙古教育费、军事费以至行政费的靠山。不仅这些，甚至连成吉思汗的坟墓，顽固份子都要来闹事了，以致造成严重的伊盟事变。沙王虽然不赞成，但有什么办法呢？是的，国民党会送些绸缎

之类的“糖面毒药”给王公，但是，那素先生清楚地知道，这些绸缎，能培养蒙古青年吗？能帮助建立军队吗？能够发展蒙古经济吗？他把国民党的这一政策，称做“理番政策”，他始终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内反动派这种大汉族主义的政策。

至此，高岗同志乃历述共产党帮助蒙胞把土匪消灭了，把顽固份子侵占的土地归还了，并将被掳的副官、喇嘛送归时，边府林主席曾几次拨粮六百石。高岗同志说八路军在驻防期间的军纪，这也是所有蒙人所深深地感觉到的。顽固派的军队掠夺蒙人，而八路军呢？有一兵一卒擅入蒙古包的吗？有侵犯过蒙人忌讳的吗？高岗同志说，八路军一贯的是尊重蒙胞的风俗习惯的，他说：“因为我们是从民族平等的原则出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诚恳地多方面给予帮助，这是我们的原则；别人所采取的则是压迫消灭异族的办法，结果却给日寇诱降制造机会，把某些蒙胞挤到日本鬼子那里去了，这就是国民党内反动派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的结果。”高岗同志继以沉痛的口吻，申述在遭受这次伊盟事变后的沙王近况：现在沙王被重庆派去的副长官迫到边境很小的一块地方了，他是国府委员、保安司令正长官、伊盟的盟长、年近七十岁的老人，但是他现在所要求的，只是再不要有人打他，不要使日寇、蒙奸有任何诱惑蒙古同胞投降的机会，因为蒙人如被逼得太无路可走的时候，是无法抗战下去的。那素先生目睹蒙古人民在国民党的大汉族政策之下，真是吃亏太多了，创伤太深了，所以虽然反动派曾一再利诱他去受训，但是，他说：“我再不会上国民党内反动派当了！”高岗同志发问道：反过来看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怎样呢？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必须允许蒙、回、藏、苗、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共产党不仅帮助蒙胞清边界土匪，并在经济关系上，汉人耕种蒙人土地，按数给租，当彼粮食不足时，我乃收买羊毛，换给粮食，给予调剂，并帮助他们如何发展农业，发展牧畜……。在教育方针上，是培养蒙古青年，获得革命知识，增强抗战信心。在军事上，我们是主张蒙人自己管自己的军队，试问我们会派一兵一卒混到蒙古军去过吗？我们会有一人去做蒙古的官吗？这从来是没有的。正因为这样，蒙胞总是坚决留八路军不要移防，可是，当八路军离开后，蒙胞们就被大汉族主义者的军队所烧杀荼毒了。这些事实使蒙胞看得非常清楚。那素先生初来延安时，曾以盟兄盟弟的关系赠高岗同志两匹蒙马，他一再的对高岗同志说：“两匹马算什么呢？共产党、八路军给予我们蒙古人这许多好处，难道就是两匹马能够报答了的吗？”可见那素先生对共产党、八路军印象之深了。

高岗同志继续追述那素先生前年在开参议会时的谈话。那素先生在留书时即想大大做一番事业，以后带兵，接着就与石尼喇嘛、蒙克耳纪干革命，在这长期的奋斗中，他在摸索，他在寻蒙族解放的方向，那素先生曾兴奋地说：“我们终于找到共产党做朋友了，并且从这个朋友身上，找到了蒙族解放的道路。”那素先生对于客观的情况估计得非常清楚，他说绥蒙人口不足三十万，虽说善骑能射，但仅凭此力量，还不能把日寇打出去的。因此，必须和全国同胞联合，尤其必须联合共产党。他又把团结分为大小两种，后者是指蒙古内部的团结，前者则是指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他认为德王投降日本，在他未反正前，当然是蒙奸，一定要反对，但只要他觉悟回转过来，蒙人还是欢迎的。所谓“日皇陛下”的“大蒙古国”，他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他认为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政策是阻碍蒙人抗日与解放的，他是表示坚决反对的。

至此，高岗同志指出：那素先生奋斗一生，从实践中找到他应该走的道路——坚决抗日，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坚决联合共产党和依靠广大人民，这是他成为蒙古先进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也是他和群众有联系的结果。接着高岗同志追述那素先生逝世前后的情形：伊盟事变后，那素先生曾几次找过高岗同志，他说：“我一定要回去和国民党内反动派干一下，否则蒙人活不成了。”当时那素先生知道榆林、横山、神府等地的牛马很便宜，就是顽固份子从蒙民手中盗劫来的贼物，那素先生目睹这种丧天害理的事实，自更愤恨异常。但是我们为了团结抗战，相忍为国，总是殷殷劝慰。可是，不几天前，反动派又造谣说他回伊盟了，正当这一些谣言散布的时候，那素先生在和军委会徐、郭联络参谋谈判问题，可惜那些造谣者们，没有调查一下。甚至说我也去了。活见他的鬼！我不是还在边区么？但是，这些事实对于一个关心蒙胞生活比自己生命还要贵重的那素先生，那能不伤心呢？高岗同志激动地说：“他在临死时，还念念不忘此事。他死的那天，曾派专人来信约我前去会见最后一面，但不等我会开完去看他，他已经去世了。对于这样一位蒙古人民革命领袖的死，谁能不痛心呢？”稍后，高岗同志庄重地宣布：“痛心，单是痛心，有什么用呢？蒙古同胞应照着他的道路方向前进！”高岗同志说：我们永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大汉族主义者，并且反对到底！用解放蒙古民族、解放中华各民族来纪念那素先生。高岗同志放大了声音说：共产党和边区人民愿意和蒙古人民团结抗战到底！争取蒙汉各民族的解放！

注：据《解放日报》

完成那素未竟的事业

那素是蒙古民族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坚持抗日、坚持团结。他从实际经验中相信了共产党，找到了蒙苗民族解放的道路，他一贯反对

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反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蒙人中所进行的反共欺骗宣传，号召蒙人坚决抗日并与坚决领导抗日的共产党八路军及陕甘宁边区真诚合作，这是那素委员政治上最伟大的地方。蒙古青年及所有到会人员都要学习那素委员的精神，记着他的遗言，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以完成那素委员未竟的事业。要是誓死打倒日寇，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共产党携起手来，为中华各民族的解放而斗争！

在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与生产 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劳动英雄大会，同时开生产展览大会，这不仅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且也是东方各民族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是拿锄头的、拿斧头的、拿棍子的、拿剪刀的人们所开的劳动英雄会议。在苏联，劳动者已经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被人重。在我们这里，革命以前劳动者是被人看不起的，可是现在他们也受到了无上的尊重。但是就我们全中国来说，除了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别的地方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十几年前，我在西安看过一场戏，叫做“三回头”，说有一个姑娘不肯嫁给一个耕地的农民。在中国的旧小说里、旧戏剧里，在旧社会的一切著作中，农民一向是被贱视的，这就是说，中国旧社会一向是看不起工农的，看不起劳动者的。然而现在在我们这里，劳动者却受到空前未有的尊重。他们是劳动英雄，是新社会的“状元”。

今年我们边区增加了十六万石细粮，生产了一百万斤棉花，六十万驮盐。我们把消费合作社变成供给合作社，又由供给合作社变成了生产合作社，又把消费、供给、生产三者统一起来了。这许多创造，许多发明，使我们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我们现在吃得好，穿得暖，去年一周只吃一次肉，今年一周能吃七次肉。现在大家都穿上新棉衣。这就是丰衣足食。这是什么人搞的？就是这些劳动英雄们手里拿着锄头、斧头、鞭子、剪刀创造出来的。离开了他们，便没有丰衣足食。离开了他们，就不能生活，他们有本领、有办法，人数又这么多。离开了他们，便没有社会，便没有国家。劳动英雄的代表们，只有你们才配被人尊敬，被人爱护，你们才是真正的人才，人人应该向你们学习。你们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不仅保证了我们全边区的丰衣足食，而且由于你们和全边区人民在后方努力生产，衣服多了，粮食多了，还使我们能更好的援助前方抗战。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要号召大家向劳动英雄学习，学习劳动英雄们的创造。如今年延安的变工队，首先在一个地方组织起来，别的地方也跟着组织起来。吴满有那个村子，除了老得不能动手，小得不能

做事的外，全体村民都参加了变工队，因此吴家园今年比去年增产细粮百分之八十（鼓掌）。这是劳动英雄吴满有的创造。又如劳动英雄赵占魁，以身作则影响全厂工人，结果今年全厂出品比去年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鼓掌）。这是劳动英雄赵占魁的创造。在农业、工业、运输业以及在纺织业中都有许多成绩，值得我们大大奖励。这是我们全边区劳动英雄们的伟大创造。一年前毛主席总结了群众生产的经验，指示了生产运动的方向，经过边区党政军民全体干部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才有今天的收获。

我们为什么得到这样大的收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里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在我们边区，老百姓掌握了政权，这就是民主。我们边区的民主，是有充实的具体内容的。这些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民主政治下有计划的发展生产，组织变工队，工厂合理化，发展合作社，提倡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人人都有事做、有饭吃，人人丰衣足食。这就说明边区老百姓不仅得到了政治上的民主自由，而且得到了经济上的物质果实，他们自己创造，自己享受，所以他们的劳动热忱和积极性就更加高涨起来了。譬如关中新正一区九乡一个七十九岁的老汉王世英亲自开荒三亩，新宁县三区一个六十九岁的老汉王伯强开荒八亩，庆阳三十里铺一个五十七岁的瞎子叫他孙子牵他到地里开了四亩五分荒（大鼓掌）。全边区不论男女老幼都积极参加了生产，达到丰衣足食，这就是民生主义，也就是真实的民主。他们努力生产，所以更有力量帮助前线打日本，这就是真实的民族主义。

这些都是边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用自己的血汗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换来的果实，他们会发挥自己的一切力量，拿起自己的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这个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总之，只要协力同心，我们会有办法的，像古话所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办什么事情都要和劳动大众一齐搞才搞得好的，不是一个人包办得了的。

最后，我们要求劳动英雄回去的时候，把明年生产计划搞得更好，并且推动他人努力生产，使明年生产所增加的粮食棉花等要比今年所增加的数量还多一倍。今年吴满有一村增产细粮百分之八十，如果全边区都能如此，就可增加细粮一百五六十万石。我们要奖励劳动英雄；今年最好的劳动英雄，我们要奖他一头大犏牛，让他们牵着牛回家去，号召大家都努力生产，个个成为劳动英雄，来完成明年的生产任务。（大鼓掌）

**在西北局招待劳动英雄
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同志们：劳动英雄们！今天我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欢迎大家，向大家致崇高的敬礼！

劳动英雄中有许多我们是认识的，我们过去都一块儿跑来跑去，十几年以前就在关中和大家一起跑来跑去，以后在陇东、在延安、在三边、在警备区也是一样，我们好多人一起闹革命，反对黑暗势力的统治。那时候我们不是都穿着破羊皮袄、头上络着烂手巾儿，冬天没有棉裤穿，穿着烂裤子过冬吗？不是一年四季都吃不上饱饭吗？在关中的什么石门关、谢家寨子、龙家寨子，那些地方非常苦，包谷夹洋芋，就是好吃的东西了。可是刚才听大家讲，现在光景都好了，衣服有了，粮食有了，牛羊有了，我听了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老百姓和劳动英雄们在共产党领导下艰苦的闹革命的结果！

如果我们不赶走关中的什么杨模子、陈日春、陇东的世林，三边的张廷芝、张廷祥，不赶走这些黑暗势力，我们的光景就过不成。延安各县如果不赶走安定的黄子、保安的曹创业，甘泉的马兆仁，安塞的薛生华，不赶走这些恶棍，事情也不好办。因此共产党老百姓和劳动英雄大家起来，把这一伙人推翻了，自己管理政权，当区长、当乡长、当自卫军队长，这是我们的光景才能过好了。我们为什么能这样？是因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人领导？是毛主席领导的。因此我们就要牢牢记着：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工农的灯塔，是劳苦大众的旗帜（大鼓掌）。毛主席这次在杨家沟给我们讲的那些话，指、出的那些方针，那些办法，要时时记在心里，回去照样的一条一条的去办，一定不会错！

毛主席号召我们组织起来，现在我就来讲讲，怎样组织起来，怎样完成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最近我们派了一些同志和诸位劳动英雄谈话，得到了一些材料，现在我们从这些具体的材料中，来看看我们应该怎样组织。我按着一个一个地区来讲。

先说关中。关中有个白塬村，白塬村有个石明德，是富平人，在外边给人家揽工，吃不开，前年才逃到边区，接着两年过了好光景，当了劳动英雄。在石明德的领导下，全村七十二户人家，凡是劳动的组织起来了，不但把全部壮年人都组织起来变工，而且老汉和老汉变工，婆姨和婆姨变工，娃娃和娃娃变工。做什么呢？扫院、打场、扫圈、拾肥、锄草、做饭、纺纱、织布。连牛也都组织起来，十八头牲口组成一个运输队，按照需要运粮送粪。他们集体开荒，集体夏耘，集体秋收。天黑了，大家鼓起劲儿努一把力，就顶一个人挖好几天。还有个张清云，今年创办义仓，发动大家开义仓田，打下的粮食放在仓里，谁没吃的就去借，借粮时，参加义仓的只出五合利，没参加的就要出三升，这就推动了全乡全区都搞起义仓来。他们的方法很好，这样劳动情绪劳动力都大大的提高了，白塬村就成为模范村。移民老

英雄冯云，今年安置了一百七十四户移难民，把孟家湾廿里长十里宽的一座大荒山变成了良田，创造了四个行政村一十四个自然村，过去稀无人烟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五满堆的繁荣农村了。他还有一套办法帮助移难民清查坏人，他会看来人的面色是不是面黄肌瘦的难民，看他手上有没有“死肉”，看看他日常动作像不像庄稼汉，看他讲话是说边区好，还是专门挑拨离间，看他对边区的心热不热，看他生活节省不节省，用这些办法来辨别好人坏人。关中还有个田云贵，他是合作英雄，他从一万元的资本发展到八百万，从一个镇的合作社发展到一个县的合作社，他用边区的土产去交换外面的东西，他真正懂得经济学。他懂得群众的情绪和要求，群众愿意干才干，和大家商商量量，结果你入一点，我入一点，就组成了一个三百多头牲口的运输队。大大的发展了运输合作事业。青年劳动英雄李长清，今年才二十岁，在外边挨冻受饿，到边区有地方发挥他的本领了，他领导了一个唐将班子，成绩很好，影响了其他地区也都组织了唐将班子。因为这些劳动英雄的模范作用，关中的劳动互助，变札工唐将班子大大的发展了，因之今年的粮食也就增加了很多，关中从马栏到杨家店子及其他地区，土地都很好，明年再努力开荒种庄稼，粮食会增产的更多。

陇东有个英雄叫张振财，他把他村里的七犍牛，九个劳动力，九个妇女，都组织在变工队中，结果节省了一百四十个牛工，三百八十个人工。还有个老孙万福，他一垧地打三四石粮食，他怎样搞的呢？就是施肥有办法，他天天拾粪，月月拾粪，他把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压在地里变成粪，把骨头烧成灰制成黑黝黝的肥料，土地肥了，粮食自然多了。

警备区有个阎开增，是个鼎鼎大名的英雄，他组织变工队积极参加生产，特别是值得表扬的是他反对破坏分子有办法。他团聚了广大群众和特务作斗争，平时注意侦察放哨，不让一个坏人混进来，对本村里暗藏的坏人也有办法揭发他们。有一天从边区外来了几个破坏分子，暗里带着盒子枪到边区来破坏，他看见这事情怎么办呢？他就给区政府报告，他问：“来的这些坏人能不能捉？”区上答复他：“能捉！”他就在沿路布置上人。一切准备好，告诉沿路的人说：“假如破坏分子在村里有什么事。你们就扬一把土。大家都扬一把土，坏人在那里就立刻知道了”。阎开增回到村里，遇见了这四个坏蛋，他就跑去和他们拉话。问他们吃饭没有？有公事没有？这些坏人看他是个好老汉，就没介意，跟阎开增到了村里。结果阎老汉一吆喝，来了很多人把这几个家伙的枪也拿走，人也捆上。还有一件事，破坏分子到边区来捣乱金融，那些人拿着法币，问他调换不调换，他说我调，就组织了些人跟他去调，结果连钱带人都搞过来，送到政府里去办。这样的英雄是好英雄，值得表扬。米脂民丰区的冯光祺也是一个防奸英雄，

他同特务斗争有成绩，值得表扬。清涧任家峁有个老英雄叫白德，他把全村所有的老婆婆年轻的妇女都组织起来纺纱织布。在他的谋虑下，他一个村子就成立了五个粉房，养了五十个母猪，这五十个母猪又养了好多次猪娃，连老带小就有七百多，结果他们粉条子多了，布多了，粮食多了，肉多了，你们看这是不是丰衣足食？绥德沙滩坪有个安锦成，他组织妇女纺织，最初那些人不干，说没米吃没棉花，他说我给你们想办法，没米的调剂米，没棉花的想法解决：结果把他们那地方附近六十里内的妇女都组织起来纺棉花，一共赚了二百多石米。佳县的劳动英雄高志谦，为了组织全村变工，他自己首先去找人变，人家说他是老汉不跟他变，他坚持要变，就夹在两个廿七八岁的后生中间锄地，那两个后生见他是老汉，满不在乎，可是他拚命的锄，一上午就把两个后生甩在后面，实际上他早就累了，但他硬撑住锄了一天，回去两天休息不过来，虽然这样，但由于他的模范作用，全村的变工队就组织起来了，使今年的比往年增加了许多。还有米脂的妇女劳动英雄郭凤英，她不仅种地好，打粮也好，她还给人家揽工，揽工不是容易事，要平圪崂、填水沟、留苗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妇女是能种庄稼做事的，如果全边区妇女都向郭凤英看齐，咱边区就更能打更多的粮食。至于延安农业中的吴满有、申长林，他们都用很多好办法，他们都是全边区最著名的英雄，这过去已经讲得很多介绍得很多了。

安塞马家沟的陈德发，把十六个壮丁组织起来变工，结果挣了八十石粮食，平均每个人得到五石。那一村的妇女也组织起来实行纺织了。延长王生贵种棉花，每亩地收五十斤，如果大家都这样，全边区现有十五万亩棉田，就能收七百五十万斤棉花，不但解决了边区人民穿的问题，并且还有剩余。假若明年种到廿万亩棉花，就更不得了。他种棉花的办法是籽种好，上粪多，作务好，下苦心经营，午上大家都睡午觉的时候，他到棉地里去打卡，说午上太阳红，打卡水不会流出来，棉花就容易长得好了。

我们各方面都有英雄，在三边有打盐英雄。我们的打盐英雄高仲山，是去年才从榆林来的难民，来时只有一件烂皮袄二升小米了，我们政府帮助他钱和粮食，给他分了四个子要他去打盐，他计划打一千五百驮盐，结果打了二千五百驮，换粮食能换一三〇石，他还拿了三万块钱来搞合作社，减轻了边客对盐民的剥削，大大帮助了盐民日常用品困难的解决。他组织打盐变工，一个人打盐打得少打得慢，几个人一起，打的打，担的担，扒的扒，就快了。他改良技术：过去晒池的水用人挑就打不成盐，现在他在盐池旁边打井，由井里把淡水弄到盐场子里，再把盐池盐水洒出去，这样就可以晒成二寸盐，这样，天不下雨也可以打盐了。这是高仲和对于打盐的很重大的新创造。吴旗

还有个二流子刘生海变成劳动英雄，他过去是一无所有，好吃懒作，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经过党政几次劝说，他下了决心搞地种，结果种了三十垧地，发展了二头牛，七头犍骡，五十只羊，变成了小康之家，他连帮助政府改造了两个二流子。

合作英雄也是到处有，在关中要向田云贵看齐，全边区就应该向刘建章看齐，刘建章搞合作有办法，生产、消费、运输、信用，他是全套。

尤其是值得赞扬的，在我们部队里还有很多劳动英雄，最著名的如李位、张治国、胡大嘴等，他们过去也都是受苦人，因为受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起来干了，他们一面拿上枪杆打敌人，一面拿起锄头来生产。像“团结”的生产热忱就非常高，他们甚至忘记吃饭还在地里锄地，本来规定饭后十五分钟是休息时间，但他们一分钟也不休息，这些劳动英雄看去挖地，大家都想多掏一点，把镢头做得又大又宽，他们中间有很多像李位一样一天挖三亩六的劳动英雄，他们自己种谷子，种糜子，种洋芋，种黑豆。在工业方面发展了四十二种，解决了他们的许多困难。部队劳动英雄不仅打仗勇敢，保卫着整个边区劳动人民的生产果实，而且他们也是生产运动中的出色人物；他们的开荒成绩，竟超出任何地方劳动英雄之上。部队劳动英雄一放下镢头就练习掷手榴弹，打机关枪，他们生产时，镢把子捉得最紧，是劳动的能手，他们作战时是消灭敌人的射击手。部队劳动英雄，不仅在战斗中生产中是英雄，在军民团结上他们是模范的战士，在练兵习武上他们也是群众核心。他们丢下了婆姨娃娃来打敌人搞生产，是为了什么？这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在中国找不出第二支这样的军队，世界上除了苏联以外，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军队。因此我们就要好好的帮助军队，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

工厂里在赵占魁运动下也出现了许多劳动英雄，难民工厂的袁国华是带过七次花的老战士，他反对浪费提倡节省，特务暗里打击他，而他始终坚持立场和特务斗争。被服工厂李显一天锁六七套衣服，她一天锁六十套，像这样的英雄还很多。机关里的劳动英雄过去介绍的不少了，我这里不再多说了。

我们有这样多的劳动英雄，他们会生产，有本领，他们是有知识的人，他们会管理国家。他们创造了变札工的办法，创造了打盐的办法，创造了妇幼的办法，创造了安置移难民的的办法，创造合作的办法，使得我们大家有衣穿有饭吃，生产提高，丰衣足食。我们应该学习他们，把他们所有的好办法好好研究推广到全边区，用他们的好办法，把全边区的人民组织起来！

我们的劳动英雄，今年在生产的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成绩，但我们不要自满，毛主席说，我们的房子天天要打扫，不扫就有灰尘，意思就是说，要经常注意和检查自己的缺点，今年当了劳动模范，明年还要当劳动英雄，因此我们就要经常看看有没有毛病，比如组织变工队，我们就要看看是不是强迫人家参加，组织合作社就要看看是不是有本位观点，随做随看。搞运盐也好，搞别的工作也好，要看看有没有不妥当的或不够的地方，有不妥当的就要去掉，不够的便要增加些新的东西，使我们能经常的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自满不虚心是有害的。事实上我们还存在着许多缺点，我们看到还有大部分劳动力半劳动力，还是分散的没有组织起来，选种还不普遍，如狼尾杀、马兰包、美国洋芋还没有普遍推行，棉花每亩产量还不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还不多，农作法改良也还不普遍，水利发展还很不够，运盐合作还不够，工厂生产的管理还不完善，生产的技术还不高。我们劳动英雄不仅不能自满，我们要努力克服缺点，我们还要更加前进一步，就是说要把我们的旗帜举得更高一点，仅仅我们这二百个英雄还不够，我们还要在边区内发现创新的人物，团结在已经成为劳动英雄的周围，譬如郭凤英同志就要团结很多妇女，参加纺织，参加农业生产，大胆创造模范村和模范乡。

同时我们边区的工作人员，做政府工作的也好，做经济工作的也好，做党的工作的也好，做群众工作的也好，都应该清楚了解这一点，不管做党的那方面工作，都要把这些人民中的优秀份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到群众中学习丰富的知识，你们才有办法，有力量。把这些人团结好，就可以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进行生产和武装训练，和破坏份子们作斗争。生产时一条心，反对破坏份子时一条心，坏蛋就不敢进来。我们就可以把一个村一个乡以至全边区巩固起来！（大鼓掌）如果一个劳动英雄领导一个行政村甚至一个乡，那我们就能完成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就组织起来了！（大鼓掌）不仅我们劳动英雄自己，而且要使全村全乡全区的人民都成为生产防奸和打敌人的能手，这就真正的组织起来，这样的组织是最坚固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靠种地过光景，我们在自己生产合作基础上搞起来的组织，是根深蒂固的，拔不动的！我们许多劳动英雄，应成为群众中的骨干，成为群众里最勇敢最坚决的领导份子。

你们这个会是群众中间的高干会，劳动英雄是群众选出的，你们又是劳动英雄中选出的优秀份子，是群众中的“圣人”！（鼓掌）你们来这里开会，大家商量大家研究，我们还要向你们学习，你们回去要好好的组织，变工队，唐将班子，运输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打盐合作社，水利合作等。水利合作很少，譬如三边无定河上游，也可以和群众合作，大家合伙做；个人能修就自己修也很好。

打盐合作也可以变工，不变工一个人打的，比变工打的还不多。植棉也要研究，有些地方可以搞水地，你来几垧我来几垧大家投资，找个有经验的人试试看，组织这样的植棉合作。如果我们这样做，变工札工队，唐将班子，妇纺小组，运输合作，消费合作，打盐合作，水利合作，植棉合作，并把更多的妇女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生产，还有机关工厂边队里的集体生产，大家都这样组织起来，都参加这个运动，老有老的事，小有小的事，男有男的事，女有妇的事，大家各有各的事，这样本村本乡保证它明年要大大的变样子，丰衣足食搞得更好。

劳动英雄组织大家生产参加合作，并且要学会捉坏人，学得像闫明增一样的本领，把坏人搞干净，挤得他无孔可入，学会打手榴弹安地雷，保证我们的丰衣足食！（鼓掌）因此，我们劳动英雄的标准，应以自己的模范行为组织群众参加生产、学习、打仗、防奸等这些条件为标准。我们工作人员，不管当务方面，政权方面，群众工作方面，也都要认识这一点，我们要和群众一起组织生产，总结他们的经验。你们回去就实行一下，和群众一起生产，一起打敌人，一起捉汉奸特务。闫开增说得好，我们这样做，进行这种组织，群众就喜欢这种组织，就真正组织起来。因此我们的工作，应当把这里作为基地，作为开步走的地方。只有这样才不是清谈，才不是官僚主义，才能洗掉我们脸上的灰尘。无条件的为群众服务，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我们的群众这样做，我们的劳动英雄这样做，我们的干部这样做。我们的军队一方面生产，一方面学习技术，准备战斗。我们的劳动英雄要帮助所有的群众，在群众中取得经验。尊重政府法令政策，更好的搞合作社，那么我们的事情一定办得好，我们的革命一定能胜利！（大鼓掌）

谈边区和大后方两种道路两种结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次参议会总结了边区三年来的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各参议员在大会中的发言，说明边区面貌的大大改变：“荒山变成熟地，梢林沟里建起了许多工厂、医院、学校”（高愉庭老先生），“过去有粮无油，有裤裆的人，现在收下很多粮食，买下骡子”（房文体参议员），“人们生活大见改善”（安副议长）。过去边区粮食仰赖外面输入，在已完全自种了。一九三七年边区只产粮一百三十五万石，今年产粮二百一十五万石。一九四二年边区种棉五万亩，收花七十五万斤，今年种棉三十一万亩，收花三百万斤。由于棉织业、毛织业和各种工业的发扬，布疋及各种必须品逐渐走向完全自给。人民有吃有穿，于是文化教育亦有新的开展。总结边区近年来的建设成果，边区的生

产能力提高了，负担减轻了，生活改善了，团结加强了，各阶层之间、军民之间、亲密合作犹如一家，因此边区的抗战力量就大在加强了。

和边区的繁荣相对照，国民党统治区的悲惨状况：在农业方面，地区日益缩小，征负却年年增加，苛捐杂税不计其数。以陕西棉业而言，由于国民党当局强以低价收买（每百斤成本在万五万以上，据十月一日秦风日报及工商日报联合牌所载奉蒋介石批准每百斤最高发价一万一千元），结果棉皮减缩了十分之八。在工商业方面，“生产萎缩，关厂停工”（生产局长若文氏语），囤积居奇，市场萧条。据房文体参议员所说，在耀县边境，友区每亩负担四斗九升，而我区每亩负担只二升二合，相差约二十二倍。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革命尚未成功天有眼，同志仍须努力地无皮”。更某地几百家人民自动打破门牌，要前来依靠边区。榆林镇川堡百余商家大部关门，有的抛弃房屋土地移入边区。宁夏等地回民移至三边者，亦有四百余户之多。地方贯彻了减租减息，但有些过火之处，应予纠正，以照顾各阶层的利益；（一）民主作风还发扬得不够，以后更应提倡各阶层人士共同商量，亲密合作，大家负责的精神。（二）运动月即将到来、要认真慰问抗属，切实检查优抗工作，配合军队的拥政爱民运动。

第三，关于改进区乡干部作风，绝大多数干部，艰苦工作、为人民服务，力求完成任务。但由于他们文化水平低，工作方式比较简单，以及不良习气的影响，以致发生有些干部强迫命令、摊派数字、甚至打人骂人现象。改正这些缺点，必须加强区乡干部教育，提高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和文化水平，纠正过去对区乡干部指示多，教育少的毛病。明年选举时，还要展开人民对干部的批评，发扬民主精神。

培养大批边区子弟，为边区服务，为抗战建国工作，乃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全场鼓掌）

突破一点影响全区 延属各县妇联主任集议开展妇纺运动的讲话 （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为转变妇运工作方针，影响农村妇女广泛参加妇纺而召开之延属分区各县区妇女主任的联席会，历时共廿四日始告结束。大会曾分别请同志报告中央关于的决定：高岗同志及贾拓夫、杨清等同志报告关于妇运的指示，章伯森同志报告妇纺问题。高岗同志所指示的“突破一点，影响边区”的工作作风，尤为大家所激烈研讨。各县妇联主任报告一年来的工作情形，即相互交换意见，并根据各县具体情形，布置开展妇纺的办法。大会最后一天，由白连同志做总结。在工作作风

上，决定不求地区大，而非集中力量于一个地点，把这个地点的妇纺做好后，再伸至其个各区。各县妇纺的人数，其进行务须与各县府二科取得密切连系。大会先提出下列数目，作为参劳计划，延县四千、安塞四千、子长三千、鄜县一千七百、延安市五百、志丹三百五十、延长一九九。工资一般议定是：纺毛的按米价给工资，纺花的领两斤棉花交一斤线子。目下因工厂纺线太少，故改成线线交付。又为便利各乡妇女领花与交线，大会征得同意，由各地合作社及工厂代收，再前交至本乡供销社，此法可减少手续上之许多麻烦。提高质量，要根据各县的具体情形，在妇纺好乡榆横地区放宽，延安、延川，则必须特别注重提高质量，有可能不交三等线子；鄜县、延县、延市、子长各区的具具体情形，在已有基础的地方着力于质量的提高，在无基础的地方，则着重于推广。纺棉花两斤交线子一斤，纺毛本为斤一两羊毛交毛线一斤（工厂按米折价成钱另付），这种规定，已妇纺的人，是完全可以到学会纺织的妇女中坚决执行。但在对学的人，应根据具体情形或斤二两、斤五两交毛线一斤，一到学会之后，则应照统一规定之标准，以免浪费原料。开展纺织比赛，原则上规定由个人比赛转到群众性的比赛运动，但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要实行比赛，各县视实际可情形，或以一个区、乡为重点，以建立工作的核心。如安塞四县区主任，提出与鄜县常作个人比赛，并为此而展开乡与乡的比赛的办法等。各个干部在帮助妇女订制个人计划时，尤应考虑各方面情况，不是和她的家庭相对立，而是和她的一致。根据情况订各人的计划，再制订全县计划。

干部教育头等重要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

各级领导者必须亲自动手负责将延大、各中学、完小、各区乡干部训练班办好，各级政府机关一律办干部文化夜校，为长期建设边区打下基础。

高岗同志于九日上午在文教大会上讲话。他本着毛主席日前宣布的方针，在工作方法上予大会代表们以具体的指示。他特别强调干部教育为开展文教工作的决定因素，并对新老干部的学习问题，作详尽指示。

高岗同志首先称述此次大会的准备方法，即先组织各分区工作队，由负责干部领导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获得经验，并由群众选出有实际经验的代表来开会，这样就便于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各代表回去以后，对边区的文教工作，一定会有很大的推动。高岗同志说：大会的方针，毛主席已有指示：为大多数人民服务、为战争生产服务，打日本、反汉奸、反封建迷信。这种工作的基本队伍是

诸位代表。你们许多人都是群众选出的模范，大会将表扬你们的成绩，但是你们自己的任务却不是争锦标，出风头，不是的，你们是要在这里搞通思想，研究经验，解决问题，以便回去更好的为老百姓办事。大家回去，要本着毛主席指示的群众与自身原则，在群众运动中防止强迫，把握住为群众所喜欢，能够解决问题，并能长期坚持下去的方式，去推进文教工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在群众中的不卫生、文盲、迷信与封建文化的残余，应采用具体的、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教育群众，使群众觉悟，自己起来克服它。简单的否定或强迫命令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追求数字的形式主义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指出开展边区文教工作的决定因素，是干部教育。这些年来，外来知识份子对边区工作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是不能永远在边区的，因此培养边区本地的知识份子干部与有文化的工农干部就成为边区今后一切建设事业的关键，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予以第一等的注意。为此边区一级的主要负责同志应该到延大行政学院和党校五、六部上课，各工作机关应该研究业务，总结经验，作为训练干部的教材，以保证他们学用的一致。各分区领导同志亦可以同样精神与办法，亲自动手，办好本分区的中学、地干班等，为本分区或全边区切实训练出一批有真本领的干部，此项工作应列为各分区的主要职务之一。在各级除应注意办好完小外，目前尤应特别集中力量，办好各县的区乡干部冬季训练班，集中半数以上的干部到县上，从他们本身的任务起，用座谈方式、用总结工作检查工作的方式，和他们讨论商量，然后提出好的和坏的典型，向大家报告，使大家真正能够了解政策，知道方法（包括此次大会所决定的文教工作中的政策与方法）。这才是具体的帮助干部，培养干部的方法。应该训练，如果所有区乡干部，不了解群众的问题，不教育，那么任何工作都是不能作好的。

特别指出要消灭区乡干部文盲、迷信、不卫生等。他号召各级政府（从边区政府到各区乡政府）和学校合作社都办夜校或读报识字组，于两三年内消灭工作人员中的一切文盲，各区乡政府的夜校并可吸收群众参加。要克服干部中的保守性；认为没有文化也能革命、或是怕丢脸，怕批评的坏作风。领导上应该善于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巩固他们的情绪，使他们知道有了文化、有了科学，会把工作做得更好。丢脸是丢旧社会的脸，错误是谁都有，问题是对错误的态度要正确。应该向别人学习，听取别人的意见，克服“弋而洛夫思想”。

号召新老干部互相学习，工农与知识份子互相学习。无论什么人都要学习一套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而不要务虚名，视资格。高岗同志说：有一个自满的人，以为自己满有学问，满有资格，遇事可以凭主观预先设定一个办法。这行不行呢？高岗同志回答说：如果不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这是行的，如果要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这

就不行。应该知道，必须是一贯为群众做事，在实际中得到成效，而且群众说你好的那种希望，才是真正的，可靠的东西。个人的小聪明，或什么天上掉下来的希望，不能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包袱”丢得远远的。丢掉背上的包袱，打开脑筋的机器，使脑子里觉悟的部分挤掉不觉悟的部分，——毛主席的这个宝贵指示值得我们终身受用。我们今天边区文教工作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人民解决生产和救命（医药卫生）两个大问题，也就是物质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学习至少一个群众所需要的本领，如工业、医药、会计、助产都好，去为人民服务。我们必须坐稳屁股，安心进行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学习和工作。

“永远为群众服务，永远依靠群众。”高岗同志在热烈掌声中结束了他的讲话。

从生产战线上开展妇女运动 延安边区一级“三八”妇女纪念节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是“三八”妇女纪念节，要我讲话，我是讲不出什么好的东西来。因为第一，我不是妇女（笑声）；第二又不是妇女工作专家。刚才妇救会白主任讲的很好，要我讲的还不过是那一套，所以听起来恐怕没有意思。不过我看今天的这个纪念会，比过去的纪念会，气象是大不相同的。大家都可以看得清楚，到会的每一个妇女同志，都拿着毛线、毛衣、鞋帮等进行生产。这是什么道理呢？白主任讲的对，就是大家的思想挡住了。因为思想搞通了，她们的手也改变了。我们过去有不少的妇女工作者，他们的思想没有搞通，所以他们的妇女工作方向、工作方法，都没有弄对头。在生活上，他们是一样的号召，空喊男女平等，空喊解放封建束缚。在工作上，她们又有那样一学府而不厌的作风，手里提个包包，洋里洋气，到了乡下，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一见就说：“女二流子又来了。”和妇女一谈话，又是说什么反对男人搞通女人呀！提高妇女地位呀！婚姻问题呀！结果，弄得有些妇女本不应该结婚结了婚，于是引起群众的反对。她们不知道在新政权下面，解放妇女就是领导妇女生产。组织妇女纺花织布、喂猪、种地，就是最好的妇女工作。她们不知道边区妇女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已经得发挥；只有妇女们起来积极生产，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还有些妇女工作者，没有这样做，她们甚至认为纺花织布妇女生产是下贱的事，这种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抱着这种思想去做妇女工作是当然做不出任何成绩来的，她们这种错误思想、错误方法，甚至曾经闹出过这样的笑话，她们有个别的人说：“三八”是妇女节，男同志不准参加。

所以现在我们的妇女工作已经改变了错误的方向，走上了正确的方向。我们的妇女工作方向，就是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发展经济，做到每个家庭的农支足食！我们反对只有一般号召，反对把男女对立起来。

妇女的生产，在整个边区的生产上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边区二百万人，妇女占一半就有一百万，除过老的小的不能生产外，大约还有二十五万妇女劳动力，如果把这一劳动力都组织起来，都和今天到会的女同志一样的来纺织、做鞋，那么，我们的边区财富就会更多的增加了！在这一点上看，组织全边区的劳动妇女生产是有很大大意义的。

在去年的生产运动中，机关部队里涌现出了许多妇女劳动英雄，如三五九旅的同志等。她们靠自己的生产解决了困难问题，减少了公社的开支。如果我们所有机关部队的妇女同志，都能组织起来像她们学习，动手生产，靠我们的妇女工作，就有很大的成绩了。比如，西北局的女同志，在开始纺线的时候，都不会纺，后来他们组织起来，到纺线最有经验的同志那里去学习了几次，现在他们都会纺了。但是，还有一种女同志，他坐在机关里，不去生产，说他是什么人的老婆，坐享丰衣足食的生活，叫他们生产，他说：在家里还有人代耕、砍柴、担水，怎么这里还要生产呢？所以他们就不愿意生产。这种人不知道在我们这里从事生产是光荣的，不生产是可耻的。另外还有一种女同志，念了几年书，读了几本马列主义，就以为自己是搞政治的，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不是纺线生产的，但实际上，她们是非马列主义者，他们不知道马列主义在每天的边区就是发展生产，假如离开了生产，还有什么马列主义呢？去年我们的生产运动，创造了许多东西，比如大米，我们过去是要靠外面买进来的，但现在南泥湾、槐树庄就出产大米，不必到外面去买了。这就是发展生产的好处。还有许多好处，我不打算在这里多说。总之，我们机关部队的女同志要学习前一种人，反对后两种人。

在农村里，去年更是涌现出不少的生产战线妇女劳动模范例子，和生的妇女生产模范例子。比如出席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的郭凤英、刘老婆、李凤莲等，都是妇女的好榜样，都值的妇女同志来学习。这里我可举两个新近的例子：安塞四区白家焉的沈凤义，是一个女党员，去年生产运动中，她参加变工队，虽然名誉上不是队长，但实际上她在变工队中起了领导作用，和男子一样生产，她每天早上到变工队的各家门上敲门叫起床。凡变工队中发生了问题，她都能说服解决，在村里比男子还有威信。就这样有本领的妇女党员；我们应该向她学习，吸取他的经验，利用这些经验，再把它推广到别的地方去，我看有很大大意义的。再比如安塞马家沟的妇女，她们从群众报上看到关中石明

德村的妇女组织起来了，感到自己也应该组织起来，后来果然在劳动英雄陈德发的领导下，全村组织了五个妇女的一个变工队，又和杜庄的妇女订了竞赛，今年计划要种十五垧棉花，每人要种三百窝瓜，一年完全由妇女自己种植，余下来的男子劳动力就可让出开荒，这样来增加全村粮食产量。这个妇女变工队，还说有好处，就是妇女变工生产，出门人多；红火热闹，又不怕狼来。村里的二流子，看见妇女们都去生产了，大家又在说笑他们，他们觉得不好做人，就不好意思再不生产了。同志们！像这样的模范例子是很多的。

但是另一方面，在农村里同样还有和男二流子一样的女二流子，比如在龙儿湾的一个妇女，听说是米脂人，年纪也相当大，她除自己不生产外，还影响别人的生产。她做什么呢？她做「穿针引线」的不正当勾当，说要她生产，她总懒得不动。此外，还有一种年青的妇女，也是不好好的生产，穿红戴绿，溜来溜去，不打算光景日月，不想念建立家庭，这同样是一种二流子。上述这两种人，虽是妇女中的极少数，但是我们也要反对，我们要教育这些妇女，使她同男二流子一样的改造过来，这就是我们当前妇女工作的任务了。

这里再讲一个关于妇女工作的形式问题。过去的妇女组织是有许多形式主义的，许多组织都没有实际工作内容。原因就是他们不会利用合作社、变工队、妇纺小组等各种形式去进行工作。他们不知这种形式是农业自己的形式，是符合群众利益的一种形式。仍然是主观主义的老一套，不与群众生产组织相联系，所以她们的工作，老是做不出很大的成绩来，他们的组织相联系，老是没有内容的空架子。今后的妇女工作形式，应该是利用农业生产中的各种各样的新形式，去代替没有内容的老形式。而它的工作内容，则应该把重心放在组织领导群众生产上，使群众的小米、牛、羊，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使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那我们的妇女水平，也就一天比一天提高起来了。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大家都住洋房子，吃面包，男女一样平等，就是因为苏联的生产大大发展，妇女的经济地位都提高了。就以我们的妇女工作者，大家都要去组织妇女生产，从农业观点出发，走农业路线。大家都来种棉、纺花、织布，使我们边区的人都有衣服穿。大家都来喂猪、喂鸡，使我们边区的人都有肉吃。吃穿都解决了，我们边区的经济就可以自给自足，支持长期抗战，对全国的影响就很大，边区妇女经济地位提高了，对全国妇女的影响同样也很大，这样我们才是真正做了妇女解放工作。

最后，我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实行节约的问题，边区的人民是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但是为了自卫备荒，除了加紧生产以外，我们还要实行节约。我们妇女占人口的一半，如果大家节约起来，就能节省一个很大的数目，就我们延安的各机关来说，如果认真实行节约，就

能节约几十万，如果全边区的党政军民的男女都一起来进行节约，那就更是一个大的数目了！这样我们一面生产，一面节约，使我们边区财政经济，更有保障，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军民关系，更加团结。把我们的工作，更加深入到群众中去！我的话完了。

关于工作作风问题 (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

关于工作作风问题。这是当前主要问题，是我今天要讲的中心问题。

首先应该估计一下：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在执行中间，在某些问题上，还有某种缺点和错误。比如合作社摊派股金，群众不赞成硬要摊派，这就是主观主义作风的表现，就是错误的。我们许多同志承认自己有主观主义，但是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如何？性质如何？程序如何？我们应当衡量一下。我们做的事情是人民赞成的，合乎大众利益的，所以是正确的，人民拥护我们，这是事实。但是也有一些事情人民不满意，这也是事实。为什么人民还有不满？为什么我们费了很大力量，想替人民谋利益，而群众反有不赞成的地方呢？这就值得我们反省了。我们不能自满，不要以为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得不错，就宽容自己，而应该不断努力，随时改正自己的缺点。

区乡干部一般地说都很努力，很负责任，但还有不少叫苦的。叫苦有两种：一种是没办法“解不下”；一种是事情多忙得很，一件事未完，另一件又来了。这个责任主要由谁来负呢？应当由上级来负，我是西北局负责人，应当首先由我负。下级“解不下”，应当帮他“解下”，这是领导和领导人员的责任。但是目前的情况是迫使他们失去了工作的主动性。这表现在：（一）任务多，使区乡干部对整个工作抓不住中心，例如上面头脑多，部门多，一下子发下去许多指示表格，就使下面无从做起。要知道下边的干部和老百姓，识字的很少，白天忙于生产，晚上还要睡觉，如果任务多了，他们除了随便敷衍应付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二）会议多，比如去年边区开了很多会，一般的说，这些会议都开得不错，各有它的作用。但也有些会议不是采取慎重的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态度，会议应解决什么问题，应当怎么开法，大家认识的还不深刻，以致效果不大。（三）调查多，研究少。我们应当怎样调查？派一批人下去专门作调查是一种方法，各级干部平时在每一件工作上都注意调查，把本县、本区、本乡的经济、政治、文化、干部的情况和群众的情绪等等材料经常积累起来，这又是一种方法。如果县长、县委书记，区长、区委书记平时在工作中注意到各种问题：农村中怎样增加粮食，发展纺织，怎样养牛、养羊，怎样植

棉、植树，干部情况怎样，群众有什么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过一个时期大家应谈一下，改进自己的工作，这样就会很有帮助。如果只靠上边派工作团调查团下去，不是直接担负工作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调查研究，并不实际参加解决问题，结果会使上边下去的调查人很苦，下边的人则感觉对他们没有帮助，或很少帮助，甚至反而增加麻烦，也不满意。当然这不是说调查团、研究室没有作用，不过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应当以担负实际工作的同志，从日常工作中日积月累的调查研究为主，才更有补益。

（四）跑腿多，用脑少，上边给的任务多，缺乏中心，接到一件又一件，有什么事就跑一跑，完全失去了主动性。这就是四多四少：任务多，开会多，调查多，跑腿多，主动少，检查少，研究少，用脑少，这中间最主要的是主动少，用脑少。

这个责任主要是上级的。但下边是否也有责任呢？不讲清这一条也不对，这叫偏向，假如上边有指示，在我这里行不通，就应当申辩。如果上级指示行不通，一不申辩，二不打招呼。采取应付态度，是不对的。上级的指示，除对个别问题的具体指示外，只能照应一般的主要的情况，不可能照顾到所有各地的具体情况，因此接到上级的指示时，必须根据本地情况布置工作，党的政策要拿到群众中间去实现，假如行得通那就好，行不通就要改正，开始行通，以后又行不通，也要适当改正。毛主席说：“我们要坚持真理，随时准备改正与修改自己不正当的意见，不适合情况的言论、行动，政策要随时准备修改。”就是这个道理。

上级指示要慎重，要估计到当时的具体条件，群众的需要以及干部的经验，最好先酝酿商量并仔细研究一下，再发出去就会少出乱子。另一方面下级服从上级是应该的，但服从组织不是盲目的服从。党的一切指示，都是给群众办事。其中可能发生毛病，有毛病就应当提出来，提出问题并不等于不服从组织，相反，这才是自觉的服从组织。我们对谁负责？为谁服务？如果一个指示对群众没有益处，就应当立刻改正，或者指示虽好，群众还不觉悟，也要等待一下，这是正确的等待群众的觉悟，而不是“等待主义”的“等待”，在这种情况下给上边打一个招呼，是对党负责，不是讲独立性。

我们的区乡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他们中间许多人参加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和边区建设，他们为了革命，离开自己家庭，生活很艰苦，工作很多，又有许多困难，如果还要骂他们，他们肚子里自然有气。所以我们对区乡干部应该寄予无限同情，应该帮助他们，提高他们，多给他们以政策教育和工作方法上的指导。但是不是区乡干部所有毛病都要由上边负责任呢？那就不然，如下面个别的，不讲道理，乱没收等，上边总没有教他这样做吧。另外一些老为客观上忠实于革命，

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讲究工作方法，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常常采取强迫命令的简单办法，结果事与愿违，脱离群众。也还有一些新的知识分子干部，他们在主观上虽也愿意为群众服务，但他们常常把“为群众服务”的观点抽象化，而不能在实际行动中具体贯彻。这两种人也或多或少都有“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的缺点，必须在帮助教育和提高觉悟之下，求得改正。如果不看到这一方面，把一切责任都往上边推，那就会出偏向，与工作无补。

我同几个地委书记和专员座谈过两次，他们说对党的指示照抄照转、照办的多，而仔细思考研究分析的比较少，西北局的指示有不切合实际，包含主观主义的地方，我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分区一级，县一级在接到指示的时候是否仔细的研究过，并讨论如何在自己地区具体实现这个指示。如果没有这样做，那就是不对的，应当改正。

我们在工作作风问题上，单拿缺点错误来说，所犯的主观主义错误，其根源何在呢？就是由于我们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不了解或者说很少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甚至于不了解我们的干部。我们在内，在土地革命时期，对于农村环境和农民的情绪懂得一点，开始我们不很了解，以后慢慢的打来打去，才知道了一些，但是不是大家都懂得了农村呢？如果都懂得，为什么那时还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呢？在抗战初期也有一些同志不懂得农村，不了解依靠农村支持抗战的条件与重要性，更不懂得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所以，他们看不起农村，不赞成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不爱惜民力财力，以致过分，引起后来财政经济的很大困难。我们许多同志，是边区土生土长的，对于边区的一般情况是了解的，对于内战时期的那一套也颇熟悉，但是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今天的边区环境是在抗战时期领导农民进行经济建设的环境，必须了解边区是分散的农村，个体农民的生产技术非常低下，交通非常不便，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上，必须进行艰苦的长期的工作，假如我们性急，想一下子就把边区的合作社和各种工厂都搞起来，结果是会办不到的。虽然从革命到现在，我们许多干部都在农村中工作，但对领导经济建设经验还很少，应该虚心学习，不要以为自己参加过长期的革命工作，当过什么什么，就觉得了不起，固步自封，不求进步。

别人把边区看作整个解放区的排头，但是我们自己要承认，建设边区的各项工作我们还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我们，连我在内，千万不要背上包袱。包袱有各种各样，背上，就不会正视现实和真理，就会难于前进，或不能完全正视它们。把错误当成包袱背上，就不会改正它，把功劳当作包袱背上，也会障碍自己的进步。青年知识份子富于热情和朝气，这是好的，但如果不正视实际，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那么，热情和朝气这类的，发生事与愿

违的恶果。老干部有斗争历史，有实际经验，这是可宝贵的，但是自满自足起来，不学习，不求进步，那么，过去的经验和好的历史，反而会变成累赘。有的人，对自己所管的工作，好比太岁头上的土，不许别人动弹丝毫；有的人，强不知以为知，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自以为是，固步自封；还有人，在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中，问题很多，但总是装一个没有问题的场面，把别人的意见和建议顶回去。这类情形，也是思想上背着包袱，不去掉它，等于自己蒙蔽起来，看不见现实，发现不出真理的。所以必须去掉包袱。

此外，我们对于所有的干部，民政厅也好，组织部也好，各部门也好，是不是那样清楚了解，如他们的工作能力，他们的情绪，他们心里有什么不满，如何提高他们等等，如果不清楚了解这些，我们怎样能把工作做得好呢？

今后怎样办？为了了解农民，了解农村，了解干部，是不是边区一级的负责同志都跑到农村去呢？当然跑一跑也有好处，不过中心问题决定于你是否下了决心去了解，前天我找了几个地委书记座谈了五个钟头，我们谈到目前老百姓最赞成的是那几件事？不赞成的又是那几件事？为什么不赞成？这些都谈的很好，这是了解情况与检查政策的一种有效办法。有人说：我文化低不能了解，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是否了解情况，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文化也有关系，但不是主要的。文化程度高的人，也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我们的干部主要的是要求他们从老百姓的需要出发，从实际出发，从不断的努力学习中提高文化、提高自己。

第二，我讲要兴利除弊。就是说，对人民有利的事，我们就兴办，有害的事，我们就除掉。据几位地委书记和专员的反映，老百姓称赞我们做得好事很多，主要的：抗日保卫边区好，生产好，没有土匪好，禁赌好，改造二流子好，减租好，农贷救济好，安置移难民好，机关部队生产好，看病好（医院给群众看病），和气好（八路军不打人骂人）。老百姓既然赞成这些东西，每个同志就要看一看，你那个地方还有那样没办好，就办起来。除这些好事以外，在你那个地方老百姓还需要什么，还有些什么好事现在还没有办，就应该提出来和他们商量研究，看究竟怎样办好。比如有些地方老百姓的娃娃养不活，县长、县委书记直到乡长、支部书记就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搞好一点。又比如老百姓的牛羊死的很多，就要想办法使牛羊少死一点。如果这样办，老百姓一定喜欢。办的方法主要靠下面的干部，召集有经验的人谈一谈，我们上面办事也要听你们转来群众的意见，如果没有各级党政组织反映群众的意见，那我们就会悬在空中，无从着手了。总之，我们要解决群众新的要求，新的问题，要和他们商量解决，不是强迫命令的解决。

目前边区内的事情，人民不赞成的，据说主要还有三件：

一，不赞成合作社摊派股金，我们费了很大力量，召开合作社会议，想给人民办好事，办合作社，但是人民反而不赞成，这很值得我们想一想。合作社容易不容易办？我们承认合作社是不容易办的。在分散的农村，个体经济的农民，他们还没有得到合作社的实际利益，就要他们拿出钱来，交别人替他们办一件不容易的事。再加上我们的干部又没有经验，不了解合作社组织人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也不会办合作社。这个时候提出家家入社，人人入股，必然要形成强迫命令，引起人民的反感。现在怎样解决？人民不赞成的合作社，股金应一律退还，并从此取得改进合作社工作的经验。有人说我们合作社已兴办起来了，股金也集起来了，虽是老百姓有些不满，还是继续搞下去。这种办法还是不妥当的，因为目前我们的条件，还不可能把所有的合作社办好，迟延不退，老百姓吃苦更大，他们将更不满意。自然，某些好的合作社群众不愿意退股的，应继续办下去，并设法办得更好。关于摊派股金一事，请你们回去对老百姓讲，这是过去我们搞错了，对大家不起，现在我们决定根据大家的意见来改正。

二，不赞成某些税收机关和检查机关乱没收的现象，我收到不少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有些老百姓来延安控告说：他们从外边带进来的几块白洋及私用的镜子或几条毯子等因漏税，或违禁，也被没收了，表示很不满意。我想这类事情的发生，不是工作人员和检查人员不懂政策，贪图小利，就是工作中或许还有毛病，应当研究改正。我们坚决反对没收粮食、棉花等，是不是让它们走私不管呢？这样就会影响到全边区的金融和人民的的生活，达到党内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所以要严格禁止坑害一个贫苦的老百姓，因为不知道政府的法律，如属初犯，也不应立即没收，但要向他讲清走私不禁止对人民有什么害处，使他懂得政策，参加部训练班、自卫军训练及春节闹社火时定宣传。

三，不赞成有些地方的运盐动员。我们过去是对的，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当局停止供盐没发展，若是不驮出盐去，边区的部队和居民都没盐吃，所以那时的动员运盐是不得已的。现在我们要发展，对食盐的产、运、销诸问题，都有要求不同了。今天老百姓不赞成动员运盐，我边区自愿地运。

除此以外，要时常问老百姓，看他们有什么不满。人民是我们的上司，我们是为他们谋利益的，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满，我们就要改进。

第三，领导干部要打开脑筋多想问题，有毛病是不可否认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更冷静、更自觉地克服缺点和偏向，必须记住我们的工作，一旦有丝毫骄傲自满和粗心，对每一件工作是没有好处。[NextPage]

时时刻刻为老百姓兴利除弊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在边区劳动英雄和

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战斗英雄们：

去年一年，由于你们的带头和推动作用，响应了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使得粮食棉花的增产，机关学校和工厂工作的改进以及军队的练兵生产等各种运动，都有很大的成绩，并且发现许多创造。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比较前年更前进了一步，深入了一步。各方面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大的增加了，模范单位也相应出现。

目前我们能不能说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运动已经普遍展开了呢？如果按各种业务看，七十二行，每行都有英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英雄运动已普遍展开。但从每一行每一业范围的全面来看，那么运动又尚在开始。边区有一百五十万人，如果说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三十万以上，其中像吴满有、刘玉厚、石明德、张振财、贺保元等农业劳动英雄并不多，还不是每乡都有，每村都有。像杨正兴、郭秉仁等植棉英雄更少，有些地方群众还不种棉花，不会打卡，甚至有一垧只收几斤的。而工厂生产中像沈鸿、赵占魁、袁广发等英雄多不多呢？在部队练兵运动中像张治国、段全才等英雄多不多呢？在妇女编织事业中像刘老婆等英雄多不多呢？模范工作者像张子良、仝万明的多不多呢？模范乡村和模范的班、排、连多不多呢？应该承认，都还不多。

所有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其事业的性质虽各有不同，但都是为建设边区服务的，对边区建设都有功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及各种模范单位，都是十全十美，毫无缺点了，相反的应该看到，我们的事业是十分繁重和艰巨的，我们的经验还不足，各方面的缺点还不少。因此我们绝不应自满而应常抑制自满继续努力。

大家在这里开了会，回去以后作些什么事呢？我提一点意见请你们考虑和研究：

农村里的劳动英雄，最主要的就是要增加粮食和棉花的生产，推广纺织，解决穿衣问题，应根据不同的情况，改进新作法，多施肥，细耕，多锄草，除虫害，修水利，以及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开荒，扩大植棉面积。选择适当的棉地和种子，对没有种过棉花的地方，应请有经验的人去指导，教会群众如何种法，如何打卡，争取今年全边区生产棉花四百万斤，有了棉花就要动员自己家庭的妇女纺纱，织好布，以推动普遍的妇女纺织运动，逐渐做到布疋自给。

工厂里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要达到增加产量，提高质量的目的，就应改进技术，把劳动力组织得更加合理。如瓦窑堡焦煤，有铁矿，就应在当地采煤，开炼铁厂，以免运输力的浪费。一切工作都要

多和工人商量，订出计划，经常检查研究经验，发扬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部队的战斗英雄和劳动英雄要组织生产、练兵习武，更加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官兵关系，军民关系要更加亲密团结。

机关的模范工作者要精通业务，学习政策，提高工作效能，爱惜公物，厉行节约。

所有的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都必须不断的提高自己，稳步前进。以自己的事业去影响别人，以自己的经验去带动别人，创造更多的模范乡村，模范工厂，模范班、排、连以及各种模范单位，推进集体的英雄事业。

怎样进行工作，用什么办法完成以上的任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建设边区，替人民谋福利，因此首先必须注意群众情绪的反映，他们有什么要求，需要解决那些问题。必须善于从当地的情况出发，具体的给老百姓办好事，去掉工作中的毛病。总之，就是要时时刻刻为老百姓“兴利除弊”。比如我们帮助老百姓多打粮食，多种棉花、纺纱、织布；制造血清疫苗，防止牲畜疾病，减少牛羊死亡率；提倡卫生，修厕所，刷窑洞，开大窗户，人畜分居，公家医院给群众看病，办助产训练班，到农村中去接生，减少婴儿死亡率等。一般的讲，这些都是好事，需要兴办。并且一定和群众商量，通过群众的自觉自愿，决不能操之过急。比如办合作社也是一件好事和大事，但是我们处在分散的农村，群众的私有观念很浓厚，干部又缺乏经验，合作社的好处许多老百姓目前还不相信，如果我们要家家入股，人人入社，强迫指派股金，结果是事与愿违，引起群众的反对的。因此凡是对老百姓有利又为老百姓所赞成的事就办，不赞成的就不办；有些好事如果老百姓一时还不赞成，也暂且不办。总之我们要善于等待和提高群众的觉悟。至于工作中的毛病一经发现就应认真改正。今后合作社绝对不能摊派股金，已摊派者，群众愿意退股的应坚决退股。为群众服务，不决定于主观愿望，最重要的是检查效果；不在于表面铺张，也不在于形式的大小如何，而要看他的实际作用。比如组织变工队，不只是看有了百分之九十或者全体劳动力参加，就算成绩，而主要的是看变工队能增加多少粮食，节省多少时间。变工队应按照一定的地方、时间、条件去组织，能变就变，不能变就不变，可以大变，也可以小变，如春耕、夏耘、秋收情况各不相同，秋天收割时，群众习惯，全家男女老少都上山生产，不愿变工时，就可不变。夏天锄草时可以较普遍的组织变工。春天组织牛具变工也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如在张家畔草山梁的平滩上，土地集中，可以组织大变工队。而如果只二三垧地，也要组织同样的变工队，就是浪费劳动。同时还要照顾到牛的好坏，如安塞一个地方好牛和弱牛在一

起变工，变了三天，把弱牛变垮了，病了半月，不能耕作，所受损失比变工得到来的利益更大。再如农户计划，有些地方由于方式不好，使百姓感到麻烦，甚至认为又是政府要给他们增加负担，采取应付态度，不愿讲老实话，结果只是照样填表，流于形式，作用不大，今后是否普遍的逐户制订，还可研究。最好多用商讨的办法，如把生活状况，劳动力及生产条件等大体相同的农户分为几种类型。在每种类似的人家中找出典型，研究他用什么办法，增加了粮食、棉花的生产，使生活能逐渐上升，然后再把全村或每种类型的附近群众集合在一起座谈商量，用生动的如何能把贫农变成中农，中农变成富农等发展生产的具体事实，使大家了解订计划的作用，影响大家学习模范典型的办法，提高生产，这就是在实际上给他们订了农户计划。有了好的榜样，就可以发动群众自愿起来这样做。对耕三余一的号召也是要按照具体的情况出发，如你那个地方没有地，没有牛羊，只能做到耕四余一，那就耕四余一；如果你的条件好，能耕二余一，能耕一余一更好。总之，是为了增加粮食年年有余，达到备荒的目的。

其次，在工作方式上要发扬一技之长，不管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以及普通群众，只要有一点长处，一点创造，就应表扬，更加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世上没有一个七十二行样样精通的万能英雄，只要积累成千成万群众的各种创造，就会更加推进全面建设边区的事业。如果相反的，事实把许多英雄的创造集中起来，定出一个最高标准，限定时间，要用高的标准普遍比，要所有的群众都向这个标准看齐，结果就会使群众望而生畏，不能提高他们情绪和信心，势必产生强迫命令。因此主观上希望一下子把一切事情都办发，结果一定是“欲速不达”，实际上也是一种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群众的工作作风。

第三，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要更加团结，不能骄傲自满，不要以为自己当了英雄就和群众不同，就能命令群众，指挥群众。去年有个别英雄在边区开了劳动英雄大会以后，以为自己得了奖，和毛主席握过手，于是背了一个“劳动英雄”包袱，不和群众商量办事，不尊重边区干部，盛气凌人，甚至群众不听他的话，他就要把群众捆了起来，使得群众害怕，因此今年群众就不再选这些人来当英雄了。英雄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才能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英雄是群众公认的，而不是自封的。英雄要永远和群众在一起，不要英雄一时，而要年年当英雄，英雄一世。

最后，我们的干部和领导同志应该深入下层，懂得改造农村，提高农民，建设边区，建设国家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工作。要不断的摸索，时时注意情况的变化，照顾到当地的情形，干部的经验和能力，以学习的态度，慎重的加以分析研究。对任何工作，不求表面的形式

的铺线，而在检查其效果和内容。我们要常常征求老百姓的意见，发扬群众的民主，使他们敢于大胆的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随时准备改正自己的意见。我们除了真理和群众以外，没有任何不能丢掉的东西。我们要善于培养和教育英雄，更加发挥英雄的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使领导者和英雄及群众更加结合起来，共同前进。

在内蒙古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

云泽同志在这个会上的总结报告很好，东北局完全同意。我在这里讲五个问题。就是内蒙解放道路和党的民族政策；内蒙工作的现状；内蒙党当前的政策；加强蒙汉干部的团结；今后的任务。

一、内蒙解放道路和党的民族政策

大家的发言说明一个问题：内蒙解放那条路走不通，那条路才走得通。内蒙人民几百年来，受尽了民族侵略者残酷的统治压迫。满清、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者，都以各种残酷毒辣的办法，向内蒙人民刮油水，而内蒙的封建统治阶级则帮着刮。这就将一个历史上以强悍著称的民族，弄成皮包骨头、衰弱不堪，一天天走向衰亡的道路。扫除外来的民族压迫和内部的封建压迫，这是内蒙人民多年来的迫切要求。但是为什么在过去老是达不到目的呢？这除了外在的原因之外，像大家所说的，主要地是由于内蒙的封建统治者引狼入室，打着“自治”的招牌，勾结异族侵略者，出卖民族利益，以巩固其特权地位。如德穆楚克（德王）、李守信、白云梯、吴鹤龄等蒙奸，便是这种人物的代表。每个朝代出卖内蒙土地的是他们，叛变和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的是他们，和张作霖、吴俊陞结亲家的是他们，到蒋介石门下去做官的是他们，帮助日寇奴役内蒙人民打外蒙兄弟的也是他们。大家可以想想，内蒙的这些封建统治阶级，除过制造落后、愚昧、贫困、困苦、衰弱，除过搜刮民脂民膏维持他们自己的特殊生活外，有没有真正替内蒙人民办过一件好事呢？

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依靠封建统治阶级，内蒙人民决不可能得到解放，相反的，只有日益走向被异族侵略者消灭的道路，内蒙一切有正义感的人士，只有坚决与人民站在一起，方能有光明的前途。

在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以后，内蒙为什么又能获得解放呢？为什么又能建立东西蒙统一的自治政府呢？内蒙人民几百年来来的迫切要求为什么能一下达到目的呢？

这主要是由于苏联、外蒙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积极帮助，特别是内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的结果。没有与外蒙出兵，日本帝国主义者能不能迅速打垮？东北和内蒙能不能迅速解放？显然是不可能的。帮助弱小民族求得解放，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天职，

是列宁、斯大林规定的国策。外蒙经济上比内蒙还落后，然而他们已解放了二十五年之久，这就是由于有强大的苏联的援助。对于这个外在援助的重大因素，大家应有清楚的认识。在苏联和外蒙从内蒙撤兵以后，蒋介石匪帮就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向中国人民开火，其中也向内蒙人民开火。他们把德王用飞机载到重庆和北平，又把李守信送到东北。傅作义、杜聿明同时向东西蒙进攻。这时一切大小蒙奸，都蠢动起来，一切反动分子仍想继续坐在内蒙人民头上。可是，这一次蒋介石匪徒和内蒙的反动分子却没有达到目的。人民解放军在长城内外粉碎了蒋匪军的进攻，使得内蒙局势稳定，能够顺利进行各种民主改革。毫无疑问，没有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西北和华东、中华的胜利，内蒙将继续被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国主义和内部封建统治者所侵略和奴役。单独依靠内蒙人民自己的力量，要粉碎国民党匪军的进攻是不可能的。对于这第二个外在援助的重大因素，也应有清楚的认识。

当然，没有内蒙人民自己的努力，选择了正确的解放道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与人民解放军合作，从而迅速发展了革命力量，内蒙的解放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生动的历史教训是：内蒙只有在苏联与外蒙击败日本的援助之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与帮助之下，只有在内蒙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当家的条件之下，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大家应拿这些生动的历史事实，来广泛地教育干部和广大人民。从内蒙解放的道路证明，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是一贯正确始终不渝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即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各族自治与自决权，从各方面帮助少数民族的解放与发展。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就是经过逐步发展而成立的。内蒙许多盟旗在其先后解放过程中，都曾成立过地方性的自治政府，如抗战时期的绥蒙政府，[八一五]后在已解放的东西各盟旗普遍成立的地方自治政府。现在因为战争的原故，有些盟旗还需暂时委托解放区其他地方政府管理。但是随着形势的开展，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统一性必更加强。在全国解放后，则将按照自愿和民主的原则，由中国境内各民族组成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毛主席：论联合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将是这个联邦在国境北部的主要组成部分。

前面讲过，没有先进的兄弟的带有决定性的帮助，内蒙不可能，得到解放。但是现在是否可以不需要帮助了呢？毫无疑问，内蒙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还需要长期的大力帮助。例如：王爷庙发生了瘟疫，就必须由外面派防疫队去；游牧区的畜瘟、花柳病，没有近代医学，是不可能治好的，这就需要外面的帮助。总之，内蒙在各方面都与国内其他部分不可分割，决不可能幻想离开国内外友

邻民族（如汉民族、苏联、外蒙等）的团结帮助，而能够孤立地求得自己的巩固发展。内蒙如果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不努力追上汉民族，那么所谓民族平等，也将是落空的。如果内蒙的经济状况，老是停留在“茶布水烟糖，牛马骆驼羊”的水平，那么，经济上的长期依赖，必然造成政治上的长期依赖。这样，内蒙民族实际上就并没有真正获得解放。只有从经济、文化上真正提高，才能有实质上的而不仅是形式上的民族平等。只有这样，内蒙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优良的历史传统才能自由发展，内蒙民族才有光明前途。

这就是我们党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坚定不移的政策。内蒙党的每一个同志，都应深刻了解这一点。

二、内蒙工作的现状

内蒙工作的现状，要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成绩很大，但基础还不够稳固。

广大内蒙人民，自己选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正确的民族解放道路。这就是“八一五”以来内蒙工作中最基本的收获。因此，在许多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

首先是冲破各种障碍，经过自治联合会的一个准备阶段，终于成立了几百年来未有过的东西蒙统一的真正的人民的自治政府，并创建了内蒙人民自己的军队。这个政府和军队，积极参加了全国的解放的战争，配合东北、华北解放军作战，肃清了内部的土匪，并保卫了内蒙人民胜利的果实。

其次，培养了三千多干部，训练了几千知识分子，发展了四千党员，和几千青年团员。在这一基础上，胜利地打震了内部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抵抗和妥协投降的阴谋。

再次，农业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广大贫苦农民获得土地与耕牛，有了自由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其他半农半牧与游牧区，也在进行各种民主改革。从此，内蒙的经济发展，开始得到了广大范围的自由。

在多年的曲折战争过程中，内蒙人民找到了他们自己真正的革命领袖——云泽同志。内蒙任何一个假仁假义的封建上层人物，在云主席的革命立场、光荣历史和工作成效的面前，迅速失去其影响。

内蒙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现在是空前提高了，历史造成的蒙汉民族的隔阂和对立，也在逐渐消除。

这是内蒙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是全内蒙人民、内蒙军队、内蒙共产党英勇奋斗得来的胜利。这个胜利奠定了内蒙自治政府今后发展的基础，帮助了全国的革命事业的前进，并且给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树立了求解放的榜样。

但是，现在是否一切事情都办好了，可以高枕无忧了呢？很显然的，还差得很远。内蒙工作的基础，还不够稳固，还有许多问题。

首先是群众的组织性与觉悟性还差。经济文化方面积极的发展还待极大的努力。游牧区的工作刚开始做，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工作很粗糙，发生了许多偏向，有的地方搞乱了，西蒙还有部分地区没有解放。

其次，干部的政策水平、思想水平还很低。老干部少，经验也差，能掌握一个局面的不多。新干部提拔快，掌握政策更困难一些。至于管理财政经济建设，以及各种专门技术的干部更为缺乏。西蒙局面进一步打开后，也要准备派一批干部。因此，在干部的质量与数量方面，还赶不上形势的发展，需要努力提高。

此外，内蒙外部与内部的敌人还存在。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和蒙奸反动分子，对内蒙是决不会死心的。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样，很看重内蒙这块反苏反共的“前进阵地”。他们在内蒙附近设立了专门的特务机关，想尽千方百计，来破坏内蒙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想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来进行各种挑发阴谋，分清敌我，防止特务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各种阴谋活动，破坏内蒙人民的胜利事业。

三、内蒙党当前的政策

你们替内蒙人民办了许多好事，但在平分土地运动的很短时期（约两个月）内，也发生了严重的左的偏向，比如半农半牧区和个别游牧区，也照样平分土地，工商业也有被侵犯了的。个别地方，群众在反对蒙奸恶霸斗争中，掌握不清，有错杀了人的现象。有的地方，曾发生拆庙焚经打喇嘛的行为等等。这主要是由于我们领导干部，对内蒙的情况了解很差，犯了主观主义急性病和尾巴主义的错误所致。有的同志有所谓“顺手牵羊”的思想，斯大林称此种急躁病为马上共产主义的骑兵式的游击。对内蒙具体的经济环境、阶级结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一切特点以及人民的心理感情，缺少深入的了解与分析，机械地搬运汉人区的一套。而蒙古新干部更缺乏经验，盲目性很大，有的由于自己的家庭成份的顾虑，不公开提意见，有着严重的迎合性，不能采取对人民更负责的态度。这两种情况一结合，就不免火上加油，事情更易于办糟。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在实际工作中碰的钉子，教导我们：在内蒙实行党的各种政策，每进行一项重要措施，必须分别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使之适合各个具体环境。必须照顾民族特点，群众觉悟和干部条件，采取慎重的、缓进的、有步骤、先后的工作方法。否则“有好心，无好报”，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不革命。例如宗教这是一个群众性的历史性的问题。甚至苏联到现在也还有它的残余。而我们有的同志，竟强迫蒙人毁佛像。结果，群众在墙上挖洞，将佛爷藏在里面，外面用泥幕泥土，照旧磕头。这些同志不明真相，

还自夸这一下破除了迷信。这是何等幼稚的行为！这种幼稚的行为，这种主观主义的急躁轻率现象，今后必须力戒。

关于在内蒙古打击谁、团结谁的这个根本问题，有许多干部过去是没有搞清楚的。内蒙的基本革命队伍是工人，贫困中农、牧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及其他一切劳动人民，这是内蒙民族的主体。但拥护内蒙自治政策、赞成民主改革的人，都应团结在一起，以便建立广泛的内蒙民族的反蒋反美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少数的大蒙奸、恶霸分子。

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经过内蒙党委和大家的研究，内蒙现阶段革命的基本政策，主要应包括以下几点：

（一）承认内蒙境内的土地与牧场，为内蒙民族所有。扫除内蒙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与牧场所有制。

（二）废除封建阶段一切特权（不承担公民义务、强迫征役、无偿劳动、私买公地等），废除奴隶制度，一切奴隶宣告完全解放，享有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

（三）废除土地改革前农村中一切地主、王公、高利贷者对贫苦农民与牧民的一切债权。但雇农中农与牧民间的债务，商业买卖间的债务，不在废除之列。

（四）农业区实行耕者有其田，原来一切封建地主与庙宇所占有的土地，一律收归公有，按人口统一分配给所有无地和少地蒙汉人民。对蒙古一般富农的土地不动，坚决保护中农。土地分配后，应即承认各阶层人民，对于其所分得与保留之土地，有自由经营、买卖与在特定条件下出租之权。

（五）牧畜区实行保护牧农，保护牧场，放牧自由。在牧民与牧主两利的前提下，有步骤的改善牧民的经济生活，发展畜牧。

（六）在半农半牧区，发展农业，发展畜牧，适当地提高贫苦农民与牧民的生活。

（七）取消蒙租（注一）。蒙汉人民对于自治政府，应有同等的公平负担与公民义务。

（八）蒙古人民信教自由。喇嘛不许有公民以外的特权。

（九）加强蒙汉人民的团结。在内蒙古境内的蒙汉人民及其他民族的人民，一律平等。

此外，在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具体政策。农业区地主的土地耕畜财产没收平分，同时必须留给与农民同等的一份。大蒙奸恶霸只本人不分。出租户口地（注二）之小地方，其财产不分，其土地一般不动。蒙人除恶霸大富农外，一般富农的土地财产不动，已分者维持现状。中农坚决不动，只分进，不分出。半农半牧区农业占优势者，大地主的大垄地（注三）与耕畜，实行平分，小地主与富农不动。漫撒地（注四）一律不分。牧业占优势者，大牧主的耕畜分给农民，但耕

畜与牧畜必须严加区分，并严禁分散牧群。个别大蒙奸恶霸的土地、牧畜、财产经盟以上政府批准没收后，土地可分给农民及愿种地之牧民。但对于牧畜，应作到不拆散牧群，由政府统一管理，组织牧民放牧，适当改善农牧民的生活。半农半牧区经济发展方向为农业或牧业，依据群众自愿与自然条件决定，并应保护牧场。游牧区废除王公贵族上层的一切特权，废除奴隶制度。在牧民牧主两利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行民主改革，建立民主政权，发展畜牧经济，保护牧场。

以上这些政策，主要是根据今天内蒙主客观情况，民族特点，经济性质，群众觉悟和干部条件提出的。忽视这些，我们就会犯错误。

注一：（蒙租）为过去汉人对蒙人一种田赋式的轻微负担。

注二：（户口地）是蒙古王公贵族赐给其下属当差者的少部土地。

注三：（大垄地）是蒙古比较农业化的一种耕地。此项耕地很肥美，经过人工整理垄段，并常年耕种不辍者。

注四：（漫撒地）是不固定的耕地，将草地开出撒下种子，不锄不翻，收割后就把它扔了。

四、加强蒙汉干部团结

这次会议，反映蒙汉干部中思想认识上还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这就是对待民族问题的认识上尚有偏差。这种偏差，在形式上表现为蒙汉干部关系问题，以及领导关系问题（内蒙若干盟旗党的负责人多是汉人老干部），而在实质上是民族主义倾向问题。如何在思想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内蒙党当前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个问题如不能很好解决，其他一切工作，一切问题就都不好解决，内蒙的革命车轮，就不能顺利前进。

在内蒙工作的汉人干部，绝大部分是努力的，有成绩的，蒙汉干部关系，基本上也是团结的。但是汉人干部容易有大民族的优越感，容易习惯汉人区的一套作法，容易看不起或不相信蒙古干部，觉得蒙古的新干部“未经过考验”，不善于对他们采取遇事虚心商量和耐心帮助的态度，而往往包办代替，不尊重蒙古干部，甚至给他们乱扣帽子。平分土地时，在左倾影响之下，有的旗政府无形中取消了，只挂县政府的牌子，出完全汉文的县政府的布告，蒙古小学也有停办了的。后来在纠正偏向时，又有个别地方补偿中农时，不补偿蒙古中农。有一个地方的负责同志，甚至认为蒙古人不会种地，主张好地分给汉人，坏地分给蒙人。蒙汉联军部队里面，发生不许蒙古兵说蒙古话的事情。这些虽属个别例子，但值得我们严重注意。此外，汉人干部不安心，“五日京兆”、“作客”思想相当严重。因此就不能积极沟通与蒙古同志的关系，不能专心一意研究蒙古情况，不愿学习蒙古语言文字，不能细致体会蒙古同志的心理感情。

以上这些情况，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不同，不论其程度的轻重，其思想实质可说都是大汉族主义的残余，或受了大汉族主义的影响。斯大林曾批评过这些大民族主义思想说：“在边疆工作的大俄罗斯共产主义者，他们是在‘强国’民族生存条件之下长大的，不知有民族的压迫。因此他们往往缩小了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或是完全没有顾及到这些特点，在自己的工作中未考虑到某一些民族的阶级构成、文化生活、过去历史的特点，使党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庸俗化，因而加以曲解。这种情形，其结果便弄成曲解共产主义，倾向于大国精神、殖民主义、大俄罗斯排外爱国主义方面”（联共十次大会民族主义报告提纲）。这一指责，就好像是对着我们今天许多同志的情况说的。

我这样一说，许多同志也许会很不舒服。当然犯这些思想毛病的同志，一般都是不知不觉犯的。他们过去长期在解放区生活，有了一套现成的作风和工作方法，其中有些在一般解放区本来没问题的，但一用到内蒙来，就发生问题了。汉人同志首先应该去掉作客思想，一心一意为内蒙人民办好事，长期的服务。毛主席规定的为人民服务，是不分汉人、蒙人或回人的。“共产党人应当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与发展”（论联合政府）。“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地积极地帮助被压迫的或依赖的民族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汉人干部应了解你们工作的伟大意义，要安心工作，同时应坚决克服上述各种思想的偏向。学习蒙古语言文字，注意民族形式，深刻领会蒙古群众与蒙古干部的心理感情，研究分析内蒙的社会情况，耐心帮助蒙古同志，并向他们虚心学习，把工作做得更好。

蒙古新干部一般地有许多优点。他们一般地工作积极，艰苦奋斗，能够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他们作了许多工作。内蒙党今后的发展，主要依靠他们，因为内蒙的老干部数量有限。但他们中间有的同志在思想上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其中基本的一条是阶级立场模糊，容易把民族与阶级对立起来，说什么“民族斗争光荣，阶级斗争狭隘”，说共产党是“汉人党”，内蒙共产党是汉人建立的等等，对汉人同志的帮助，有时不是采取积极欢迎的态度。这些思想都是根本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不了解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联系，不了解真正的民族斗争，实质上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是劳动人民中间最先进的阶级，它是代表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的，而劳动人民是民族的主体。内蒙民族的主体是工人、贫雇中农、牧民和其他一切体力与智力劳动人民。党是阶级的代表，也是民族的代表。内蒙党的任务，就是为全内蒙的劳动人民办事，办好事。只有这一条，别无其他。因此，每一

个忠于内蒙人民的革命者，都应对内蒙共产党无条件信任，去掉一切怀疑。关于内蒙的解放与发展，必须有外力帮助的问题，前面已经讲了许多。内蒙同志之所以直到今天还存在这些不正确的狭隘的思想，主要由于长期受异族侵略者压迫统治，自然造成对本民族一种“保护本能”式的思想感情所致。这些思想感情，对异族侵略者是完全正确的。斯大林对这种情况也曾加分析。

“当地共产主义者，他们曾经过民族压迫的困苦时期，还没有完全解脱民族压迫的梦魇，往往夸大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放弃了劳动者的阶级利益，或是简简单单地把该民族的劳动者的利益跟该民族的‘全民’利益混为一谈，不会把前者从后者之中分别出来，而根据劳动者利益去建立党的工作，这种情形又弄成放弃共产主义，而倾向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方面”。（同前）

此外，有些蒙古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容易自满自骄，遇事急于求成，好大喜功。大家应当了解，工作有成绩是应该的，把工作做好，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天职，一切功劳应归功于人民。没有群众的劳动，试问单单几个共产党员的能办好什么事？我们决不能学统治阶级在人民之上观点，个人、我，总是渺小的，只有人民才是伟大的。我们应多向群众学习，多在工作中总结经验，教育自己。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不要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内蒙知识分子少，很可贵，作用很大，内蒙党很重视，但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工农，应该与工农一道前进。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应切记站稳阶级立场，切记着是替工农劳动人民对党无限忠诚与老实的人，才会很快进步。

资产阶级的大汉族主义与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这两种倾向，目前在蒙汉干部中，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它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物，我们必须坚决与这两种倾向作斗争。汉人干部应自己坚决担负起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斗争，把它进行到底。应该指出，前一种斗争，关系更加重大，因为在若干地方党的负责人，目前还多是汉人同志。只有把这两种斗争进行得好，蒙汉干部的团结，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五、今后要办好那几件事？

关于内蒙党今后的总任务，前面已讲过，现在提出当前几件重要工作谈一谈。

（一）目前不再扩大部队。内蒙解放军现在的任务主要的是如何提高部队的质量，使内蒙人民解放军更加成为一支有阶级觉悟的，并有战斗力的，有严格纪律的毛泽东式的人民军队。为此，除把内蒙军政大学办好外，各师还必须办短期训练班，轮流训练在职干部，并特别注意工农干部。要加强政治工作，加强阶级教育、纪律教育和学会做农业工作。不是硬搬汉人区的一套，而是通过内蒙的民族形式，用

生动活泼具体的材料进行教育。军事教育应着重实战经验，发扬蒙古骑兵骠悍无畏的优良历史传统。建立这样一支精干的忠实为内蒙人民服务的军队，对内蒙的解放与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二）办一个党校，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新老干部从政策理论上，从实际工作上提高一步。要克服下面不愿抽调干部学习的偏向，眼光要放远一些，即使工作暂时受些影响，也必须忍受。各方面要多多培养提拔人才。要有计划地训练一批迫切需要的技术人员，可以输送一批知识分子到东北各种专门技术学校学习。高级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并与内蒙当前各种具体政策相结合。须知干部质量的提高，是今天内蒙一切工作的决定关键。

（三）加强经济建设，切实为内蒙人民兴利除弊。内蒙人口约四分之三在农业区和农业占优势的半农半牧区，因之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使蒙人耕作技术能逐渐赶上汉人，增加农作物产量。此外，要用很大力量发展畜牧业，用各种方法繁殖牲畜，如改良畜种、训练畜医、防疫、打狼、割草盖圈棚等；同时严禁宰杀母畜，反对不适当征收牲畜。政府应有组织地发展蒙汉间公平贸易，由上而下地切实办好合作社，廉价地供给蒙汉人民的需用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公道地收买蒙汉人民所有的商品，以便逐渐消减汉人私商中那些不正当的过份的中间剥削，毛、皮革等轻工业要依据可能条件，开始在几个地方认真办好和开办几个工厂，取得经验训练干部，逐步推广各种经济建设。要防止下面的假报告、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要坚决反对各种各样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切记不要硬搬汉人区一套，不要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如果在经济方面，我们办不出好事来，牛羊照样死，蒙人买东西照样吃商人的，仍旧吃不饱穿不暖，试问内蒙人民为什么要拥护自治政府？

（四）加强文化建设，多办国民学校，办好几个中学。必须广泛应用蒙文蒙语，多出一些蒙文的书籍刊物，向轻视民族语文的倾向作斗争。加强医务卫生工作，多培养些医务干部，改造喇嘛医生，提倡医院、医生下乡，到游牧区去，减少游牧区人口的死亡。

在做好这几件事的基础上，内蒙自治政府就会更好地发展与巩固起来。统一的自治政府，是内蒙人民奋斗的结果。内蒙党应在各方面来加强各级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的建设，使之从内容与形式更加为内蒙人民所衷心爱戴。

党要求大家的，就是全心全意为内蒙人民服务，就是把以上这些事情办好。要保证这一要求实现，必须干部在思想政策上加强锻炼，还需要建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因此，目前在领导机关和干部中存在的浮在上面、不深入下层、不了解情况、粗枝大叶，各种各样官僚主义

倾向，需要大力加以克服，我们要提倡干部和知识分子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到农业区去，也到游牧区去。去真正埋头干，研究如何组织教育蒙人种地和汉人一样好，学会各种农业生产，学会办工厂，研究牛羊如何繁殖，娃娃如何能养好。你们不要作空头的政治家，而是要做真正有本事能为广大内蒙人民具体办好事的政治家，能为内蒙人民今天和明天办好事的政治家。

相信内蒙党和自治政府在云主席领导之下，全体党员紧紧团结在云主席的周围，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人民政府 施政方针向东北人民代表会议的建议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东北 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开幕，我谨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庆祝会议成功，并向会议提出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供各位代表讨论。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领导之下，已经根本打垮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现各路大军正在西南西北扫荡残敌，全国解放，已为期不远了。

解放战争的目的，毛主席早已明确告诉我们：就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

东北解放区，是全国最先获得全部解放的地区。在东北解放区内部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剥夺封建地主以及敌伪与官僚资产阶级推翻反动统治的任务，业已基本完成。现在已经开始了在新的条件与新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在这个时候，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东北人民政府，是东北人民的一件大事。

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与即将产生的东北人民政府的任务，就是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动员与组织一切能劳动的人民，以大力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以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部胜利，为全国工业化创造有利条件，并从而逐步改善与提高人民生活，以巩固与建设新的东北。

东北是全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之巩固与建设新东北的任务与争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的任务必须密切结合，并使前者为后者服务。由于东北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工业基础高于全国各地，因而它对支援

全国战争与创造全国工业化的条件所担负的任务，也就特别重大与艰巨，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担负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东北的完全解放，粉碎了中外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及东北内部封建残余势力对于他们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无疑的他们将继续进行各种可能的阴谋破坏来反对东北人民，因此我们必须提高人民的警惕，彻底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以保证建设工作的胜利进行。

为了更顺利地完 成新的建设任务，必须认真的向苏联学习，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斯大林党领导之下，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艰苦奋斗了三十二年，粉碎了国内外敌人各种的进攻与破坏，已经建设了一个辉煌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全世界人民解放的灯塔。苏联人民所走的道路也正是中国人民要走的道路，因此我们必须与苏联人民结成亲密的友谊，学习苏联人民的艰苦奋斗精神，学习苏联建设的经验、技术和管理方法，以便克服困难加速我们建设的过程。

东北人民政府今后的施政方针，分六个方面来说明。

一、全力恢复、改造与发展东北经济

东北人民从敌伪手中所接管过来的经济基础，是殖民地性质的，并且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因此我们应该首先以全力有计划地进行恢复改造与发展东北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建设。

东北经济建设的第一步目标，我们拟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的三年中间，以全力争取把工业生产设备和农业生产量，恢复到一九四四年的水平，并适当的改造原有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使之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要求，以为进一步发展东北经济与为全国工业化准备条件。因此我们必须贯彻毛主席指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纠正现存的和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向。

工业方面

应以最大的努力恢复国营重工业，如钢铁、煤炭、电气、机械、化学及有色金属等，这是全国工业化的基础。同时，为保障人民生活需要及帮助重工业发展，也要注意轻工业的恢复与提高，根据东北条件并配合全国生产情况，特别要注意造纸、油脂、制材、纺织、日用化学等。要加强经济工业的计划性与组织性，把国营、公营与私营的工业统一结合起来。加强经济方面的统计的、计划的机构与工作，要认真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技术人员，贯彻生产企业化与管理民主化，是目前国营公营企业管理中亟待彻底解决的问题。生产企业化，当前应特别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经济核算制，实行定额管理，减低成本，提高质量，实行节约，克服浪费，使生产与供销密切结合反对

保守主义。管理民主化，即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及技术人员搞好生产，当前主要是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使其经常化，并充实其工作内容，发展民主，改善领导，克服官僚主义。

为着工业的恢复、改造与发展，必须：一是坚决依靠工人，加强工会工作，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为发展生产而努力，开办职工技术训练班、职业学校，培养技术工人。同时从生产的发展中改善工资制度，逐步提高工人生活待遇，加强劳动保险与工人集体福利设施。二是提高现有干部水平，认真培养管理与技术干部，延揽与团结各种专门人才，提高与改善其待遇，奖励发明与创造。扩大与加强工业大学及工业专门学校，认真培养工厂专门人才。三是加强工业部门的研究与实验设备，有系统的进行地上和地下的资源调查。四是尽量发挥与使用私人资本在恢复与发展东北工业中的积极作用。

根据上述方针与现有情况，在设备与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争取到一九五二年底，国营重工业达到下列生产设备水平：

发电能力：达到一九四四年设备水平 100%；

采煤能力：达到一九四四年设备水平 92%；

制铁能力：达到一九四四年设备水平 100%；

制钢能力：达到一九四四年设备水平 104%；

钢材制造：达到一九四四年设备水平 200%。

改造原有机构工业的落后状况，力求发展，使之与其他工业的发展相适应。

根据上述工业发展的情况，三年内国营企业可增加新的职工四十万人。

农业方面

今后的任务，是提高农业生产量，扩大棉麻种植，发展畜牧业、林业，改善农民生活。

为此必须发展劳动互助合作组织；改进耕作方法，提倡施肥；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结合防汛；实行奖励移民政策，制定资金，安置移民，预计三年内移民十万人，并保护牲畜，奖励繁殖。

三年内有步骤地普遍地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畅通城乡交换，为社员的生产与消费需要服务，并从而扶助劳动生产互助的提高与发展。

着重保护森林，节用木材，有步骤地进行造林，伐木与护林结合，林业与农业结合。

根据上述方针，预期到一九五二年底，东北农业生产达到下列水平：

农作物总产量比今年预计生产量增加 160%；

耕种面积比今年增加 5%；

棉田增至三十万垧（“八一五”前为二十二万垧）；
麻类种植增至三十万垧。

完成上述农业生产任务的基本关键在于很好组织劳动力，就是用一切努力，把所有农村可能从事生产的人都组织到农业生产战线上来，动员男女老幼，各尽所能，参加生产。我们必须以很大的力量做好农村工作，必须很好地领悟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它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因之任何放松农村工作的观点，与在农村工作中的自流或强迫命令的工作方面都是错误的。

商业方面

新民主主义商业应成为发展工农业的纽带，为发展生产保证人民需要服务。为此，必须进一步改善与发展国营商业网，扶助合作社发展，领导私人正当商业，取缔投机非法行为，了解市场需要，正确掌握物价政策，以发展城乡内外的物资交流，把商业工作向下列三方面发展：

第一，组织东北境内的城乡交流，实行向公私工业及农村合作社的定货制，掌握工业农业生产品，提高商品质量；并根据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需要，推锁成品与原材料，从而有计划地掌握市场，回笼货币，稳定物价，保障原料，发展生产。

第二，研究全国市场的需要，在生产与供销上，与全国取得分工合作，以便畅通与全国各地的物资交流。

第三，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实行管制与保护政策，首先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平等互惠的贸易关系，以便取得他们对东北经济建设的友谊援助。

这里决定的问题是我们的商业干部要学会为人民做买卖，学习与提高业务，发挥商业为发展生产与保证人民需要的作用，以加强对私人正当商业的领导并与帝国主义及某些奸商作斗争。

私营工商业方面

对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必须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指导其经营与发展的方向。特别指导他们面向农村与农业及农民需要结合。帮助它们克服目前由战时经济到平时经济的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原料供给、成品推销、采购运输与转业的困难；改正过去对私营工商业自流态度与某些不适当的限制，扶助它们的正当发展。在劳资关系上，需要健全与加强各级劳动局的组织与工作，实行劳资双方协商订立的集体合同制。按照劳资两利的原则与生产情况，适当的解决工资、工时、解雇、厂规与劳动纪律、福利待遇等问题。一方面保障工人必须的生活与福利，一方面使资方有利可图。

发挥私人资本在恢复与发展东北的工农业生产以及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中的积极作用。在工业政策、贸易政策、税收政策、劳动政策等各个方面引导与节制私人资本主义，同时对于投机捣乱的奸商以及一切从经济上捣乱国家建设的行为，则应采取有效办法，予以取缔。

根据以上方针，由东北人民政府制定工商管理办法具体实施。

交通运输方面

发展交通运输是发展生产的条件之一，在铁路前面，三年之内修复东北已有的铁路，特别要恢复各重要企业的铁路运输，修复机车及添造货车，改善铁路营业制度。

加强公路干线的修补，建设永久性桥梁，组织人民加强保护工作，发展公私汽车大车的运输事业，便利城乡交通及短距离的客货运输。

统一与加强航政建设，发展造船业与海军。发展内河航行。

邮电工作主要是提高技术，熟悉业务，巩固与加强现有设备，使邮电畅通无阻，并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增加邮电的新设施。

教育人民爱护与参加交通建设工作。

财政建设方面

财政建设的方针是巩固与发展东北的财政金融，适应东北经济建设及支援全国的任务，其具体措施：

①建立入出计划、及预决制度，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用，严格审核监督一切行政上与生产上的收支，保证扩大与合理使用国民经济的投资，首先是基本工业的资金。

②实行发展生产与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现行农业与工商业的税率不变，简化税收手续，改善税收制度。根据国民财富收入的增加，扩大财源，减轻人民负担。

③改善国营公营企业的管理，增加资金积累。

④在统一方针与计划下，加强各省市地方经济活动，节约地方财政开支，减少国库对地方财政及企业供给与拨款。

⑤银行的业务中心是扶助生产，应扩大生产贷款，减低利息，实行信托保险及其他金融事业。

⑥发行必要与可能的建设公债，吸收社会游资转入生产，提倡节约储蓄，办理折卖存款。

⑦确定编制，实行精简，严格制度，逐步实行薪水制，废除供给制。

根据以上措施，今后三年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及生产的发展，保证逐年增加财政收入与工业投资，从而更充裕支援全国的力量。

二、提高与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目前文化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普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宣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培养革命知识分子及工农干部，为发展生产与国防建设服务。

为此，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发展高等教育，以培养各种建设人才（特别是工业人才）；同时注意改进中学教育；普及国民教育；交流中苏文化，开展中苏友好工作；开展工厂及农村中的文化卫生运动，逐渐扫除文盲，切实保护劳动人民的健康。

高等教育应根据精干与正规化的方针，统一规定专科以上学校的教育任务与招生计划，贯彻最近关于高等教育的决定。各中等学校，应根据今后经济建设、高等教育及小学师资的需要，改善师资，提高教学质量。小学应予劳动人民子弟入学以方便条件，小学在自愿原则下奖励人民自力兴办，由政府统一规定课程与学科，并加以领导。提高与培养各级师资，团结与改造旧有教师，到关内聘请大批有知识有经验的进步教师来东北，尽可能改善各级教师的生活待遇。

加强机关工作人员的学习，建立学习制度，以达改造思想和改进工作之目的。

广泛开展职工及农民中的社会教育，进行培养劳动观念，遵守纪律，爱护国家财产，勇敢保卫人民祖国，严重警惕中外反动派破坏阴谋，注重卫生健康等新国民教育，并通过各种适当的方式，逐步扫除文盲，首先应加强工人的识字运动。

加强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巩固与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宣传苏联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介绍苏联各种建设的成就与经验，推动学习苏联运动，在中学以上学校规定俄文为必修课。

贯彻文艺为工农服务的方针，加强文艺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开展工农群众的文艺活动，健全东北文协的组织与领导，有计划地组织文艺工作者及文艺团体深入实际，创作富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奖励优秀作品加强文艺工作者对马列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开展文艺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加强报纸、电影、广播及书店工作与城市、工厂及村镇的广泛联系。目前急应改进发行工作，加强大众读物的出版，统一管理出版的登记审查工作。发挥东北电影厂能力，多出对人民有教育意义的影片。

建立与加强各地首先是城市工矿区 and 部队的医药卫生设备，协助与指导各地人民进行防疫卫生运动，加强妇婴卫生及儿童保育工作，有计划地培养医务人员，团结与改造旧有各种中西医务人员。

三、加强国防建设，建立正规军队

我们在东北已赢得了和在全国即将全部赢得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的胜利，但他们是绝不甘心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因胜利而放松人民军队的建设，相反，我们要加强它。我们要在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统一的领导与指挥下，首先担负起建设正规化边防军的任务，藉以保卫国家、保卫和平、保卫经济建设、镇压反动，我们在军事建设上的具体措施为：（一）加强现有部队，增加各种特种部队，使我们的军队迅速正规化并逐步近代化。

（二）在军队组织上确定正规编制与制度，加强各级军事组织，克服游击习气及无组织无纪律的残余。（三）加强现有军事学校，学习苏联建军经验，提高干部质量，掌握现代战争的技术。对部队实行正规的军事训练，加强文化与技术教育。（四）加强政治工作，提倡爱国主义的英雄主义，提高与发扬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与战斗意志。（五）加强人民武装的组织与教育。（六）各级政府要注意荣军与退伍军人安置，组织他们就业，从事生产，贯彻实行政府优待军属条例。

四、加强公安司法工作保护人民利益

我们加强军事建设是为着加强人民的国防，我们还必须加强公安司法工作的职能，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革命秩序，我们必须记住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与人民的法庭，藉以保护国家和保护人民利益”。

（一）公安工作重点，必须放在大中城市、工矿地区、铁路海港，同时不放弃小城市和乡村。我们的除奸政策是：“首恶者必惩，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处理案件重视证据，不重口供，严禁刑训。处决人犯，必须经过一定的政府批准。

依靠人民力量，教育组织人民，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翻把地主的阴谋破坏，镇压其捣乱行为，清除盗匪，巩固革命秩序。

公安管理工作，要特别注意实行法治，简便执法手续，在城市及工矿区并应整顿交通秩序，加强消防工作。

各级政府应加强对公安工作的领导，提高公安机关的效能，培养干部，整训公安武装，改造其成份，提高其政治与业务水平，贯彻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各县公安队改为保安队，城市公安队一、二年内转化为人民警察，同时注意教育组织人民，逐渐实行民警制。最主要的是依靠人民自觉地同反革命斗争。

（二）司法工作重点，在于坚决制裁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保护各革命阶层人民的合法权利，调解与仲裁人民内部的纠纷。

各级政府必须重视司法工作，注意配备与培养干部，健全司法机关，统一司法制度。

提高法院工作，发扬陪审与公开审判的司法民主制度。要使人民的法庭，不仅成为保护人民的武器，而且成为教育人民的讲坛，并使审判受到人民的监督。受审人如不服的，可按级上诉。

彻底改造旧的监狱，贯彻惩罚与教育改造结合，生活与劳动结合的新的监狱制。

提倡法治精神，保障人民政府的法律、法令的贯彻执行。

五、贯彻各民族平等的原则

坚持与贯彻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以达到全东北境内汉、蒙、回、朝鲜各民族人民亲密团结的目的，因此必须实行：（一）东北境内的全体人民除帝国主义走狗、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及未恢复的公民权的地主以外，不分性别、民族、种族、信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信仰与生活习惯，并保证各民族用自己的语文创办学校与刊物，同时各学校必须设置中国语文为必修科。（三）各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应由各该民族自由选择其行政及司法机关的负责人员。（四）严格禁止任何种族或民族仇视的宣传或行为，教育人民克服大民族主义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

六、政权建设进一步民主化

为了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除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与坚决贯彻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身体的自由，实行男女平等，以及保护遵守人民政府法令，进行正当职业的外国侨民外，今后必须进一步地贯彻政权建设的民主化。为此，目前应进行下列各项工作：

第一，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政权的基本形式，它是推进工作，克服官僚主义，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各地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应立即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县区村则在今年秋后建立，并在一定条件下早日建立省人民代表会议，并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一旦条件成熟，这种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各地的权利机关，选举各地人民政府。纠正任何忽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错误观点。

第二，精简政府组织，主要是减少层次，革除一切繁文冗节，实行简政，加强集中统一，以便政府密切与各阶层人民的联系，提高工作效能，改变城市中区街政权组织，提高干部质量，训练工人、农民、妇女、知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参加政府工作。发挥为人民服务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各种无组织无纪律，贪污腐化以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现象。

第三，建立人民监察制度，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发动人民纠正各种渎职乱纪现象，并向之展开坚决斗争。监察工作重点，目前应放在保护国家财产与保证经济建设上。

第四，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是党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无原则的迁就主义的态度，又要反对妨碍党与党外民主人士

团结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的态度。“共产党员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党外人士，这就是倾听群众意见，要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的原则”。我们在政府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必须谨记并贯彻毛主席这一英明的指示。

上面所提的东北人民政府今后的施政方针，如为代表会议所接受，则将在即将成立的全国民主联合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求其实现，各主管部门还要把它具体化，订出实施计划。我们在进行各种建设中，不是没有困难，但是，客观条件是完全有利于我们的，所有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只要我们紧紧跟着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走，只要我们善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阴谋破坏进行严肃的斗争，同时注意克服我们内部的盲目保守与自满情绪，紧紧地依靠东北人民并根据确定方针和计划，进行细密的组织工作与政治动员。我们认为有了全东北人民的坚强团结，再加上国内各解放区人民的帮助，及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人民革命力量的援助，我们就一定能克服困难，稳步前进，在建设新东北支援全国这一伟大事业上，完成我们所担负的光荣任务。

我们以东北人民代表会议的成功，与正式的东北人民政府的成立，来迎接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举行与全国统一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

荣誉是属于谁的？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在东北干部会议上的讲演）

同志们！

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同大家研究。

我们现在是由战争转变到建设，东北全党与全体人民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一切其他工作都是为搞好经济建设服务的。过去我们也搞过建设的工作，但那是一面战争一面建设，现在却完全转变到建设。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转变。根据新的历史情况，在我们党内，在统一战线中，在广大群众中，就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要求党来解决。

东北广大群众受了日寇十四年的掠夺，随后许多地区又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并经过了三年的解放战争，现在胜利了，群众要求恢复元气，要求提高自己的生活。我们必须认真解决东北群众这样的要求，把经济建设任务和群众要求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学会新的本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内同志，来担负伟大的经济建设任务，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我们熟悉的有些东西已经闲起来，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虽然我们党内大多数干部对于革命事业是积极努力的，并在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中曾经为人民做了不少的可贵的工作，但因为对新的经济建设任务，对当前具体的经济工作与其他建设工作，一方面是还十分不熟悉，另一方面是

还缺乏精神上的重新准备。因此，对于新任务，新的工作，还使不上劲。很多干部还未在具体工作岗位上真正安定下来，真正用心去钻研。这就产生了在这一过渡时期内某种不很正常的、动荡的现象，缺乏像在土改与战争时期那样高涨的热情与劲头。而和平的环境，城市生活的某些不良影响，也助长了这种现象的发展，并且有个别的人因此走向堕落和腐化。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密切注意的。

经济建设，与过去时期的土改与战争任务不同，它是长期的永久的任务，同时又是很复杂、很细致、很艰巨的工作。这不是喊口号的工作，也不是出风头的工作，而是需要埋头苦干的工作。如果没有全党与全体人民的非凡努力，没有一种新的气象新劲头与新的事业精神要搞好这一工作是不可能的。因此，客观形势要求我们所有干部，都要站稳自己的工作岗位，树立对当前具体的革命事业的进取与钻研精神，拿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与智慧，发扬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完成国家与人民的重托。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翻天覆地的伟大理想的，是自觉的献身于革命事业，为人民忠诚服务的战士，我们对于任何贪图个人名誉地位与物质享受的腐朽思想，都是极端鄙弃的。在我们的思想中，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人民的、国家的、党的事业高于一切、统治一切。而绝不能掺杂有为个人打算的思想与行为。谁不认识这个真理，谁就会被人民所抛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必须要有高度的革命精神，忘我的工作，撤掉一切个人的打算，为人民、为国家工作的愈多愈好的，以做一般人民群众的表率。如果拿这样一个要求来检讨我们东北党内干部的情形，那便可以发现，还有若干同志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还没有发挥他们所应起的作用。而有些同志对于荣誉、地位、物质待遇等问题，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认识，阻碍着我们事业的前进。

就对于新的事业精神来说，现在东北党内干部的情形，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积极努力，生龙活虎，能在实际工作中克服困难、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完成任务，并创造新的经验。他们时时刻刻，钻研工作，不讲空话，不喊困难，埋头苦干，很准确地完成并超过工作计划。他们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誉、地位或物质待遇，而把自己的全部思想集中在如何做好工作，如何更好的完成与超过国家与人民所托付的任务，至于人民根据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大小所给予荣誉、地位与物质待遇，对于我们这些同志来说，乃是“身外之物”，并不是这些同志所斤斤计较的东西。他们能把事业推向前进，他们能在摸索与钻研中创造经验，提高自己并帮助其他同志进步。这类同志是党的骨干，是党的荣誉，人民的荣誉，也是他们自己荣誉，我们应该表扬这类同志的新的事业精神，表扬他们的经验和成就。但是这类干部，在目前东

北党内还不很多。非党的干部中也有对事业具有这种积极性的人，但为数也不甚多。

第二种，按部就班，墨守成规，缺乏对新鲜事物的感觉，安于一时一地的微小成就，工作条件顺利时，也可做出若干成绩，但碰到困难，便缺乏勇气，不能挺身而出，而是束手无策或知难而退。他们也有抽象的做工作的念头，但是遇到问题，办法很少。其工作方法经常是一般的、抽象的、而不会真正钻研问题，具体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成天开会，不落实际，不能从解决问题当中得出新的经验，以教育干部，推进事业。他们一般的服从组织，但也盘算个人利益，在不“如意”时，就不能踏踏实实，专心钻研事业。这类干部的数量，目前在东北党内还是不少的。

为什么产生这种状况呢？一方面由于这些同志对转变没有足够认识，对新的工作不熟悉，而对过去已不适合于今天条件的工作方法却舍不得丢弃。主观上缺乏坚强的事业进取心，因而缺乏克服困难的精神，不会分析困难，找出办法，解决问题，从战胜困难中求得愉快。另一方面领导上在转变的过程中对于这些同志的帮助、教育、启发，引导，做得不够。这些同志基本上是好的，也有进步的愿望，是可以教育的，我们党应该在这方面加强教育与组织领导，动员这类干部向第一类干部看齐。采取各种办法，鼓励他们，他们每一微小进步，都应受到适当的鼓励，以便造成一种竞相追求进步的风气，以进步积极为光荣，以安于现状为可耻。我们若能使这一类干部向第一类干部看齐，而第一类干部，更能戒骄戒躁，奋勇前进，那便会使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与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一切工作的进展也将获得无限的新的动力。

第三种，不求进步，不研究改进自己的工作，专门讲大话、说空话、赶浪头、处处表现自己，甚至摆老资格，好讲求名誉、地位，计较物质享受。能力不大，个人的欲望颇高。供给制的常想自己是哪一级，但从不考虑自己的贡献事业，值得算那一级，不是把事业提高一级，只是想把自己地位提高。薪金制的常想自己该得多少分数，却并不计算国家与人民收入的分数，即如何爱护国家财产，改进工作方法，使国家的支出节约几分，使人民的利益增加几分。这类人常常斤斤于个人的利害得失，对工作却不甚用心，很少或从不考虑国家给予自己的任务应如何方能更好的完成，抱着“干不干，一斤半”的敷衍塞责的态度。其中有些人认为资格老，就应该荣誉大、地位高、物质享受多。对革命工作分贵贱、讲兴趣、图舒服、出力越少越好，享受越多越好。当他们私欲不能满足时，反而抱怨党，要党经常提拔他才高兴，工作一久，就表示厌倦，甚至压制新生力量，看到后起的干部进步了，不是鼓掌欢迎，而是气愤嫉妒，挡路阻碍，认为党对他不公平。但愈

是醉心于个人的得失，追求个人的地位和享受，则愈是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也就愈加不能很好地完成国家与人民所付托的任务，同时也就愈不进步，也就愈加不应获得荣誉、地位、和较高的物质待遇。因为党和人民决不能允许不顾国家的人和人民的利益，而去迁就某些个人的利益。

同志们：牺牲人民利益去迁就个人的利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像我们所说的第三类干部，目前在党内虽是极少数，但并非个别的，如果他们不改，便会变成革命前进的阻碍，甚至有堕落蜕化的危险，而他们自己过去的光荣以及已有的“地位”也会丧失掉。因为革命不是“封爵”，革命的地位是没有“世袭”的。革命事业是不断前进的，对于这种邪气，我们的党必须坚决克服，不能允许留存在与滋长。不然对革命是很大的危害。

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就是说我们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与品质，可以牺牲一切个人的利益为革命事业奋斗，并克服一切工作中的困难。那末，为什么还有对人民事业不起劲、不热情，而去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贪图享受，甚至渎职乱纪、贪污腐化的现象呢？这是由于某些腐朽的封建残余意识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相结合及其在党内的反映，而我们的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中还存在很多缺点，也是使这种恶劣现象滋长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这种现象在近来反映较多呢？这是由于东北没有战争了，并在大城市住下来了，而又未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肩上担负着更伟大、更艰巨的建设任务。因而不少同志在精神上松懈下来，而让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侵蚀着自己，侵蚀着党，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我们必须千百倍地加强我们的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而与各种侵蚀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严肃而适当的斗争。

当然，这只是就东北党内干部对于新的事业精神所持态度的大体分析，这还远不能概括全部的情形，有许多干部与以上三种类型还不尽相同。

同志们！我们的荣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地位与物质待遇应该是属于谁呢？

说到这一个问题，每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认识，这些东西首先应归之于工人阶级，归之于人民大众。大家知道：如果不依靠人民大众，我们共产党员是什么也搞不成的。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动力，我们革命与建设的荣誉，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地位与物质待遇的提高，也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只有人民大众有了地位，提高了地位，我们共产党员也才有位可说。我们的革命与建设，是要使人民大众获得更好又更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如果不去努力发展建设事业，从发展建设事业去一步一步地使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向上改善，使群

众首先得到革命与建设的果实，而只关心我们的个人物质生活，如要不首先去关心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而只关心自己的衣食住，那么，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就完全是可耻的，是可鄙的堕落。我们个人的物质生活问题，是不能够同群众的物质生活问题孤立出来的。

只有人民大众获的荣誉、地位和物质待遇之后，我们方可以把工作搞好，把全部智慧、能力贡献给人民事业，而不计个人的得失。从我们必须懂得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高的利益，这是我们利益的最高准绳，除此这外，别无其他。至于“荣誉”，那是人民根据你对于整个事业的贡献而给予你的鼓励，“地位”则是人民给你的责任，“物质待遇”则是人民根据你对具体事业的贡献而给你的适当的酬劳。这种酬劳不是平均的“供给”的，也不是靠吹嘘与蒙哄，而是要看你对人民事业的实在的贡献大小而定的。你对国家与人民的贡献愈大，人民给你的荣誉地位物质待遇也就愈高，这是成正比例的。

比如沈阳机器一厂钻盘工人赵富有，于一月底以三点零九分，制造车“丝杠”新纪录，这种“丝杠”作业，在别的工人第一次试验时用二十三点，第三次还用了十三点，而车“丝杠”“理论”标准作业时间一般为六点四十五分，赵富有的创造，比第一次试验时缩短将近二十点，比“理论”时间节省了三点又三十六分，因为赵富有有专心事业，有了新的创造，因之他应该享受应得的荣誉，所以报纸用头条消息表扬他的英雄事迹，工业部还准备给他以物质奖励，因为他对人民有贡献，因之人民给他以应得的荣誉地位与物质待遇。所以我们说应该得到荣誉、地位与较高的物质待遇的人，必须是积极苦干，努力钻研，克服困难，完成并超过国家的任务与人民的托付的。我们考核一切干部，党的与非党的工厂管理人员，商业贸易人员，教育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军事工作人员，党务工作人员等等，都要用这个标准，而不能有其他的标准。

我们党选择干部的标准是德、才、资。德是对人民事业的忠诚，才是完成人民委托的能力，资是他的斗争经验和他与人民群众联系的规模和密切的程度。这三者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才固然要看具体完成任务的能力，但德与资也都不是抽象的，要看其对国家与人民的贡献。假若没有贡献，就是不能为人民忠诚服务，那如何能称为有德？斗争有中国特色固然可贵，但其所以可贵，是在于对人民有贡献，这种贡献不能使之中断，应继续保持与发扬下去，为人民做更多的更加负责的工作，党与人民都是这样殷切期望我们的。但若停步不前，对人民又无贡献，那就没有什么可贵之处了。

一切党内干部都应当明了：任何一种革命岗位，任何一种革命工作，都是高贵的。不能说那种工作是不重要的，因为离开其他工作配

合，任何工作都不能孤立的解决问题。每个革命同志应该珍爱自己的岗位，站稳自己的岗位，积极地、负责地、把自己的工作搞好。不要看那一种工作“吃香”，都去“赶浪头”，或者因为赶不上而灰心丧气。这是一种个人的情绪，必须克服。

我们要想一些具体的办法，把各种党的与非党的工作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发扬起来，组织起来。首先，要教育干部和党员，建立和加强革命的新的事业精神，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努力完成与超过自己负担的任务。党的干部应首先作群众的榜样。要强调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要使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在整个社会生产与事业的发展与提高中来提高个人的思想能力、工作能力与生活水准。其次，要检查和改进我们现在的组织机构与各种制度，使之完全适合新的要求，真正收到能推进发扬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作用，真正收到奖励好的、批评坏的作用。在组织上要实行按级分工，个人负责制，在制度上要实行干部的升降制度，根据干部对人民的贡献，实行大胆的提拔和使用，不要过分去迁就“资格”，因为这样是与事业不利的。要有正确的奖惩制度，表扬与奖励好的，批评与惩罚坏的，奖励不仅有荣誉奖，同样要有物质奖，使那些对人民贡献较大享有较高的物质待遇，这是完全合理的，要在社会上及党内高度发扬进取精神，提倡创造，使人民的英雄到处受尊敬，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要开展反贪污浪费与渎职乱纪的斗争，对于严重的渎职乱纪行为应予撤职查办，对于严重贪污及浪费国家财产的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此外，要规定与实行薪水制度，休养制度等。我们必须坚持这样一个原则，这就是事业第一，完成人民与国家所托付的任务第一，国家与人民所赠予的荣誉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地位与物质待遇，也应该给予那些对人民的事业有创造精神的，完成任务最多最好的同志，这些同志，将受到党的尊敬与人民的尊敬！

同志们！我希望东北全党、全体人民，尤其是党与非党的工作干部，站稳自己生产与工作的岗位，树立新的事业精神，创造新的生产与工作的纪录，为国家与人民的收入增加分数，将我们的经济建设推进一步，把人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一步，以便更有力的支援全国战争，将东北建设成全国的工业基地，这就是我们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NextPage]

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
高岗同志在中国共产党
东北区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三日）

同志们！今天向大家提出的报告，是关于东北国民经济恢复和重建的问题。这是现在我们党的工作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次代表会议

的主题。我们需要把这—个主题研究清楚，以便我们全体干部、全体党员能够明确而负责地站在东北人民的最前面，而把我们这—个伟大的新事业引进到新的胜利。

一、东北在全国国民经济地位中的重要性

首先，我想提到东北在全国国民经济地位中的重要性。关于这—点，大家差不多都是明白的，但我在这里还要提到，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要着重说明它和我们东北全党同志的责任或任务有关系。我们在东北的同志工作好坏如何，不但直接影响东北的人民，而且还将影响到全国。

根据一些还不算完全精确但大致近似的数字，以—九四三年为例：东北煤的生产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九，生铁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七左右，钢材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三，电力占全国百分之七十八，铁路线占全国百分之四十二。重工业的若干部门，东北方面的数字，完全是压倒的。不但工业，即在农业中有的部门，例如东北的大豆，是在全世界闻名的，根据—九三八年的数字，它的生产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十一。

毛泽东同志在去年党的二中全会上说到，近代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把东北工业也计算在里面，近代工业只占全国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左右，这是说明了中国经济的落后。但如果就东北范围来说，情形又不同了。同样地根据一个还不完全精确但大致近似的数字，以—九四三年为例，东北工业生产占东北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的百分之五十六左右。就是说，从东北这—个局部来说：它曾经有了—个相当庞大的工业规模。

同志们！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形，使得全国人民都注目于我们东北的重建工作，并希望我们的援助。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形，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经常指示我们，要我们好好地努力，把东北建设为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或重大基地。全国人民的希望以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对于我们东北人民说来，对于我们东北全体党员说来，都是极其光荣的。

我们的工业能够不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的希望呢？能够不能够实现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所给我们的伟大任务呢？虽然我们东北经过几年战争的破坏，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抢劫，但是，我们的党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的工人阶级的集团的党，我们东北人民是在这样的党领导之下的战斗的人民，我们对于自己的责任就毫无怀疑的余地，我们必须和东北人民在—起，勇敢地挑起重建东北经济和发展东北经济这—个重大的担子，戒骄戒躁，稳步前进，达到我们的目的地。

二、我们已经有了—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东北的完全解放，是在一九四八年冬天。我们在东北的整个范围内进行重建经济的工作，是在一九四九年便开始了的。我们有过关于这一年的恢复工作的计划，并为此投下二百万吨粮食的资金。我们这一年恢复工作的进展，可由工业部所属厂矿开工状况看出：我们接管的初期，开工的工厂是很少的，到四月份有了一百九十一一个工厂开工，九月份增加到二百四十三一个，十二月则增加到三十七个。

一九四九年工业部系统的生产总值为七百九十六万吨高粱（军工生产在外），超过原计划的百分之四点二。其中，炼铁、炼钢、炼铜、采煤、炼焦、发电、机械制造业等主要重工业，都超过原计划。有些轻工业部门（例如棉纱、棉布、纸），则没有达到原计划的数字。铁道运输计划，是提前完成了的。农业生产，则因为南涝北旱，实收一千四百五十万吨（副业生产二百万吨在外），只达到原计划的百分之十九强。

私人资本的工商业，因为国营企业和农业的发展，有了订货和市场，也有它的发展。以沈阳一地为例，一九四九年六月至十二月，私人资本的工业，由九千七百二十七家，增加到一万二千零七家，即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而其工人数则由四万二千五百九十人增加到五万零四百十三人，即增加了百分之十八。

我们的恢复工作，就国营工业的生产量来说，在一九四九年，达到了该项所恢复的一九四三年日伪工业的百分之二十九左右（业已破坏而很难或不能恢复的企业，不在计算之内），农产物则达到百分之六十七左右。这是极其值得注意的速度。特别是我们工业生产量恢复的速度，超过于原有工业设备恢复的速度。例如：炼铁设备，只恢复了伪满时代最高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五，而产量则达到伪满时代最高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二。纱锭设备，只恢复了伪满时代最高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六，而产量则达到伪满时代最高产量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这就完全表明了我们新民主主义国营工业的优越性质，表明了我们生产力可能迅速发展的伟大前途。

在这一年，工业与农业的比重是这样的：即工业生产由一九四三年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六左右降到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农业生产，则由一九四三年的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四左右，进而为百分之六十五左右。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工业的恢复工作，还大大地距离我们应达到的目标。但是，由于我们工业上恢复的方向是首先着重恢复生产手段的工业（一九四九年我们生产手段的产品总值，等于全部工业产品总值的百分之七十四左右，而消费资料的产品总值，只占百分之二十六左右），按着这样正确的方向前进，如果还加上其他顺利的条件（例如购买工业设备能够如期实现的话），就能够造成东北国民经济改造的基础，能够使我们可能提供较多的工业和

农业的生产手段，以扩大国民经济，加速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从而可能争取于较短期间内，根本变更现在工业与农业的比重。而我们可以相信：到那时，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工业给农业提供了很多新的农具以及农民新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生产也必将随着大进一步。

我们的恢复工作，我们的经济发展，不但使我们得以支援了入关南下大军，而且是与改善人民生活相联系的。一九四九年工业就业人数，仅国营企业，全年增加了二十四万人。职工实际工资，由一九四九年五月份的平均一一零分，到十二月底增加到一四零分，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七，并实行了劳动保险。国家为职工支出的，除工薪外，劳保、医药、文教等费，约占工薪总数的百分之九至百分之十一。粮布的交换比值，一九四八年冬天，一吨粮只换一疋又四丈布，到一九四九年末，则可换到二点八疋（北满、中满），同时布的质量也提高了。物价，达到相对稳定。前年，平均上涨八倍，而一九四九年平均只上涨百分之八十。农民负担，则比前年减轻了。一九四八年，征收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三，而一九四九年，仅征收百分之二十。

国家商店和合作社，供给了消费者以价值近三百二十六万余吨粮食的主要必需品，约占社会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四，并购入了各种粮一百三十八万吨，其他土产价值三十余，万吨。国家商店与合作，社在商业活动上比重的增大，就打击，了商业资本投机捣把和操纵物价的各种危害人民生活的活动，保证了市场的相对稳定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同志们！一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党不仅善于发动群众去进行土地改革与革命战争，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并摧毁其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而且能够领导人民建设新的国家，搞好经济建设事业。这件事情，虽还只是开端，但却是事实，而且应该说，这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样相当规模的近代化的经济建设事业，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新的艰巨的事业。一年来，我们的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由战争与土地转到了经济建设的战线上，并提拔和派遣了上万的干部直接参加经济建设工作，这些干部有许多已经开始学到了一些管理经济管理城市知识，过去不懂的事，现在初步懂得了，过去不会做的事，现在开始会做了。正像我们过去学会了土改与战争一样，新的经济建设事业，也同样是可以学会而且能够学会的。这一事实，不仅大大地鼓舞着全党为搞好经济建设事业前进的热情和信心，而且有力地说服着那些只看到眼前工作中的一些困难，而对新中国伟大的建设事业怀抱杞忧的人们，证明他们这种忧虑是没有根据的。另外，这一事实，也给中外反动派指明：不管他们的罪恶愿望如何，我们不仅取得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将取得经济建设工作的胜利。

显然，我们经济的恢复比较迅速，乃是由以下的几个主要的条件决定的：

第一、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国家，帝国主义、官僚、军阀和国民党党棍的统治机构已被彻底打碎，我们的人民政府（东北人民政府也在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第二、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又推翻了封建的与半封建的土地制度，而使农民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农民在伪满时代每年“出荷粮”八百万吨，而在一九四九年所出公粮为二百三十万吨，负担极大减轻。除此而外，农民原来缴纳的地租已全部取消。这样，农民就出现了空前的生产积极性，并获得了农业为工业准备粮食与原料的优越条件，而由国家所征收的公粮又大部分投在工业上面，转化为与建工业的资金。

第三、我们人民国家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各种企业和财产，握有关系整个经济命脉的大工业、铁路、银行和大的商业机构，而使这一切经济活动都服从于人民的利益，并得以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步步地进行国家经济的计划和调节，虽然我们这种计划在起初几年还只能是粗枝大叶的。

第四、工人阶级在解放之后的伟大生产积极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例如：伪满时代煤矿全员日工的生产效率，平均为零点三六吨。而一九四九年，我们煤矿局以及本溪、抚顺诸矿的合计，全员日工的生产效率，则为零点五四吨。就是说，现在生产率，为伪满时代的百分之一百五十。根据工业部系统部分厂矿的调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份与六月份对比，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二点八三。一百十六个厂矿出现了一万七千二百三十二件新纪录，并涌现了大批先进分子，他们既能带头生产，又在群众中有威信，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巨大力量，成为今后各厂矿生产中最宝贵的骨干。

第五、我们党曾经有二十几年的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培养了相当大量的干部，不论他们的经验是如何的不足，然而那些经验使他们获得了在新条件下处理事情的一定能力，因而在重建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六、同时又是具决定意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一切正确的政策及其一切具体的指示，使我们能够按照正常的轨道前进。

第七、苏联专家的帮助。

我们相信：上述这些基本条件，不但决定了我们这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也必将决定我们全部经济建设的伟大将来。

至于这一开端中，我们同时也发现了我们不少的弱点，我准备在第四个部分说到工作的问题的时候，再去提到它。

三、一九五〇年的工作

我们要从一九四九年所已准备的良好开端出发，并根据业已确定了的发展方向，来继续我们的经济重建工作。

关于国营工业方面，今年主要产品计划为：生铁七十七万吨（去年为十七万二千吨），钢锭五十四万吨（去年为十万吨），钢材七十四万吨（去年为七万二千吨），电解铜四万吨（去年为一千八百七十四吨），电解铅四万吨（去年为二千零六十二吨），煤一千七百万吨（去年为一千一百万吨），发购电量二十亿电字（去年为十四亿电字），制造电动机六千八百台（共十万千瓦，去年为一千一百零九台），工作母机三千三百台（去年为四百九十七台），水泥四十三万吨（去年为二十一万八千吨），各种纸五万吨（去年为二万二千八百吨），各种布五百七十万疋（去年为二万疋），纱二十三万五千件（去年为十二万件）。

根据这样的计划，按照一九四三年的不变价格计算，那么，我们在一九五〇年的国营工业生产总值是要求达到二十三亿元（一九四三年东北的货币），等于一九四九年工业生产价值（近十二亿）的百分之一百九十三，约达到一九四三年伪满时代工业水平的百分之五十七。而生产手段的生产价值（十八亿），则占这工业生产总值中的百分之七十九左右，消费资料的生产价值（四亿九千万）占这工业生产总值中的百分之二十一左右。就是说，比起一九四九年，我们又提高了生产手段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如前一部分所说，这点对于全体人民都有利益，这里不用再多说了。同时，在这个计划中，我们关于消费资料的工业生产，就实际数量来说，比起一九四九年又几乎增加到五分之二（按照一九四三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一九四九年是三亿，一九五〇年是四亿九千万），这样，就使得我们能够比一九四九年提供更多的消费品给人民。

关于农业方面，今年的生产计划，拟耕地一千七百二十万垧，其中种棉二十三万四千垧，种麻九万七千垧，要求粮食的生产量达到一千八百万吨，按照一九四三年的不变价计算，为三十亿元，等于一九四九年农业生产价格（近二十二亿）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七，约达到一九四三年伪满时代农业生产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三。

林业方面：今年计划采伐五百九十二万八千立方米（去年计划采伐四百六十万立方米，采伐任务已完成，输送任务只完成四百一十立方米），同时注意育林与护林的工作。

很明白：如果我们今年的计划能够全部实现，那么，工业与农业的比重就将发生初步的变化，即工业的生产总值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变为百分之四十三左右，而农业的生产总值则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变为百分之五十七左右。这点当然是大进了

一步，这一步要以今年极大的努力来达到。但这还是工业的比重落在农业之后，而且这还远没有恢复一九四三年工业与农业比重的水平，工业还只能恢复到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五十七。我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水平，这也是很明显的。因此，在这一年，我们还准备作新建设的投资。

我们在今年的收入，可能有以下的数字：农业税收为二百四十万吨粮食，关税、盐税与城市其他各种税收为三百十五万吨，国家企业利润为六百一十六万吨，合计为一千一百七十一万吨，加上公债及上年结转，则为一千二百三十九万吨。我们在这样的数字中，准备以六百六十五万吨作恢复与建设经济的投资，即约占全部出的百分之五十四左右。其中，工业部投资则为五百万吨，占全部出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其中，生产手段的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八十五，消费手段的工业投资占百分之十五。和去年的工业投资比较，今年工业投资等于去年的两部半。为恢复工业所需要的修建工作，将是今年的一件大工作。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为什么而工作，从我们算出数字中，也可以看出来了。

关于商业方面，我们计划今年国营商店和合作社零售总额为五十一万九千七百余亿元（现在的东北币），约占社会零售流通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三十四），这是根据我们关于工业农业生产计划的可能实现与我们公家可能掌握的物资而计算的。为着继续打击投资者，为着使得我们公家掌握到的物资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和比较恰当地落入普通消费者的手里，并达到农民供给工业以粮食和原料、而工业又能供给农民以必需的工业品这两方面相互结合的目的，我们准备把一九四九年的国营商店三百七十二处增加到一千五百处，分配的零售额为二十六万二千余亿元。同时，在一九四九年九千个合作社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和有步骤地加以发展，分配的零售额为二十五万九千亿元。

预计今年秋收购粮二百万吨，另外收购其他土产约需值现在的东北币十七万亿，照国营商店现在情况，还缺乏不少物资以与农民交换。因此，除了计划中预定扩大的轻工业外，还必须鼓励地方公营的轻工业及私营的轻工业之发展，并向关内订货，同时引导私商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以扩大供给人民所必需的物资种类。

对外贸易，今年计划进出口各一亿六千万美元（比去年约增一倍多）。方针是争取工业机器与必需原料进口，扩大剩余物资输出。

同志们！关于今年我们经济重建的工作，大致就是这样。比起去年来，这个计划算是进了一步。当然，事情的发展免不了会有一些出入，但这是比较可靠的计划。它是可能实现的，因为它是根据真实的

物质条件的计算而制定的。由可能到实现，是一个重大的斗争过程。我们必须认真地善于工作，同时，又必需充分估计到我们还存在着的困难与可能发生的困难。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说：在工作中必须准备遇到困难的方面，准备克服困难。如果有的同志以为什么事情都能一帆风顺，对于困难丝毫没有警惕性，那是错误的，是极端有害的。

四、关于我们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以下，我想说明关于我们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计划的问题

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已经有过一次计划，我们现在又有一个准备在今年实行的计划。我们的经济是朝着计划的方向走，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像前面所说，我们的政权性质和我们政权握有国民经济的命脉，给了我们这种计划可能性的基础。一年来在经济活动中的试探，完全证明了：我们的经济计划一旦变为有组织的行动，一旦和大众结合起来，就能成为引导生产力前进的力量，而没有计划的领导乃是盲目的。

一九四九年的经验也证明，我们的计划性是很不够的。我们的计划是有很多缺点的。当然，因为我们在经济工作方面（特别是在大工业方面）的经验不够，统计材料不够，我们不是神仙，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出十全十美的计划来。许多重大的东西，是还有待于我们去探索的。

例如，我们要指出：我们的各个经济部门之间是配合得还不密切的。工业与农业之间，这个工业部门与那个工业部门之间，这个企业与那个企业之间，工业农业与商业之间，如此等等，都还是配合得不够密切的。同时，我们也要指出：我们的上级政府与各个下级政府之间，这个地方与那个地方之间，国营与私营之间，它们经济活动的相互联系也是还不密切的。我们还没有有系统地用比较恰当的形式把各个经济部门与各种经济活动联系起来，而这点乃是我们经济上进行计划的活动所必需的。

可是，我们的经济活动，特别是一年来的经济活动，不但在东北，而且在关内，在这方面，已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不少很有益的经验。这种经验，主要的是合同制。一方面，是企业内部关于劳动的合同，另一方面，是有些经济部门之间，关于产销与订货的合同。例如，在东北，我们国营企业内部的劳动合同，已经普遍采用的有联系合同，重点试行的有集体合同与包活制。另一方面，在国家商店与农村供销合作社之间已经采用的有产销合同，在工业部门与商业部门之间，国家企业与地方企业之间，公私企业之间，都曾有过订货合同。通过上述各种各样的合同，已经部分地克服着我们在生产与供销中的彼此脱节现象，使得计划的执行更有组织性，并从而促进与加强了计划性。这种合同制，可以把我们经济各个有关方面密切联系起来。并且可以经过劳动

合同与订货合同，或产销合同，促进生产的发展，从而加强各经济部门、各企业内部制定计划与实行计划的责任。这种合同制，不但可以把国营企业更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并且经过与合作社订货的合同，还可以把小生产者的一定生产范围纳入到我们的国家计划里面，而私人资本的企业经营也可以经过订货的合同，在一定范围内，纳入到我们的国家计划里面。这种合同制，是现在我们组织或联系各方面经济活动的最重要的方法，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因此，我们准备把这种东西，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加以推广，即把已经初步存在的合同制变成为在整个国家计划领导与调节之下的有组织的合同制。

为着有意识地来推广这种合同制，同志们必须具体地注意研究已经存在的经验，研究它有过的优点和缺点，而发扬它的可用的优点，克服缺点，对于有过的错误，力求不要再犯。同志们并且必须在推广中，实行中，反对形式主义，注意取得新的经验。不难明白：当我们的计划还不十分精确，生产还没有完全走上轨道的时候，签订长期的合同是有困难的。因此，有许多事业不妨从短期的合同开始。经过这种种丰富的试探，我们就能够有充足的经验，有可能来不断地审查我们的计划，审查我们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具体关系，并随时随地进行各种必要的与合理的调节。同时，这就是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地与更广泛地取得组织我们经济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更精确地来计划我们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企业管理的问题

关于企业管理的问题，也就是具体领导的问题。我们会不会领导我们的经济前进，不能只看我们会不会制定一般的计划，而且特别要看我们会不会实行具体的领导。这种具体的领导的基础，就是企业管理。

我们在这里准备说到我们现在企业管理问题上的三件事，就是：建立责任制，贯彻管理民主化和贯彻经济核算制。

同志们！我们大概都懂得这个大道理：我们共产党是对工人阶级的事业负责的，对人民负责的，对我们的祖国负责的。是的，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也并不难说。但是，在我们队伍中，也有这么一种人，只愿意有抽象的“负责”，而并不愿有具体的负责。说起天下大事业，可以头头是道，“慷慨负责”，但是，把他放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他又觉得那不过是“小事”，不值得负责了。这种人在我们革命过程中，曾经发现过不少。现在在我们的经济事业中，同样也发现不少这种人。我们必须懂得：我们的大事是由许许多多的小事联结起来和积累而成的，在经济事业上更表现得特别明显。没有做好经济工作上的许多“小事”，无数“小事”，我们是做不好什么经济建设的，而考察每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性究竟如何，就是必须看他对于种种“小事”

采取如何态度，对于这种种“小事”采取如何态度，对于这种种“小事”负责到什么程度。

我可以随便举些在经济工作上所表现的不负责任的例子。例如：抚顺龙凤矿有一个斜井修理系长，破坏保安规程，打开“密闭”，致使瓦斯爆发，结果死十五人，伤十二人，造成严重损失。又例如：鞍山炼钢厂二号平炉修理时，急需氧气，虽然堆满了氧气瓶，但都是空的。平炉的人说，氧气厂发给他们时就是空的。氧气厂的人说，平炉用空了，又来赖他们。彼此推诿，严重的影响了生产，但还查不清责任。又例如：哈尔滨的鸡鸭公司曾经存有一九四八年出口不合格的肉，价值在百亿元上，本来可以内销，可是竟然积压到半年以上。该公司一九四八年宰猪留下的鬃毛，不及时出卖，到第二年春就坏了一万斤，值三十亿元。又例如：几年来在森林方面火灾发生了多少次，一九四九年一年即发生二百七十次之多，损失木材约五百万立方米，超过一年的采伐数量，每次火灾都表现无人负责的现象。

同志们！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对于责任的任何疏忽，时常会招致不可估量的损失，也变成了罪过。不负责，同时也就转而对于坏事，对于罪过，要负责任。特别是现在我们各方面的经济联系已经这样的密切，一个责任的疏忽，可以影响到许多方面。例如：一个车床的工作如何可以影响整个车间，一个车间的工作如何可以影响整个工厂，一个工厂的工作如何也可以影响整个企业，或其他。因此，我们在各种经济部门和各种企业里面，必须积极建立起管理企业的责任制度来，而消除很多地方存在着那种（大家负责而又无人负责）的现象。从一个机器一个工具起，不论事情的大小，我们都要做到有人负责，都要有明确的责任规定。这样，就便于我们能够在企业上有效地组织起来，便于我们能够经过责任制来保证我们计划的实现，而且可以经过责任制来发挥每个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锻炼出每个工作人员的本领，并从而得以不断改进我们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组织。鉴于过去的损失，厂矿的行政负责人员对于厂矿的安全设备，必须积极地检查，便于找到工作的好坏的负责人，表扬好的、处罚坏的。而对于坏事情要负责任的人，就要看他们的情节轻重，可以由撤职一直到送法庭。

同志们！我们的革命已经胜利，我们的国家已经稳定下来了。根据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我们的国家订下那一系列的制度，以便从事我们伟大的建设，而责任制便是我们的建设——更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及其重要的制度，我们必须在一切企业中认真建立这样的制度，而一切共产党员都必须力求成为负责中模范工作者。

再说企业管理民主化

企业管理民主化，是我们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企业改造为人民企业的一种重要的方法。目前，管理民主化的中心工作，是真正搞

好工厂管理委员会。这种管理委员会，必须是该企业内的共产党组织的职工会的代表参加，目的是要反对官僚主义，经过工人群众中、技术人员中和职员中的积极分子与先进分子，去团结全体工人群众，全体技术人员，团结职员，集中群众的意见，解决工厂中的重大问题，促进大家在政治上与生产上的自觉与积极性，而和破坏生产与怠工进行有效的斗争。

这并不是现任制度相冲突，而是和责任制相结合的。我们企业的责任制，必需建立在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不然，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好的结果的。我们的企业责任制乃是在民主基础上的责任制，而企业管理民主化乃是有责任制的民主。我们的工厂管理委员会是以厂长为首的、又民主又集中的统一的领导机关。有人以为责任制与民主化这两种东西是相互冲突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厂长是由上级的国家经济机关委派并对上级的国家经济计划负责的，是对上级负责的；但他必须倾听厂中各方面的意见或建议，并把它反映到上级，采纳正确的意见或建议。厂长必须把工厂中的生产计划放在工厂管理委员会上讨论，凡每年、每季、每月的计划，还要在职工代表会上讨论。谁要是拒绝或忽视管理依靠群众，不肯依靠党和工会，而一味独断独行，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我们的个别同志中，存在了一种意见，认为可以由企业内的共产党委员会（或支部）的书记代替厂长负责制，这种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共产党党委会或支部并不是工厂的行政机关，它是该企业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领导机关，它应当号召党员站在生产的最前线而成为完成生产计划的模范，它应当监察和促进工厂生产计划的进行，及时提出必要的建议，而不能代替厂长，不能代替厂长负责制。

在各个企业单位内的共产党员必须知道：每个国家企业，必须在整个国家经济计划下面工作，而这整个国家经济计划是在我们党中央或我们党中央的代表机关的领导下由国家机关制定下来的。厂长是由上级国家机关付给责任的，厂长负责，不但是工厂所必需的，而且是国家经济计划一元化所必需的。如果使厂长不对上级的国家领导机关或上级的企业领导机关负责，而是对一个工厂内的党委会或支部负责，又如果使该厂的生产计划不由上级的国家领导机关或上级的企业领导机关制定，而由该工厂党委或支部制定，那么，这就将不是什么（领导一元化），而恰是分割了和破坏了领导一元化。必须了解，共产党的机关是不应该也不能够代替国家机关的。

曾经有人在某些方面把工会工作去代替厂长的行政工作，大家知道，这也是错误的。工会的责任和工作，在于团结和广大的工人群众教育工人群众，使全体工人群众了解自己主人翁的地位，提高他们关于劳动纪律的自觉，发动他们对于生产的积极性和关心，互相交换生

产经验，学习管理生产，并为保证工人的利益而工作。如果把工会变成普通行政的机关，结果就形成了几个并存的行政机关，阻碍了责任制的建立，这是很明白的。

在厂矿职工中搞过多的会议，当然也是错误的。过多的会议，将浪费和损害职工的业力，而招致损害生产的结果。工厂管理委员会必须善于爱惜职工的时间与精力，对于工厂中各种必要的会议，进行恰当的调节，禁止过多的有害生产的会议。

因为目前我们这里已发生了关于企业内行政、党委和工会这些工作互相关系问题上的分歧，所以我在这些问题上多说了一些话。另外，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拟了一个草案，请大家研究修正。

以下我要说到经济核算制

经济核算制，是我们企业管理问题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已经经过了一个时期，引起了全党的注意，收到了若干的效果。现在我还想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事情，也还只能说是开始，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大家知道：我们曾经在很长时间内，过了供给制的生活，而在供给制生活中，往往就是有什么算什么，收支的计算是没有或很少的。历史、资格或老弱，在待遇上的分别是有些的，但工作的成绩如何，在待遇上是不占地位的。懒人也横竖有顿饭吃（干不干，一斤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虽则过去我们也经营过一些经济工作，开办过一些工厂，但是大概说来，都说不上有个么真正的经济核算。特别是那些工厂，绝大部分都是为解放战争服务的，只要对于战争是需要的，我们是完全不计较成本的大小如何的。这点很影响到我们一起去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使他们的脑海中长期缺乏成本的概念，以为只要能够拿出东西来，还计较什么成本呢。

不成问题，我们的供给制对于支持我们长期的革命事业来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就是现在一定时期内，在我们有的机关里面，也还是有益的，在军队中更仍然是必要的。同样地不成问题，我们过去那么不计成本的大小，如何而制造解放战争的物资，是代表了人民的最大利益。

现在的情况在于已发生了大变化的情况。问题是我们现在在经营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在经营现代性的经济如果没有收支的计算，如果没有工作成绩的考核与工资的等级，就是说如果不计较生产成本，不认真实行经济核算制，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企业的经营。我们就不能知道该企业的现在，也不能计算该企业的将来，该企业对于我们将是一堆混乱，我们就没有法子计划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真正的精确的经济计划，在这种情形下是无从说起的。

和上面所说的推行企业责任制和企业管理民主化的同时，我们就可以推行经济核算制。因为如果哪里没有责任制，那里就不能有真正的经济核算制。同时，如果哪里没有管理的民主化以发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出现群众的监督，而只有一套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那里也决不能有精确经济核算制。

现在经济核算制问题的中心就是要确立这样一种制度，即根据我们企业的技术设备的水平，浪费的克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以及在我们新纪录运动中所达到的成绩，而规定出一种可能的合理的生产定额，以便由此可以初步地或大致不差地实行生产成本的管理，即实行初步的经济核算制，然后又可以在进一步改进管理、提高技术和群众生产竞赛的基础上，力求逐步地提高生产定额和逐步地减低生产成费。

为经济核算制而斗争，也就是为节约而斗争，为扩大我们的生产力而斗争。

（三）关于新纪录运动

在解放之后，东北也像全国各地一样，工人阶级鼓起了新的劳动热情，出现了新的劳动态度，因而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我在总结一九四九年的经验那一部分中业已提到了的。东北在一九四九年，曾经有意识地展开了新纪录运动。现在证明，这个运动的意义是极大的。这个运动极明显地表现出了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社会主义性质国营企业的生产力，比起过去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封建或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力，有了极大的优越性，表现出了我们生产力发展的前途是无限的。

新纪录运动改变了我们厂矿的面貌，教育了我们的干部，同时也教育了工人阶级自己。有的厂矿，在运动中找到了或部分地找到了新的合理定额。可以说，运动的经验，对于今后的计划生产，改行新的工资制度，实行定额管理，贯彻经济核算制，以及改善人民企业的种种管理制度，都将给以很大的帮助。

新纪录，大致是由两种情形来达到的。一种情形，是工人们改变了过去“磨洋工”的态度，合理地提高了劳动强度，达到了按照现有技术条件应有的生产水平。另一种情形，是部分地创造了新的工作方法，以至部分地改变了旧的技术。在前一种情况下面，应该指出，那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但必须注意，劳动强度的提高，终究是要受一定人的生理上的限制的，如果超越生理的条件，那就不是适合的了。这就是说：我们今后在推广新纪录运动中，我们要求为一般生理条件所可能的合理的劳动强度，达到按照现有技术条件应有的生产水平。除此以外，我们必须用主要的注意力，去引导和鼓励工人们与技术人员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改造作业方法，改造技术条件。这样，就使得

有些新纪录，可以不限于只为少数人在一定时候可以达到，而是为一般工人在一般时间内都可以达到，并且可以由一个新纪录引到另一个新纪录。

几个月来的新纪录运动，也发现了一些错误或偏向。重量不重质，这是较为普遍的。甚至个别的破坏了技术操作规程，因而造成损失。例如：机械三厂，虽则有创造纪录的成绩，但是该厂所出车床，每台都需要重新加工才能使用。其次，即运动的盲目性，有的为创纪录而创纪录，新纪录创造得很多，总的任务反没有完成，把创造纪录停留在枝节问题上，运动发展起来后也没有及时引到解决定额问题上去。又其次，运动的发展在各个企业与各个工厂之间是不平衡的。技术人员对于技术改进或发明以配合工人的新纪录运动，还是很少，或很不够的。上述这些错误或偏向，是运动初期所很难避免的，在今后运动中必须引为教训。

同志们！有系统地有步骤地推广新纪录运动，同时反对形式主义，是我们发展生产、完成生产计划的重大步骤。这种运动，是和我们建立合理的生产劳动组织，合理的管理制度，贯彻经济核算制，实行合理的等级工资制度，以及超额的奖励制度等一连串的问题，分不开的。我们必须善于领导这个伟大的运动，善于领导工人阶级为创造我们完全新的生产力而前进！

（四）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

关于工业上的问题，我已经说得很多。现在，我将说到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在去年十二月的一个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的座谈会上，我曾经有过比较长的发言，但现在这个会议上，我还可以约略地说一说。目前东北的农业经济，主要有四种形态：

- 1、个体经济。
- 2、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劳动互助组织与农村供销合作社。
- 3、新的富农经济很少，但是已经有了，而且在增长着。
- 4、国营农场。除国家农场外，省县至少各有一个，甚至几个。有的区，也有国营农场，但规模较小。

除上述四种经济形态外，当然还有少数鳏寡孤独或军属等靠出租土地为生者，也有资本家向国家租用土地雇工经营农场菜园者，但为数不多，在农业经济中所起作用不大。

党的政策，总的是以普遍发展农业生产力，多打粮食与多产工业原料，提高农民大众生活水平，为基本出发点。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保护和发挥农民从帝国主义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之后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鼓励他们购置新的生产工具，添购马匹及其他牲畜，增加肥料，扩大耕地面积，修建房屋等等。忽视这种

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或者挫折这种积极性，特别是如果对于中农的这种积极性有任何损害，那必然是很大的错误，是不能允许的。这点，大家必须明白。

但在同时，我们必须用很大的注意力去发展和组织变工合作。问题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农民（土地改革时的贫雇农与中农的一部分），不经过变工合作，地就很困难以至于根本种不上（在北满，至少需要两个马的一付犁杖，才能种?槎地，五个或六个马犁才能种扣槎地），更谈不到农民经济的发展与富裕了。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与上升，离开了占农村人口多数的贫农与下中农的上升，是根本谈不到的。毛泽东同志说：“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在旧时代，是农民悲惨生活的表现。现在解放区的变工队，形式与内容都起了变化，它是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力、争取富裕生活的表现。”事实就是这样的。党和人民政府，应该在物质条件及其他条件上，着重援助农民这种变工互助的组织。

但是谁愿意参加变工组，或者不参加变工组而去单独耕种，必须保障完全有选择的自由，而群众是要根据实际利害与经验，来作选择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变工合作所提出的两个原则，即自愿与等价交换（或叫两利），完全是正确的，是不许违犯的。所以，我们必须反对急性病，反对一切主观主义的想法与做法。这是一个群众的觉悟问题，是一个我们对待中农的态度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拿强迫命令的粗暴态度对待中农，就是犯了不可允许的错误的。我们的做法如何，是一个测量我们关于“组织起来”的工作做得好坏如何的问题。事情不在于形式主义的数字，而在于组织起来之后农民所得到的农产物的生产量。如果我们把变工互助搞好了，粮食真正产的多了，参加的人就会越多，反之就会越少。我们还必须了解：就是变工搞好了，粮食产的多了，有人不愿参加，也完全有这种自由，我们决不能强迫。同时，更不能因为任何农民只愿意单干（单独耕种），而轻视、打击、排斥他们，给他们戴上“尖头”的帽子，而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不去团结他们。如果那样，也就是很大的错误。单干的人同样是劳动人民，我们应该耐心地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以事实证明给他们看，要由生产变到富足，单干是不如参加互助组快。这样，可以根据其自觉自愿，逐步地引导他们参加到互助组来。

对于新起的富农，不是排斥，在目前也不要实行限制的政策。我们是允许他们的存在和发展的。关于雇工，借贷，典押，买卖和租佃土地等，在遵守政府规定的条件下，是允许的。

关于国营农场，过去组织机关多余人员去生产，增产粮食，解决机关经费方面，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对改良与推广优良品种，推广改良农具与新式农具，推广农业科学，从而指导与影响群众的生产工

作上，做的还很不够。今后，在这些方面要多做些工作，首先要与其周围的互助组与农户取得联系，以便使国营农场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多起作用。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准备多组织几个有拖拉机的农场，作为给农民看的模范。

前面说的，就是我们关于农村四种经济形态的一些根本政策。

党应该教育农村的支部与党员积极参加变工互助组，与参加供销合作社，从中起带头骨干与桥梁作用，以推动广大人民经济的发展，并从而发展个人的经济。

但农村的党员有的要单干，不愿参加互助组与合作社时，应该看成这也是一个教育问题，同时也是变工互助工作做的好坏的问题，绝不能以强迫命令的方式去解决。

党员家庭，在土地改革后，因劳动生产而发展成为富农，其愿意自动退党的，党给以同意和批准；其表现对党消极者，党按照党章规定的条件停止其党籍；但希望他们在政治上做一个好公民，同时也不干涉他们的经济经营。至于有的不自动要求退党，又和“消极”态度有分别的，可按中组部规定，根据具体情形处理：当他尚能执行党的决议，遵守人民政府政策法令，且在群众中尚无恶劣影响者，保留其党籍；但如果在思想上蜕化，在政治上变质，确已失去做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时，自应依照党章开除其党籍，保持党的纯洁性。

五、全体同志团结起来，站在经济建设的最前面

同志们！在我的报告里面，已经大体上谈到了我们目前在经济建设战线上所遇到而需要马上加以解决的问题。当然，也还有些重要的事情，例如我们准备不惜破费以培养大量技术人材等等，这些将在具体工作中努力去做，在这个报告里面就不要去多说了。

同志们！一切方针定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求我们全体同志团结起来，站在经济建设战线的最前面，和工人阶级在一道，和农民在一道，和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在一道，和人民在一道，共同工作。同时，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在工人阶级中吸收更多的先进分子到我们党里面来。在我们党的领袖、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克勤克俭，爱惜公共财物，把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建设事业上。在工作中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有事和群众商议，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不断地推动工作前进，提防反革命派的破坏活动，克服一切困难，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经验，完成党所给我们的这个新的历史任务。

不错，我们的经济知识还很差，文化知识还很差，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也离开我们的需要还很远，这些是我们的弱点，明白了这种弱点，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弱点并不算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不肯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重要的问题在善于

学习”。只要我们肯学习，那么，任何困难的堡垒都是能够被我们攻下来的。中国有个流行的句子：“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共产党人正是“有心人”。因为我们有志革命，我们也就学得了革命的本领，革命就真的胜利了。现在我们又有志建设，当然也就能够学习得建设的本领，而一定使建设得到胜利。

为了使我们的干部在各个不同岗位上能够尽职，必需提倡全党干部干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就成为内行，成为“专家”，实行全党干部“专业化”。必须了解，我们的建设工作乃是长期的永远的，因之每个干部必须钻研一种专长，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这一点，过去不可能，今天已有充分的条件，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做了。

学习一定的业务，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互相结合的。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将使我们能够把眼光放远，增加我们的智慧和信心，能更好地去做去完成我们的业务。一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需注意挤出时间，组织对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十二本干部必读书的学习，同时注意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及党中央的许多文件。

同志们！关于党的许多问题，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说了。让我在我这个报告的结束时候，再说一句：在伟大的毛泽东旗帜下，全体同志团结起来，站在经济建设战线的最前面！

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在东北局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
二十九周年的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

同志们！我们今天集会来庆祝我党诞生的二十九周年。二十九年前，我党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小组，今天我们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发展成为拥有五百多万党员的大党，且已领导人民取得了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者和领导者了。为着胜利地完成党现在所面对的艰巨建设任务，党中央已决定在全国展开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东北局已根据中央的决定发出了指示，想大家都已看到。我现在想就这个重要问题提出一些意见，请同志们考虑。

大家知道，整顿党的作风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

毫无疑问的，党中央的路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从整个党的斗争历史看来，我党始终是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并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也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党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打倒了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即长久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及其集中的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巨大胜利。在东北，我们继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土地改革的全部完成后，又有了经济建设的良好开端。我们在东北的工作有进步，我们在各种建设事业中都获得了成绩，这也是人所共见的事实。

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在各个方面的工作已经完满无缺了呢？人民对于我们在东北的各种措施和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都已称心满意了呢？就是说，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都已十分密切而毫无疑问了呢？

决不能这样说。我们共产党人丝毫不应该因为已有的成就和人民群众的赞许，就自骄自傲起来，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须知我们所做的还只是人民伟大事业的开端，我们在各种主要工作中的成就距离我们奋斗的目标还很远，还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因而造成了工作中的损失，妨碍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这就是我们提出整顿党的作风的根据。

这次整风为了搞好经济建设

同志们！我们东北全党当前的基本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这次整风就是为了搞好经济建设。为要从各种建设工作中来整顿我们的工作作风，特别是从经济建设中来整顿我们的工作作风，而不是脱离当前实际工作，或从书本出发抽象地去整顿党的作风，因此，我们准备认真地来一次全党的检查工作的运动，主动地揭发我们工作中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各种毛病和错误，检讨阻碍我们工作前进与影响党和群众密切联系的根源，及时改正缺点和错误，把全党（首先是各级主要负责同志）的政策水平提高一步，把党的工作作风加以整顿，更加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与提高党的纯洁性，使全党的同志明确而负责地站稳自己的工作岗位，与东北全体人民紧密联系，搞好东北的经济建设及其他建设事业。这就是我们这次整风的基本目的。

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主要危险何在呢？什么东西妨碍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呢？

我想，最主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的缺乏政策观点，和一部分同志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及随之而来的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恶劣倾向；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甚至很久得不到纠正，则是同高级领导机关中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倾向分不开的。现在我们的党是领导国家政权的党，我们党在人民中威信很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人民群众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假如我们不能迅速去掉这些恶劣的作风，那么，对于人民和国家的建设事业的危害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这些恶劣的作风特别值得我们警惕。

脱离群众与违犯党的政策的举例

同志们！我们有那些脱离群众与违犯党的政策的严重现象呢？从我与各部委各省市负责同志五天的座谈中，以及由东北局派到下面检查工作的同志汇报的材料中，可以举出以下的一些例子：

贸易工作

比如贸易工作方面：

在我们的贸易部门完成国家的商业计划时，对于如何加强计划性、打通对外销路与活跃内地市场的物资交流、正确地掌握价格政策、扶助合作社与团结正当的私商、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制缺乏具体的贯彻，因而发生了以下的问题：

（1）有些地方不按当地人民需要，强派推销与收购任务。因而发生货物供给不及时，品种、质量不合人民需要以及某些争销争购的现象。

（2）某些单位调拨物资缺乏计划性，因而形成货物旅行的现象。如黑龙江省历来生产大量面粉，行销东北各地，东北产的面粉，已经感到不好出售，但贸易部却从关内购来面粉三十万袋，并拨给该省一部；龙江产的火柴早已过剩，但又从别处拨给该省火柴。由于盲目调拨的结果，本来价值八十万元（东北币，下同）的马蹄表，拨到龙江乡下只卖十几万元；还有工业修建中大量需要的瓦坭铁，拨到龙江乡下并限期贱价卖给农民，但因贸易部不能满足工业部修建的需要，又从农民手中以高价收回。因而给国家造成了毫无意义的损失。

（3）价格政策的规定，不是按照经济情况，不考虑到还有很大的自由市场，而是简单地按行政的区划来规定。如黑龙江全省三十多个县份，只有两种物价（即齐市与北安），靠近哈市的绥化县的物价，不是跟哈市走，而是跟齐市走的。加以个别地区以行政命令的办法规定当地的人民和合作社只许在该地的国家商店买东西，不准本省本县本区人民到其邻近的外省外县外区购买东西，其结果就发生违反境内贸易自由政策的现象，对物资交流，反而起了阻滞作用。此外，收购土产的价格，也多从单纯的任务观点出发，以致随着外部市场的急剧变动而忽高忽低，这样一方面造成政府的损失（仅今年三、四月份收购鸡蛋、活猪、小麻籽、野鸡等在价格方面的损失即达九四七亿元）；另一方面在跌价之后，政府不收购，又形成产品的滞销，影响到农民的生产情绪。

（4）我们的贸易部门，在某些城市不按需要与可能设立了过多的零售店。如在哈尔滨市，出了一百多个肉床子。此外，还有个别地区发生错误地阻碍正当私商下乡与合作社进城的现象。

（5）在贸易工作的经营管理上，缺乏经济核算的具体措施，有些单位只顾卖货不顾赔赚。如沈阳百货公司今年的推销冷货工作，明明赔了一二九亿元，但在总结时还说是很有成绩的呢！至于商品积压

与严重的耗损现象那就更多了。如沈阳百货公司就有六千斤烤胶放在暖气管附近烤坏，一万支盘尼西林因过时失效，水笼头不关，把近千斤的白糖湿化，这种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在有些贸易部门的机构上，表现了严重的机关化。如沈阳信托公司二三二人，其中直接经营业务者原为七人，现在增加到二十六人，也只达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一。

所有上述现象如果不迅速改变，国家与人民的损失是不可计算的。

((1)(3))

工业方面

在工业方面，广大职工发挥了劳动积极性，并有苏联专家的各种帮助，我们工业建设应得到更多的成绩。但是，目前却存在一些亟待克服的缺点，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例如工业部系统下的一些厂矿，只注意到完成生产的数字，缺乏具体检查，因而不少产品质量很差。机械局过去生产的车床许多不合规格（如机械一厂第一季生产的三一台六尺车床全部不合规格），生产的自行车因质量不好，卖不出去。由于质量不好，或不合规格，形成了生产中严重的浪费；同时，使产品成本加高，在市场不易出售，形成积压，妨碍生产。其次，今年基本建设工程很大，但有些修建的材料（如红砖、石棉瓦、木材等）与工程的质量不好，浪费了国家巨量的金钱。沈阳工学院一万四千平方米的三层大楼建筑，经检查发现：该大楼柱座，有百分之八十位置不正；还有吉林造纸厂按装“蒸煮罐”，事先未作调查，打了三米多地基即行按装，后来打房基时，打至七米深处，发现下部均是流砂，因而蒸煮罐工程不得不返工重做。

工业工作中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团结技术人员与职员问题。本来我们企业中的技术人员与职员的数量就是不够的。我们的产品质量不好，经营管理不善，也同我们没有做好团结技术人员与职员的工作有关。我们有些企业的领导方面，对于技术人员与职员采取了轻视态度，还不能很好地团结他们工作。有些领导人员还没有充分地使技术人员与职员有职有权，使他们到实际工作岗位上获得改造与提高；还没有制定合理的技术规程与管理规则，作为全体职工共同遵行的法规；还没有切实地具体地解决技术人员与职员生活居住的困难；特别是还没有在工人中进行充分的重视技术与团结技术人员与职员的教育，因之技术人员与职员工作的积极性与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工人的劳动创造与技术人员、职员的科学指导、合理经营，未能很好的结合，而且职工之间还有若干不团结的现象，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工业的领导方面，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还落后于我们工业发展的现状，我们的许多企业还缺

乏具体的精确的经济核算，缺乏资金管理，缺乏成本计算，缺乏科学的计件工资制度。而这些乃是我们办好企业在当前的首要工作。

当然，为了搞好工业，除了上述各点之外，首先是要根据可能与需要，制定比较精确的稳当的计划，并规定各个部门各个人对实现计划的责任，把它形成系统的制度。在这些方面，我们的缺点还是很多，同样需要认真改进。

农业方面

在农业方面，我也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

如一九四九年的浑河灌溉水利工程，是东北水利总局在一九四九年自己办理的唯一的工程，去年春天开始动工时，水利总局就把这样一个大工程，交给两个技术人员去负责，从未深入检查，结果工程完竣，不能使用。其中大房身排砂节制闸，在涨水的时候闸门拉不起来，以致淹地更多，今年就不得不返工重修，这样不仅浪费了国家财富，而且给人民以不好的影响。此外如饶阳河治水工程，据水利总局报告，已基本完成，但经检查结果，六个水闸，还有五个没有完成。

再如推广新式农具问题。据一些部队与地方的反映，新式农具质量不好，坏了不少，而且成本很高。但我们管理这一部门的机关，认真的检查和及时的纠正很差。

再如林业问题。由于乱加采伐，不注意护林与造林工作，致使不少林区好的红松木都砍了，差的杨木桦木都留下；有些部门不该用红松木，也竟用红松，造成了“大材小用”的浪费。最近农林部调查了三百万平方米的森林，其中病腐木竟占三分之二。

再关于发放农贷问题。我们总是把它当做例行公事，一年一次，而没有很好地研究东北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和两年大生产之后所已经发生的新情况，因而对老区与新区，有灾区与无灾区，生产上有困难的户与无困难的户，缺乏具体分析，一般化地发放农贷，其结果对农业生产作用不大。个别地方的农民，甚至将领得的农贷去买烧酒喝了。

公粮税收

在财政方面，我可以举出征收公粮与税收的例子。

关于公粮方面。我们各个地方，在春耕总结时总是报告耕地面积如何扩大，如何种的好；铲趟中总是报告如何铲趟的好；而秋征时，则报告年成如何不好，甚至耕地面积都比春耕时缩小了；但在国家收购粮食时，报告的数目则又多出来了。这种情况，几乎成为一种通例。同志们应该记取去年的教训，去年秋收开始时各地报告：南涝北旱，仅五成年景；征粮后有些地方说不是五成而是六成；以后有的省份说实际有八成年景。这样不仅影响国家难于正确掌握征收政策，造成了畸轻畸重的现象（如松江的通河去年仅负担百分之九），减少了国家收入；而且影响到政府收购工作的必要准备，这是我们今年四月以来

物资滞流的一个重要原因，其结果使自由市场粮价跌落甚多，使农民同样受到了损失。

在税收方面。各地税收工作同志积极负责，工作精神很好，但有些地方他们只顾超过“任务”，缺乏政策观点，因而形成离开政策与畸轻畸重的现象。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安东市的例子：该市三、四月份营业税，省税局根据资本周转率及交易额布置任务为一五〇亿元。按该市商人自报材料可完成八十七亿元，机关生产企业估计可征二十多亿元，查账补报一、二月份营业税估计可征二十多亿元，三者合计可征一三〇亿元，较规定任务仅差二十亿元；如再组织力量检查账目，任务是可完成的。但市税局只求超过任务，将小组自报数目普遍增加一倍，以致违犯了党的政策，引起了某些商人的不满。

工会工作

此外，在工会工作方面，由于对当前工会工作的具体历史条件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对于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面工会的任务，对于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对于工会在生产中的地位与责任，未能全面的了解。在少数公营企业中部分工会工作人员不是深入生产过程之中，而是站在生产之外；不是努力学习技术、钻研业务，使自己逐渐成为内行，而是袖手旁观，笼统领导；不是主动地协助行政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共同搞好生产，而是消极地埋怨与指责多，积极负责的精神少。因之这些同志对于教育组织工人学习技术，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帮助行政改善经营管理，亲密团结技术人员与职员，以及克服工人流动现象等工作，没有起作用或没有起应有的作用。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同志们！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决不只是这一些。因此，无论党委、政府、军队以及群众团体各个部门都要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认真地深入地检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实地改正缺点和错误，以利党和人民事业的前进。以上我说的，主要是东北一级各部门的一些情形。

各地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我们知道这种脱离群众违犯政策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在各省、各县都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必须同样进行深入检查与彻底改正。我现在也不妨在这里再举一些例子：

有些地方为了所谓“完成任务”，强迫群众参加互助组。松江的汤原密山等县的某些村子，甚至对于退出小组实行单干的农民要罚钱、罚工；龙江的某些区村，强迫互助组一律记账、订公约，使得群众造假账、造假公约，贴在墙上，名为“抬头见喜”。

再如：黑龙江绥棱县森林区发生山火，一开始就有人报告县长，但县长不慌不忙地说：“绥棱年年着火，烧不着啥。”结果山火蔓延，

从原野烧到森林，从绥棱快烧到铁骊。这时县长才下通知，派人救火，结果因火势太大，又加对救火无组织、无领导，没有救下，山火延烧达半月之久，烧毁森林长达百里以上，汪清县也有类似的情形。请看！这种官僚主义竟发展到对国家、对人民何等不负责任的地步！

官僚主义在工作中表现的另一种形态是形式主义。

如上边的指示或决议公布之后，不少地方不结合本地情况加以认真地研究与讨论，规定具体的执行办法，而是依样画葫芦，一级一级照例地开会传达，如桦川县动员备耕，在县上开了大小十三次会，共开四十七天，会后未作任何具体布置。下边干部说：“任务一大本，办法自己想。”群众说：“县里一大本，区上一块纸，村上一张嘴，屯上只剩两条腿。”

又如五常中心村动员群众备耕，一个月全村八个屯开了一百五十六次群众大会，七天村干部会，群众反映说：“三天两头会，开的真遭罪，开到五月五，铧子不沾土。”

同志们！上述这些恶劣作风，当然是会遭到群众的反对的。但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有的甚至坚持不改，在听到上级或群众对他的批评时，不是表示欢迎的态度，而是采取拒绝的态度；这种人只愿意听别人的颂扬，不愿意听别人的批评。遇到领导上有什么批评时，他还会说：“请上级对我的工作做一个基本估计吧。”这些同志不了解，工作中的成绩就是不讲也是抹煞不了的，而错误若不批评改正则会造成革命事业的更大的损失。

最后，我还要提到少数同志的铺张浪费以至贪污腐化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而且如不痛加改正，对于这些同志本身的政治前途来说，也是十分危险的。最近东北局组织部与各地党委已经处理了一些这类的案子。今后我们要经常动员全体同志、和广大群众向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政府的人民监察委员会揭发这种犯法的行为，以便将这些肮脏的东西，从我们队伍中打扫干净。

工作中存在着几个普遍性的问题

我向同志们讲了这许多例子，目的就是要大家警惕，不要因胜利冲昏了头脑，采取万事大吉的态度来对待一切；而要继续兢兢业业，认真检查工作，勇于承认错误，并善于加以改正。上述的例子中有的只是个别的现象，但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带普遍性的问题来，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有以下几个：

（一）党内政策研究与政策教育不够。

大家知道：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的拥护，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同人民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就是因为我们的党有着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最基本利益的正确政策，这就是毛主席与党中央所制定、我们所遵行的各种政策。政策就是我们行动的方针，政策

执行贯彻得好坏，就是衡量我们完成各种工作任务好坏的根本标准。离开了党的政策去讲任务，或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完成数字上的任务，其结果就会脱离人民群众。

但是由于党内对于政策教育与政策研究不够，因之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少同志往往只注意完成任务的数字，不注意掌握政策，因而把所谓“任务”与政策对立起来。我们也有不少的同志不是在严格遵循国家的和党的政策的限度内去完成党和国家给予他们的任务，而是采取粗暴的方法进行工作，不去注意具体的情况，不顾及事实上是否可能，不肯虚心地和当地人民商量，只是简单地去完成任务，把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还有不少的同志，只顾自己局部需要与局部的利益，缺乏全局观点，因而把局部与全体对立起来。这样，就产生了各种形式的违反政策的现象。

（二）钻研业务与精密计算不够。

有些同志心中无数，又不肯下苦工夫去作调查研究；业务不懂，又没有决心去学习；有的同志甚至想打“退堂鼓”。

这些同志忘记了毛主席所告诉我们的：“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三）满足于现有的成绩，满足于完成任务的数字，害怕自我批评。

凡是害了这种病的同志，应该很好地重温一下毛主席在七大时对党所说的一段话，毛主席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我们还有什么错误的、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点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与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或错误、缺点，不能牺牲吗？”

（四）官僚主义态度。

第一种：不是准确地本质地一个个地解决重要问题，而是粗率地、形式地一般地应付问题。

第二种：成天埋在办公室的纸海里，不到实际工作岗位上去认真检查工作，发现问题，有效地解决问题。

第三种：命令主义，不是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群众的觉悟程度去行事，而是主观地蛮干。

正如毛主席所说：“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的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实际工作中去考察才会知道。

毫无疑问，上述问题的发生是与旧社会的影响分不开的。我们的事业发展得很快很大，新党员新干部大量增加，党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而老干部对于今天这样新的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又多缺乏经验，有些人又习惯于过去的一套，这些都是原因。但最主要的，我想还是党的领导机关未能有系统地给以政策与作风的教育，及时检查与总结工作，因而就使这些问题未能及时地得到完全的解决。从领导和教育的责任上说，首先是东北局没有做好。这里我要负主要的责任。

这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有领导地认真地解决上面的这些问题。

正确地进行整风运动

如何进行这一次整风运动呢？

第一、这次整风，是从检查工作中整风，而不是脱离工作进行整风。就是说，要来一次全党的检查工作运动，从检查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整顿党的作风。因之，每个部门，每个同志，都应该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严肃的检查。反对一般地泛泛地检查，要一个个地发现与研究政策的与业务的具体问题，并一个个地解决，而不是清谈一番，谈完了事。

第二、整风的步骤是由上而下，先把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整好，再整中级机关与中级干部。对于下层干部，主要是帮助他们总结工作，从而训练与提高他们；他们不懂的东西，要帮助他们学会，群众不喜欢的东西，要帮助他们去掉，培养他们联系人民群众的工作作风。但要注意新老干部结合，上下结合，防止脱节的偏向。

第三、整风的方法是广泛发扬民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方面领导者要以身作则，作诚恳的自我批评，保证被领导者有完全的批评自由，绝对不许压制与报复；另一方面，又要加强领导，防止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口号庸俗化。

第四、这次整风，一般地不进行查成份、查历史（这是组织部门的经常工作）。整风中发现错误严重，须要给予纪律处分；或有政治问题的，应分别由有关部门按正常手续负责处理，以免发生偏向。

第五、各级党的整风，由各级党委负责领导，各企业部门的整风由各该部门的领导者负责。支部应积极地发扬民主，广泛吸收机关中党员与非党员的意见。在整风过程中，要提高各级党委的与机关的支部的工作，建立起学习政策与检查工作的经常制度。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相信：在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这一次全党的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后，我们工作中的各种错误和作风上的各种毛病，一定会被克服，党与人民群众的广泛联系一定会进一步地加强，因而也一定会使党的工作与人民国家的建设事业大踏步地前进！

巩固国防、发展经济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东北人民

政府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各位政府委员、各位出席会议的同志们：

兹提出东北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工作基本总结与一九五一年工作任务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

东北人民在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胜利斗争中，光荣地完成了一九五〇年的经济建设计划。经过这一年的努力，使东北的经济建设获得很大的进展，国防力量也更加巩固了。

一九五〇年东北区国营工业及农作物的生产总值，比一九四九年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一·七，其中工业提高百分之一百一十七·三，农业提高百分之四十四·一。一九五〇年国营工业的生产总值，超过了原计划的百分之十。职工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二。农业生产也超过了计划。全区总产量超过原计划的百分之六·强。铁路运输超过了全年装车计划的百分之九·二。

由于国营企业和农业的发展，以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的贯彻，东北私营工商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以沈阳市为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该市共有私营工业一万二千零七家，从业人员五万零四百十三人，到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户数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人员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四。

以上是一九五〇年东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概貌。这个概貌说明了东北的工业水平比一九四九年又提高了一步。在工业生产方面，尤其着重了对生产资料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一九五〇年东北国营工业的生产总值中生产资料占百分之七十七，生活资料占百分之二十三。很显然的，为了加强我们的国防，为了扩大我们工业的基础，必须采取首先恢复和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放松了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与供应。在这一年中，只就工业部所属工厂的纱布纸张等产量来看，与一九四九年比较，棉纱等于百分之二百五十点四，棉布等于百分之二百四十六点五，纸张等于百分之二百二十点五。同时国家商店供给人民必需品，超过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六。仅就纱布一项来说，一九四九年供给人民四百万匹（捆），一九五〇年即供给了九百零二万匹（捆），一年之内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五。为了便利商品流通，国营商店扩大到一千七百二十一个，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六百六十一个，合作社扩大到一万零三百三十五个，社员发展到一千零七十万人（第三季度数）。

经济发展的结果，大大地开辟了财源，从而保证了财政收支的平衡，保证了国防费用与经济建设的投资。东北全区一九五〇年的实际收入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二十一点七。支出则实现了合理的紧缩与节约。

经济的发展，不仅保证了国防建设的需要，而且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了相当的改善。一九五〇年东北工业部各工厂、矿场不仅增加了就业人员，而且增加了工资，增加了职工住宅及其他福利事业。就重工业部门说：每人平均工资由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份的一百四十分，上升为一百五十七分，平均提高了百分之十二点五。整个工业部系统并为职工建筑了一百五十六万多平方公尺的宿舍（包括俱乐部及医院等），并适当地改善了劳动条件。农民生活的改善，尤为显著。一九五〇年农民的购买力，约较上一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三。如单从纱布说，一九四九年平均每十个人买一匹布，一九五〇年则平均每四个半人就买一匹布了。因之，许多农民添车买马，修房盖屋，添衣换被，猪肥马壮，鸡鸭成群，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经济建设的成果，又给文化建设的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全东北的小学生一九五〇年发展到四百五十七万六千一百一十一人，中学生发展到十五万五千七百四十八人（上半年统计），大学生发展到一万七千九百七十八人。在教学质量上也有所提高。新发展工农速成中学七处，学生一千五百五十人。工农文化补习学校三处，学生三千三百一十一人。受补习教育的职工约有三十六万人，长年参加业余文化学习的农民约有一百八十万人，一九五〇年参加冬学的农民则达四百五十万人。另外，农民还自动兴办了村学二千六百七十三所，学生二十万六千余人。报纸、出版、广播、文艺、电影及其他群众文化事业方面，在密切结合当前中心任务下，均有新的发展和新的成就。

在卫生事业方面，一九五〇年已有二百七十三个县属卫生院或医院，九百二十三个区卫生所，二百四十一个妇婴保健站和三百三十一

个农村接生站，改造旧产婆一万九千三百二十八人。工厂、矿场中还有二百六十五个卫生所、四十一个救急所和二十二个医院。

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对人民群众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伟大胜利和英勇行为，大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的政治积极性。他们积极地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行动，热烈地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这种爱国主义与保卫世界和平的国际主义精神融合在一起的运动，在东北全境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

当着东北人民全力进行经济建设时，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所派遣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破坏。针对此种情况，我们采取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方针，对坚决反革命的分子给以严厉的镇压，但对某些罪恶较轻，并愿意改过自新的分子，则从宽处理。结果使社会安定，匪盗敛迹，人民高兴，生产积极。

同志们！一九五〇年东北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是相当迅速的，这主要是由于工人农民和全体人民的辛勤努力，各级干部的积极工作，苏联专家的帮助，特别是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英明领导的结果。此外，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的工业建设主要地还是处在恢复过程中，所以遇到的困难较少，而农业的丰收，也是客观的有利条件。

（二）

当我们在进入一九五一年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对我伟大祖国的侵略还在继续进行，东北仍然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地位。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伟大行动正在胜利发展中。因此，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人民一九五一年的任务，就是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在去年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与强大的经济力量。因为有了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保卫整个国民经济建设顺利的向前发展，同时也只有发展生产和建设强大经济力量。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更加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使国防建设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的目的。

我们在一九五一年将要作些什么呢？

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计划，更加壮大我们的国防军，训练新的技术兵种，加强我们的空防与海防，有计划地训练公安武装及民兵，改进我们的后勤、军工、卫生的建设，以适合于现代化的国防军的需要。做好优待军属的工作，以巩固部队。

其次，在工业生产和建设方面，根据国防与经济建设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积极地有步骤地发展制造工业。今年工业部系统的生产总值将比去年提高百分之十八，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总值将占百分之八

十五点一，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将要随着人民经济生活的上升而适当地提高，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再次，在农业生产方面，今年每垧地要提高产量百分之六到七，粮食的总产量将要求达到一千九百万吨。为了适应工业需要，今年要扩大特种作物种植面积：棉花扩大到四十二万垧，产皮棉九万吨，各种麻扩大到九万六千垧，产麻六万五千吨。

一九五一年要开始进行西满造林防护地带的种植工作，并有计划地采伐木材三百万立方公尺。对于辽河水系的治本工程，要在今年开始勘测工作和准备计划。

国家商业与合作社在发展城乡交流的中心任务下，今年区内贸易卖钱额，国家商业要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二十八，合作社要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七点五。

交通特别是铁路部门，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完成国家所提出的运输计划。要根据国防与经济的需要有计划的整修公路，提高电讯工作。

一九五一年的财政，主要是从发展经济中加强与改进城市的税收，从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扩大国营企业的利润，以及公平合理地征收公粮，以保障国防费用与经济建设的投资、以及文教卫生等建设事业的经费，并保障物价的平稳。

根据上述计划，一九五一年东北国营工业与农作物的生产总值，将比一九五〇年提高百分之一十三点八。

以上就是我们一九五一年在巩固国防的总目标下，加强国防经济建设的梗概。

(三)

从一九五〇年的工作中，我们得到那些基本经验呢？在完成一九五一年的任务时需要注意那些问题呢？

首先，我们一切工作必须围绕着一个中心目的，这就是“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与强大的经济力量”。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充分认识了：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一切。当帝国主义还在威胁着我们的时候，那种离开国防需要“埋头建设”的愿望，事实证明是一种完全不合实际的空想。因之，我们必须大大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在一切工作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忘我的勤劳和勇敢，充分发展国防与经济力量，完成全国解放，并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对我祖国的任何挑衅，巩固我们伟大的祖国。必须了解：我们的国防力量愈强大，我们的经济建设的成果，我们所致力争取的和平事业，才愈有保障。

第二，一九五〇年工作的经验证明了：发展生产乃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如前所述，由于我们全力发展了工业和农业生产，结果就是城乡人民的购买力大大地发展了；商品流通量扩大了；人民生活改

善了；财政税收增加了；文化教育发展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更加巩固了；国防力量日益充实与强大了。在人民的政权下面，只要生产发展了，一切工作就好办了。因之，进一步发展东北的工农业生产，以便更加壮大我们的国防力量，更是一九五一年东北全体人民与东北人民政府的主要任务。

第三，一九五〇年的经验还证明了，与发展生产同时必须解决分配问题，否则，整个的经济就不能顺利前进。我们的分配工作，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的：

首先是国家商业：主要是活跃城乡、内外的物资交流。除做好对外出口外，主要地应以大力研究与开发内地市场，扩大与加速商品流转，以推进生产的发展。

其次是合作社：必须贯彻基层社为社员服务，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的方针。东北农村中大量存在着的供销合作社，必须为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与供销需要服务，除继续努力解决社员群众的生活资料的要求外，应即将下列任务，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并有计划地逐步地加以解决，即：（1）供给社员生产资料；（2）推销社员土产；（3）发展农村的信贷合作事业，以适应农民扩大再生产的要求。同时应努力改善合作社的经营，使合作社能够更及时地供应社员以更多更好的廉价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

再次是私人商业：要根据商品流转的需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之下积极引导私商参加城乡贸易，帮助它们解决困难，克服城乡交流中的某些人为障碍，但对某些私商违法的投机倒把活动，则应严予取缔。

为了搞好生产及分配工作，还需加强与改进我们的运输工作，严格执行运输计划。

第四，为使生产、分配、财政收支以及国防建设的工作能够密切配合，并遵循着一个总的目标前进，必须加强计划性。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今年经济计划的重点在于编制工业生产与基本建设、物资供应与储备、商品流转、交通运输及现金收支等五种计划，中心关键是从发展观点中来解决物资平衡，现金平衡，运输配合等问题，以便使整个经济更加活跃与发展。

最后，为着胜利完成我们所肩负着的繁重而复杂的任务，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老干部与大量培养新干部，特别是培养具有科学知识与管理能力的经济建设干部。应认真地在全体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组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以及进行政策与工作作风的教育，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不断地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业务能力。继续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培养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和向人民群众随时进行宣传的作风，防止任何骄傲自满麻痹急躁情绪的滋长。我们还须要更加巩固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除继续提高工

人农民的政治觉悟与尽可能地改善其生活条件、增进其健康水平外；并应亲密团结一切反美爱国的人士，开好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要时刻警惕与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我们坚决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东北人民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任务。

在沈阳市“三八”节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

今天举行这样盛大的集会，是为了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大家都知道：胜利了的中国妇女，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从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了。

东北妇女和全体劳动人民一道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支援了解放战争，参加了国家的各种建设工作。大批妇女参加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贸易、交通、运输以及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和保育保健等工作，参加了国家政权建设的工作。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广大妇女群众更高度发挥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各方面均出现了许多先进的妇女，我们热烈地向一切爱国妇女致敬，向一切先进妇女致敬！

在中国人民革命获得伟大胜利之后，广大妇女群众的潜在力量，正在猛烈地发挥起来。她们表现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表现了她们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的政治积极性与劳动积极性的发扬，她们的智慧与创造才能的发挥，必须将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大大推动国家建设事业的前进。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已成为国家的主人，祖国的积极建设者，成为保卫祖国与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大力量！

但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深怀仇恨，它蓄意反对和破坏和平，它不仅发动侵朝战争，而且同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并正在武装日本，扩大向亚洲各民族的侵略战争，妄图奴役中国人民，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请问：我们那一个中国人还愿意再当亡国奴？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再回到妇女受严重压迫的旧时代去？

因之，今年纪念“三八”节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全体妇女和东北人民及全国人民一道，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坚决反对美帝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为了实现这些任务，全体妇女，应该积极参加生产，参加工作，巩固我伟大祖国的国防，发展我伟大祖国的经济，把妇女解放事业，更加推向前进！

全体女工们！要踊跃参加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为完成与超过国家生产计划而斗争！为精通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质量，降低成本，盛行节约而斗争！

农村妇女们！要努力参加到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中去，积极参加劳动互助，改进农业技术，为争取农牧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发展牲畜与增加副业产品而斗争！为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村卫生而斗争！

女学生们！要提高文化、提高政治觉悟、为祖国建设事业服务！

贸易机关的女工作人员们！力求精通经商务，为发展人民的贸易工作，推进生产而努力！

文化教育方面的女工作人员们！积极发挥你们的才能，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后备人才，把科学应用到经济建设中去，进一步发展祖国的文化事业。

保育和保健事业方面的女工作人员们！为爱护我们祖国新的一代而努力，为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而努力！

机关、团体的女干部们！努力精通业务，学习理论政策，做好工作。

主妇们、母亲们，勤俭治家，教育子女，热爱祖国。

各阶层、各民族、各界的妇女，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积极参加祖国建设。

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奋斗。

中国妇女解放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NextPage]

反对贪污蜕化 反对官僚主义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在东北
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报告）

同志们：

我今天所要讲的是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

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

大家知道：我们党经过了三十年光荣伟大、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敌人，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党正在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和巩固自己的国家。

大家也知道：几年来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经济建设工作是有成绩的，各个岗位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

这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毛主席的光荣，党的光荣，无数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同志们的光荣！

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不等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完成。恰恰相反，随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肩负的责任是愈加重大了。

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任务是要“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就是说“建立强大国防军”与“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将我们的国家进一步巩固起来，使其免于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将我国由落后的农业的国家，变为先进的工业的国家；也只有如此，才能将我国的社会制度稳步地引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所奋斗的目标。

但是在全国革命胜利与东北转入经验建设工作为中心之后，大批旧的机关、企业中的工作人员转到人民的机关与企业中工作。他们之中，有大部分经过教育改造而开始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还有一些人改造得很差，甚至根本没什么改造，继续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作风，同时各种奸商与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也都在采取各种引诱欺骗的手段，企图软化我们队伍中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分子，而我们也确有一些党员，甚至个别的老干部，经不起这种诱惑而堕入泥坑，产生了严重的贪污蜕化倾向，腐蚀着革命的队伍，妨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如不彻底解决，就会贻害人民，贻害革命。

这些贪污分子中，严重者已深堕泥坑，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而蜕化为偷盗国家和人民财产的盗贼了。这些蜕化分子，为了掩盖其卑劣行为，争取“同情者”，正在制造各种借口。如说：“由乡村转入城市，为适应新的环境要讲究一些”；“做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应酬”；“机关家务是我搞生产弄来的，个人用一点不算什么”；而如果批评他们，他们又会说别人是“农村观点”，“注意生活小节”等等。他们害怕民主，他们就尽可能地利用这些“理由”来压制与打击群众对他们盗窃行为的批评与揭发，广大的党员与干部当然不会承认这种“理由”，但也确有少数幼稚的同志为他们这种“理由”所俘掳，而不能对之进行必要的斗争。

某些党员干部沾染了严重的地主、买办、封建官僚与其他非工人阶级的庸俗文化的观点和作风：他们对革命胜利的看法，不是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夺取政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而认为是革命的“尽头”。因而骄傲麻痹，在政治上丧失警惕，敌我不分。极端无原则地任用私人，以致把反革命分子也拉进革命机关中来，并包庇这些人。如我们东北人民政府有一个部长，不经组织批准，先后录用了十六名亲戚、朋友为干部，其中有叛党分子四名，反动党团及有严重政治嫌疑的分子三名，被关的逃亡地主两名，原在他处工作的因品质不

好被洗刷者三名，而他对这些人的政治情形事先是完全知道的。又如还有一个在政府里担任副局长的干部，也私自介绍了六名亲友到他工作的局里工作，其中有四名已查明是有政治问题的；如他的弟弟是有重大血债的“清剿”队长，但他却委为该局供应科员，并拟提为科长。又如沈阳市人民政府的一个局长，把犯人改造队介绍来的一个原蒋匪炮兵营营长张汉杰分配为工程队长，张在工程队进行反革命活动被人民政府枪决，他尚表示留恋说：“张的工作真积极”；他同时还包庇与伪中统特务有密切关系、表现很坏的王某，硬说他“不是政治问题，是思想落后”。

这种观点还表现在某些党员干部中所产生的忽视政治的倾向。他们不愿过党的生活，不重视理论学习，说：“开党的会议是闲事，哪有时间搞这些闲玩艺？”甚至拒绝做党的工作，被分配担任党的支部工作时认为是“欺负老实人”，借口学习技术，忽视或反对理论学习，说“不学习政治可以工作，不学技术不能吃饭”。正是因为他们是如此地讨厌政治和憎恶党的组织生活，因而他们的许多错误思想也就难以纠正而愈加发展了。

同志们！你们看这些人的共产主义的原则性到哪里去了？请问，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可以允许的吗？

这些问题严重不严重呢？毫无疑问，是很严重的。

它的性质如何呢？它是把地主、官僚、买办和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工作作风带到我们的党内来了。这些东西是同马列主义根本冲突的，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相冲突的，是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作风相冲突的。它是腐蚀党的毒素，是党与人民的敌人的喜欢的东西，如果不能及时给以克服，而任其发展，将会腐蚀党的战斗力，并使党的事业无法前进一步。因之必须组织全党同这种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彻底克服它。

为什么这种严重现象能够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存在呢？这里除了一些不纯分子混入了党的组织，同时在人民政府的各部门中留用了不少思想上未经彻底改造的人员而外，还由于极少数的较老的党员思想情绪发生了变化（如居功自傲和享受思想的发展），特别应指出的是各级领导机关中官僚主义，组织不严密，马列主义教育进行的不够，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很好的展开，检查工作很差，因而对上述思想倾向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甚至对于那些贪污蜕化分子，采取“慢慢地教育他们，不要着急”的姑息态度，这就给了那些贪污蜕化分子以可乘之机。

这里我准备说一说东北一级某些机关中官僚主义的情形。

我们有这样一些机关，有这样一些领导同志，他们沾染了浓厚的官僚主义的习气，他们注意形式的装璜，例如沈阳街道上的美国、英

国汽车增多起来了；送礼、请客的情形也多起来了，似乎不乘英美制的汽车就不能工作，不送礼就不足以表现革命的友爱，而开会如不请客，就不足以表现会议的成就一样。

至于说到工作的情形，那么，我们某些单位就不如对于汽车请客那样“积极”。

我们的东北人民政府的一个机关，一件渔民组织工会的法令，在机关中旅行了四个月还没有公布。

我们一个部队的参谋长，经他自己签署发下去的一个命令，既不加检查，而且连这个命令都忘了。

有一个卫生机关，那里的若干箱医疗器具都生了锈还不知道，药品坏了也不知道。

我们一个机场的场长报告说：“据报机场被水淹”，其实机场根本没有淹，因为他是“据报”的。同志们想想，做场长的住在飞机场里还在“据报”呢，请看，我们的官僚主义到了何种程度！

至于机关随便添人，随便添家具，随便接家眷，随便雇保姆的情形那就更多了。某些单位，对公物之不爱惜更达到惊人的地步。而在某些机关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敷衍塞责、等因奉此、例行公事、滥发文件表格，不检查、不解决问题，以致把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变成了没有生气、没有创造、谈空话、滥发号令的官僚机关的事实，也不胜枚举。

这些官僚主义者，对盗窃国家财富，侵吞公产的事实，简直是熟视无睹，他们从不对这些罪恶行为加以起码的检查和追究，他们正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样：

“他们好像瞎子一样，看不见这些事实，以为‘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但这些同志们是大错而特错了的。也如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制一样，我们苏维埃制度的基础就是公有制。如果说资本家当时用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办法，而达到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那么我们共产党人就更加应当宣布公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来巩固一切生产部门与商业部门方面的社会主义新经济形式。容许偷窃公有财产，容许侵吞公有财产，不管是国家财产也好，或合作社和集体农庄财产也好，而不理会这种反革命的胡行，便是帮助敌人来破坏我们这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苏维埃制度。”（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下册五七六页）

同志们！在我们国家也是一样，容许盗窃国家财产，容许贪污浪费的胡行，就是容许破坏我们国家的物质基础，就是容许破坏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这种行为，这种作风，难道是可以容许它继续存在吗？

同志们，肃清我们各级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的必要，难道不是很显然的吗？

为了肃清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应该进行下列措施：

（一）要在所有机关中，无例外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来揭发本机关内部的以及有关部门和一切人员中的贪污蜕化的思想行为与官僚主义的作风。这个运动，应该由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自领导，有准备地进行。即先搜集材料做报告，号召犯有这种错误的人自动坦白改过，号召群众揭发、检举，务使全体人员彻底认识贪污蜕化是革命队伍中最丑恶最可耻的行为，并认识这种思想与行为对于党和国家的危害性，使大家了解“大敌当前，有打倒之必要”，从而使任何一个贪污蜕化分子在革命队伍中无藏身之所，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空气。这样，才能将这个斗争进行彻底。各个机关的负责同志（特别是财经机关），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把这个运动进行到底，不许中断。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干部健康，事业前进。

要使这个运动开展得好，必须做好教育工作；必须把这个运动与整党教育联系进行。要在党员群众中结合这运动中所揭发的事实，具体说明如何做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党性应当如何；说明贪污蜕化分子所喜欢的东西，正是我们所反对的东西，他们所憎恶、所害怕的东西，正是我们需要加强的东西。用登报、广播、演戏、漫画、好坏对比的方式说明每个党员、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应当如何同盗窃行为作斗争，如何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这些工作做好了，就可以有力地推动这个运动，大大地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他们爱护公共资财的责任心，就可改进我们机关的工作作风，使我们机关的政治面貌为之一新。这个工作是长期的，应该反复地去做。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

“我们必须与盗窃行为，与我们国家机关、合作社、职工会中的所谓‘快乐的’盗窃行为进行有系统的斗争。如报纸上所说的，有可耻的隐蔽的盗窃行为，有勇敢的‘快乐的’盗窃行为。不久前，我在‘共青团真理报’上讲了奥古涅夫论‘快乐的’盗窃行为的文章。似乎有这样一个潇洒人物——有着小胡须的青年人，他在我们的一个机关里快乐地偷东西，他有系统地经常地偷东西，并且偷得很成功。在这里更值得注意的，不是贼本人，而是这种事实，即周围的群众，明明知道贼，不仅不和他斗争，相反的，拍拍他的肩头，称赞他的巧妙，因此贼在人们眼里成了一种英雄。同志们，这是值得注意的，这也是最危险的。当捉住了一个敌探或叛徒的时候，群众的愤怒是没有界限的，都要求枪毙。而当贼在大家眼中活动，盗窃国家财物的时候，周围的群众却限于慈祥的微笑和拍肩称赞。很明白，盗窃人民财物，损害国家经济利益的时候，也是敌探及叛徒，要是不更坏的话。最后终

于逮捕了这个有着小胡须的潇洒的小子。但逮捕一个‘快乐的’贼，你依靠国家保安部是不能把他们全部除尽的。这里需要另外的、更有效更严肃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在这些贼周围造成一股道德抵制及周围群众憎恨的气氛。这种办法，就是在工人和农民中掀起一个运动，造成一种精神的气氛，这种气氛排斥偷盗的可能性，使偷窃人民的财物的盗贼，不论‘快乐的’或‘不快乐的’，都不能生活与存在。消灭盗窃，乃是防护我们积累，避免耗费的手段之一，——任务就是如此。”（斯大林：论苏联经济形式与党的政策；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建设下册六十九至七十页）。

同时，为了吸引广大的党与非群众参加这个运动，并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要把这个运动成为一个民主的检查工作、检查思想、检查作风的运动。应该宣布所有党与非党群众均有向一切机关、一切负责同志控告任何党员与干部，所谓发挥积极性不能只是一句空话，必须具体表现领导机关、干部与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制度的民主化，没有或缺乏民主生活，是不能达到发挥积极性之目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此外，为使这个运动进行得正确并收到最大的效果，在进行中还必须教育一切党与非党的群众实事求是，方式要恰当，防止夸大与诬陷，并警惕破坏分子乘机活动。

（二）对运动中所揭发与检举出的证据确立的贪污蜕化分子，必须以极端严肃的态度加以处理，任何迁就与原谅的态度都是错误的，都是对革命的罪恶。因为如果不这样，就等于放纵坏人，鼓励人们做坏事。

对待这种不可救药的贪污蜕化分子，必须学习列宁的严正态度，列宁说：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民众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决心而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使群众保持紧张心情而能无情镇压腐化分的那种革命热忱，未长久坚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这样不巩固，其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上薄弱，而且有无产阶级（如果它已经有充分的数量，充分的觉悟和充分的纪律），才是唯一能够将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更简单更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穷人）吸收到自己方面来，能够充分长期地执掌政权，来完全压服一切剥削者和一切腐化分子。”（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三二页）

在那些犯了贪污腐化错误的人的面前，摆着两条道：一条是悔过自新，重新为人民工作；一条是继续坏下去，为党和人民所唾弃。何

去何从，须要他们自己选择。但是，既要做坏事，又想装模作样，不丢掉“党票”，这是不可能的，利用党员的地位、国家机关的职权去做坏事是党和人民所绝不能允许的。因此，对那些情节严重，不可救药的分子，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给以严格的制裁，并开除党籍。其余应按情节轻重与本人改悔的程度，根据党纪、法纪分别处理。凡自动坦白者，重者减罪、轻者免罪；一贯贪污腐化或贪污数目甚大经检举而仍不坦白悔过者，从严惩处。对赃物的处理，原则上必须追还，其已浪费一部不能全部追还者，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今后凡是需要送司法机关处理的贪污案件均要送司法机关处理，不能仅由本机关批评一顿，马虎了事。

今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要有计划、有组织地检查这一问题，在最近时期内要集中力量来与贪污蜕化及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人民创造财富的战斗英雄、先进工人、模范农民、模范技术人员、模范青年、模范妇女、模范革命工作人员、模范的党与非党干部。对于这些人，我们要积极鼓励他们前进，敢于提拔他们到适当的岗位上来。对于这些先进模范人物的提拔，应该像撤职并惩罚那些贪污蜕化分子一样的坚决，借以伸张正气，肃清歪风。这里我们必须记住毛主席的话，他说：

“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与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等等精神，才是值得尊敬的模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四）在这个运动中，应该无例外地对于各个机关的工作与领导作风来一次严肃的检查，必须向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开火，因为它是贪污腐化这种毒菌之所以能够滋长的温床。要肃清贪污蜕化的倾向，必须同时肃清官僚主义。有些机关中那种应付差事、只说空话、不切实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现象，必须让它寿终正寝，而代之以生动活泼的、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和工作作风。因之，对于各个机关的工作，都要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加以检查，加以裁判。在检查工作的实际结果，要检查各种制度的规定是否妥当、贯彻的情形如何，从而并修改、充实与建立各种必须建立的制度。

今后制度一经制定，就要坚决执行，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比如：与商人来往、机关生产、生活待遇、用人行政、使用汽车、接家属、

用保姆等，都要有一些定的制度，不能各行其是（今后经过批准接来的家属，除老弱外，均要参加劳动，实行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

规定了制度，还要实行各级负责制，不得相互推脱责任。

“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就是官僚主义埋没了隐藏在我们系统中的无数可能，不利用他们，企图把群众的创造性化为乌有，关在事务房里，使党的每种新的发端都变成细小无聊的贪欲。第二，官僚主义的危险，就是官僚主义经不起关于执行情形的审查，它企图把领导机关的主要指示变成纸上的、和实际生活完全脱离关系的空话。不懂那些在我们机关中的旧官僚分子也是危险的，并且比旧官僚更危险。至于在苏维埃的官僚分子也是危险的，并且比旧官僚更危险。至于在苏维埃官僚中间，‘共产党员’的官僚分子还起很大的作用。我说的是有些‘共产党员’，他们用办公处的命令、吩咐（他们相信这些东西的力量，好像相信偶像一样）的方法，去代替几千万工农群众的创造性和自动性。这里要说的是把我们工作中官僚主义消灭，把官僚主义的‘道德’和‘习惯’肃清，好去利用我们系统中的可能，发展群众的创造性和独立性。

……

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党的工作向四方面进行：“发展自我批评，审查各种工作执行的程度，清洗机关，从工人阶级中自下提拔忠实的工作人员到机关中去。”（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下册四七三至四七四页）

关于检查工作与批评的重要性，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

“据说，对于胜利者是不应裁判，不应批评，不应检查的。这话不对。对于胜利者可以而且必须加以裁判，可以而且必须加以批评和检查。这不仅对于事业有益处，而且对于胜利者本身也有益处；那他们就会少骄傲一点，而多谦逊一些。……若是我国共产党害怕批评和检查，那它就会没有多大价值了。……”（斯大林同志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也正如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所说：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发生灰尘的。也应该打扫与洗涤。‘洗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的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错误、缺点这类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与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

效的方法。以‘惩前启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扭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我们还有什么错误的、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与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或错误、缺点，不能牺牲吗？”（论联合政府）

最后，要在这个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党内理论教育的工作，整顿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经常检查工作的制度。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深入进行“三反”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一年来，全国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各种建设工作也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奠定了朝鲜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基础。这个斗争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相信自己有力量保卫祖国，也使亚洲和世界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得到鼓励，更加壮大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的斗争，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事业作了卓越的贡献。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外，将在一九五三年内全部完成。这些伟大的胜利，增强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推进了经济建设和各种建设事业，使金融物价继续保持平稳，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

但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侵略战争还没有停止。因此，我们的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必须继续进行。毛主席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指示我们：“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

为了实现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我们东北地区，必须更大规模地全面展开增产节约的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目前主要是在工业系统中展开起来了，今后我们要把这个运动在一切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中毫无例外地开

展起来，在工业生产部门中要继续使运动深入，争取超额完成计划，已完成或即将完成计划的单位，要重订新的奋斗目标。在一切机关、部队、学校等非生产部门中，要运用工业部门开展这个运动的经验，认真进行清理资财、登记财务、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发挥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

工业部的增产节约运动，是在今年五月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为增产节约五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的口号后展开的。到目前为止，各国营厂矿（包括地方企业）所订的增产节约计划，已超过一千万吨粮食，而据八月底的统计已完成了四百五十万吨，从九、十两月各厂矿增产节约数字逐月急剧增加的情况来看，整个计划是可能完成的，现在的奋斗口号是争取超过计划。

各厂矿增产节约的进展情况，大约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增产节约计划的，这在目前还是少数，如五三厂、冶炼厂等。第二类是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计划已经深入到车间班组中去，有把握完成计划。这在工业部系统的厂矿中占多数，并且在非工业部所属的企业中还占相当大的数量。铁路系统就属这一类。第四类是根本未动的，这也是少数。

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按企业系统来说，工业部较好。按地区来说，沈阳、抚顺、鞍山等地较好。

为了把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得更好，要针对四种不同的情况给以具体的领导。

第一类的厂矿，要巩固与发展已有的成绩，进一步发动群众，增订计划或提出超额计划作为新的奋斗目标，防止领导上自满和群众松劲。

第二类的厂矿，要向第一类看齐，争取提前完成计划，用签订集体合同、组织竞赛、修订爱国公约等办法，发动群众去找窍门、提高技术、推广先进经验，防止可能的“万事大吉”的思想发生。

第三类的厂矿，要把计划迅速传达到车间和班组中去，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职员，立即下到车间去，跟工人一起研究发掘潜在力量、订计划、找窍门。

第四类的厂矿，上级领导部门还未提出任务的，应当迅速提出，具体进行布置。已提出任务的，要召开各种会议，说明增产节约运动的意义和方针，克服思想上的各种障碍，使所有人员都动员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发挥企业的潜在力量，完成增产节约的任务。地方党委和工会，要对他们加强领导和帮助，深入进行检查，协助他们解决问题。

怎样才能把增产节约运动开展起来，真正变成群众性的运动？过去说这一时期的主要经验是：第一，说明方针；第二，挖掘潜在力量；第三，制订计划；第四，找到窍门，组织竞赛，订立集体合同，进行奖励。

现在，我来讲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问题。

我们从九月初开始的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已经进行了近两个月，由于发扬了民主，广泛发动了群众，已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主要表现在：

（一）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倾向。以往在某些公务人员中存在的若干错误思想，如：“厚俸才能养廉，薪水这样低不能不贪污”，“从公家那里捞一把是可以的，只要查不出来就行”，“农民经济上升、工人增加工资，自己发点财不算什么”，“不会贪污、不会捞一把是傻瓜”等，因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严厉批判而有了重大的改变。本溪煤铁公司基本建设处一个职员曾打算携款潜逃，故在任职时假报籍贯，经过这一运动他把这一罪恶的想法反省出来了，认为“反贪污运动挽救了自己”。还有的认为：“要是早点反贪污，我也许不会有这场贪污啊！这回可明白，以后一定廉洁奉公”。总之，“贪污是最丑恶、最可耻的行为”，已经成为党与非党干部所公认的新道德观念了。

（二）大大提高了干部与群众的觉悟，加强了爱护国家财产的责任心与积极性。有的干部过去认为：“我是供给制，人都是公家的，多用点公家东西不算什么”，现在则认为除应享受待遇外，不应再侵占公家丝毫。本溪煤铁公司许多工人过去随便把公司东西带回家用，以为没有什么不可，现在却普遍认为这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本溪市公安局有人要拿公家椅子回家，群众就出来制止：“别动公物”。还有一个技术人员说：“我拿几个月薪金却没有做工作，这也是一种浪费”，因此要求多分配他一些工作。许多新参加工作的干部与人员反映：“幸亏参加了这一运动，不然难保以后不犯错误。”更为普遍的是学得头脑清醒了，警惕提高了。

（三）揭发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各级领导深刻的认识到若干干部不自觉的陷入贪污的泥坑，也正是因自己不检查工作，对干部缺少原则立场的教育所致。由于许多领导同志在运动中向群众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不仅没有丧失领导威信，而且发现了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办法，更加提高了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因而工作做好了，成绩更加巩固了。这样，某些因疑虑重重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领导同志思想搞通了，从而增强了依靠群众的思想，加强了工作，大大提高了领导水平。

（四）培养了干部，涌现了大批的优秀积极分子。

（五）机关开支大大紧缩了。

总之，由于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展的结果，洗掉了我们机关中的不少灰尘，加强了领导，提高了群众，进一步发现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大大地推动了工作的前进。贸易部某些职员过去说：“我每天只卖给公家八个钟点，其他的时间干什么，公家管不着”，另外一些工作人员经常迟到早退，但现在却完全改观了；最近该部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外出，内部工作却比过去做得还好，而许多原来作风正派的工作人员则更加积极了。也正因为如此，就促使运动更加深入发展。群众接着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大大超过了反贪污斗争的界限。如“工作手续不严格”、“不安心工作”、“自由主义”、“闹地位、闹薪金”等许多不良现象，几乎都被提出来了，从而发展为群众性的检查工作、改造思想的民主运动。许多同志看到这些成就后，感动地说：“过去我看不出什么是新社会，什么是旧社会，这回可见到事实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才能这样，中国真是前途远大，无限光明。”

这些成绩，是那些领导有决心、群众发动得较好的单位所出现的新气象。

但是，这一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还有一些单位，群众的积极性还没有被发动，那里存在问题，也还没有被暴露、解决。原因是：这些单位的领导，还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或者是由于某些领导干部依然认为自己部门没有什么贪污、浪费，对于开展这一运动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而少数单位则是由于领导上决心不够，存在顾虑，害怕自我批评，不敢甚至不愿发动群众所致。

综合各地开展这一运动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才能使运动收到最大的效果。为此，应该吸收一切党与非党群众参加，并反复向他们说明运动的意义，组织他们学习有关的文件，充分进行酝酿，不断地提高他们的觉悟。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决心把运动搞好，并对于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做不好，再做一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有贪污行为的人，开始常常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抵抗和逃避反贪污的锋芒，因此领导上必须为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要针对各种思想顾虑，给以解释。如贪污分子不坦白，主要是怕丢人、怕倒脏、怕撤职、怕法办；群众不敢检举主要是怕得罪人关系搞坏、怕“穿小鞋”（领导上给找麻烦）、怕现在只刮一阵风将来报复。经验证明：运动开始时，群众往往不敢公开讲而采取密告的办法，对此必须认真地加以处理，以鼓励群众大胆揭发，运动真正展开

之后，顾虑就少了。第四，掌握教育和挽救的政策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凡自动坦白的，减轻处分，小的贪污，经过坦白并查清之后，可当众宣布这次免罪，以后再犯，加重处分。第五，根据运动的发展与群众的觉悟，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与经验，以推动整个举动的前进。如开始时群众只讲小的，不讲大的；只讲过去的，不讲今天的；只讲下面的，不讲上面的；只讲一般的，不讲具体的等，我们就组织了一些典型报告与讨论，引导他们由小而大，由过去而现在，由上而下，由一般而具体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第六，以一批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做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两个月来的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中还发现：在我们不少机关、不少部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极为严重的浪费现象，根据初步揭发的材料，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因工作不负责所形成的损失：如若干企业部门在生产缺少精密的计算，以致积压资金、物资，未应用于扩大生产；某些工矿企业因缺少严格的管理与检查，发生损坏机器、浪费原料的事件；保管不负责任，使物资霉烂、损失；因采购马虎而使国家遭受损失以及因制度松懈而遗失国家物资、公款等。

（二）修建不经周密的勘察设计即行施工，在修建中经常修改计划、停工待图、返工重修，以及因计划不周修建规模远远超过修建能力所形成的中途停工的损失。今天各机关的修建中，许多是不必要的补修，以致国家为修建的支出很大。

（三）以国家资财作为“小家务”，随意在国家规定的供给标准之外额外开支。

（四）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如某单位，今年七月比去年年底增加人员百分之八十四。据估计他们如抽调出四分之一的人员，工作仍可以照常进行。

（五）生活铺张，如请客、送礼、任意购置家具，以及衣、食、住方面随便超越制度等。

由于对这些浪费现象的揭发与批判还不够，不少干部对浪费给予国家财产的严重的危害性尚认识不足，其中有些人认为这些浪费是“难于避免”的，或者以为这些“开支”是“合理”的，而有些任意浪费国家财富的人和官僚主义者，也正是以这些“理由”为借口，不正视与纠正他们的错误。事实证明：恰恰是因为这些浪费现象的存在，才使那些贪污蜕化分子得以混水摸鱼，得以大量盗窃国家的资财。

两月来的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的无数事实证明：增产节约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如果这些贪污现象不能肃清，不但断送了一些干部的前途，而且无法积累资金进行国防建设与

经济建设。因此，必须继续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提高干部与群众的事业和积极性，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的运动。为此，我们必须：

首先，一切单位必须立即学习并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开展一个全面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把工矿部门的增产节约运动经验推广并贯彻到一切部门中去，充分地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与智慧，对各种工作加以精密的组织，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提高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并发动全体工作人员拟订在工作和生活中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具体办法，并贯彻实行，建立切实朴素的工作作风，为国家创造更多的成绩，积累更多的财富。

其次，鉴于我们对于普遍存在的各种浪费现象的揭发、批判与纠正还不够，因此凡是那些群众已经发动，贪污蜕化、官僚主义已经大体揭发的单位，还应再继续搞十天半月，集中力量反对铺张浪费。而在对贪污腐化揭露不深的单位，则要把两者联系起来进行。同时应注意：（一）对问题比较严重的部门加强具体领导。（二）尚未发动的单位均应迅速发动。（三）采取教育和挽救的政策，正确地处理自动坦白的分子和被检举的分子，并提出具体处理的方案。审订原有的衣食住行、录用人员、机关生产、财务等问题的制度。提倡朴素的作风，今后一切内部往来，一概不准请客送礼、不准购置沙发地毯，除已经批准的国防与生产所必需的设备和修建外，非经东北人民政府批准不得修建。

而在群众发动得不好或没有发动、问题还未暴露或暴露很少的单位，中心则是根据运动中已获得的经验，认真地发动群众，发扬民主，把运动深入开展起来。最近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若干反革命分子与投机商人勾结蜕化分子盗窃国家财产的事件中充分说明：投机商人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蚀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则不很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纪律外，还必须坚持贯彻在这次运动中所修订出的各种制度，及时地表扬一切廉洁奉公、爱护国家财产的模范人物，严厉制裁一切贪污蜕化分子，以保证在全体工作人员中真正树立新的道德，新的工作秩序。

同志们！我希望大家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全东北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各种贪污浪费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使好的东西生长起来，把坏的东西克服下去。这样，我们就会给国家和人民一方面创造了无限的财富，一方面节约下大量的财富。我们用这些财富去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去巩固国防，去进行经济建设和其他建设，都会产生无限的力量。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
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在中国共产党
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同志们！

东北地区的党的组织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进行了抗美援朝工作和增产节约运动是有成绩的。据工业部、财政部、贸易部、铁路、地方工业局等单位至去年十一月底的统计，已增产节约价值等于一千四百五十八万吨粮食的财富。在领导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方面也是有成绩的。这个斗争暴露了党员干部思想中许多严重的问题，使我们在领导工作中更加清醒地认识资产阶级是在如何猖狂地采取新的花样来侵蚀党的队伍，党内右倾思想的严重危害，并加以坚决的克服。不这样做，不仅不能贯彻中央“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准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方针，而且会使我们已得的成绩也不能巩固。

东北地区的党内的右倾思想，表现在许多方面。这里只讲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題方面；一个是在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问題方面。

一、关于对待资产阶级问題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举行的党的第七届中央第二次全会上，已经向全党发出警告。毛泽东同志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此后，东北局根据党中央的决议，曾多次地向东北地区的党的组织发出警告。虽然如此，资产阶级思想和影响对于党的侵蚀，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还是有加无减。

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題上的右倾，主要表现在对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缺乏必要的警惕与斗争以及在执行政策上的右倾。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我们党将工作重点转入城市，转入经济建设，因而与资产阶级的接触日增（这是不可避免的），而资产阶级一面承认我党的领导，一面则在各方面尽量扩大其思想影响，并采取各种新的方法和形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全国的胜利，在我们党内的一部分人中发生了错觉，产生了若干糊涂思想，他们以为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是意味着在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加剧，而以为为是阶级斗争的缓和。他们对资产阶级一味迁就让步，欣赏资产阶级的捧场。至于有些党员本来出身资产阶级的，当然更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并在党内散布这种影响。这些人就构成了党内的右倾分子。其中少数人，已成为与资产阶级狼狈为奸、盗窃国家财富的叛徒了。我们党内工人阶级成分的薄弱，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不够，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政治倾向的批判不够，对加重了资产阶级思想对党侵蚀的危险性。

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方法则是两条：拉过去；派进来。

所谓“拉过去”就是腐蚀我们的干部。我们在去年的反贪污的斗争中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干部中（其中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的贪污现象是严重的。这些贪污事件，特别是财经机关和企业中的贪污，绝大多数是在资产阶级的勾引下进行的。由于资产阶级的勾引，这些贪污分子，就成为资产阶级安置在国家机关、人民企业中的暗盗。他们盗卖商情、盗卖资材、偷工减料、以贱报贵、以坏报好、涂改单据、假造账目、走私偷税，并借公家的名义和各种便利条件，替资本家追逐暴利。资本家为了笼络这些贪污分子，不惜出大的本钱，例如长春税务局一个职员叫韩慕文，每月挣私商九百分，一次即包庇七户私商漏税一亿二千万。资本家向他们说：“公家如果开除了你，我养活你。”资本家同时和这些贪污分子订立合同，规定“各守据点，掉头不谈，谁也不讲谁，攻破谁算谁。”

资产阶级另一个侵党的办法就是“派进来”。根据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吉林的材料：我们的国营商店与合作社有相当多的人员是资本家带着他的商店一起变成为国家商店或合作社的。大连百货公司有六个营业组长都是大商人（如钟表部、照像部、食品部等）。该公司共一千三百人，其中一千二百人是经过私商介绍或招聘的，并准备提一个大商人任公司副经理。该公司管理物价的共三十五人，其中十二人受贿，这些人很多是私商的情报员，物价一变商人即先知道，并争先抢购。该公司的钟表部组长，即为大连有名的钟表商，在被邀任组长时与公司订立条约言明：一不参加会议；二不参加学习。其任组长后以自己商店的坏表，换走公家的许多好表，甚至把人民捐献的好表也换走了。大连的粮食公司、土产公司、花纱布公司的营业组长中即有五个是在大连同时开商店的大商人。也有资本家派其子女、亲戚或亲信分子钻入国家商店或合作社，他们进来不是为国家商店与合作社服务，而是为资本家服务。一些地方的国家商店与合作社被其篡夺领导，倒换货物，偷窃商情，囤积居奇，捣乱市场，把国家的企业机构，作为资本家盗公肥私、投机牟利的工具。而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对资本家这种阴险恶毒的办法，欲失去知觉，甚至还有这样糊涂的同志，认为：“资本家真开明，连自己的商店都社会主义化了！”“资本家会做买卖，懂业务，我们必须依靠他。”

同志们：依靠资产阶级，就会丢掉工人阶级，就会丢掉人民大众，就会亡党亡国，这个定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党内除了一些人对资产阶级思想对于党的侵蚀缺乏必要的警惕与斗争之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不竭力壮大与搞好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天天盘算“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他们不准备成为人民的企业家，而要追求本单位的局部利益，以供少数人，甚至几个所谓机关“首长”的挥霍浪费。更甚者，则要当商人或工厂老板，以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让私商占便宜。还有一些人（甚至是高级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通过家庭，通过亲戚，或投资私人的商店、工厂，为自己谋利。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必须受到国法党纪制裁的。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应该赶快回过头来，向党坦白，改正错误。

至于党内一部分同志在工作作风上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这里就不说了。

因这资产阶级这样地侵蚀我们，就产生了我们在执行政策上的右倾。以下是几个重要的例子。

一、在贸易政策上：有些地方对私商向国营商业抢地盘和投机违法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加以帮助；而对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开展业务与扩大零售比重，则很不积极。这就助长了私商的投机活动，使他们能够利用国家零售商业薄弱，顾客拥挤的机会，抬高物价。

二、对于委托资本家加工和向资本家订货时，资本家偷工减料、获取暴利和勾结公家人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不认为是犯法的罪行，不加以应得的惩处。

三、在税收政策上：商业税轻于工业税，而行商税又轻于座商税，这就助长了资本家的投机倒把活动，将工业资本转为商业资本，座商转为行商。

四、在私人企业中的工人运动政策上：对于私人资本家虐待工人、分化工人（欺骗工人人身股，扣留工人工资的一部分，美其名曰‘投资’）、违反劳动法令的行为，很少制裁。有些地方的劳资协商会议，甚至成为资本家蒙蔽国家、蒙蔽工人，偷工减料、投机漏税的工具。

五、无原则地提倡私商联营。

在思想战线上对反动思想缺乏严肃的斗争，忽视政治教育，模糊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也是政策上右倾的重要表现。由于同样的错误，我们的许多组织，在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上，滥用私人，使不少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各机关部门，同时对于留用人员与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工作人员，放弃思想改造和政治领导，致使他们各种敌对阶级的思想与作风自由泛滥而无人过问。

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常常说对资产阶级不要“左”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左”。我们既不随便没收、封闭资产阶级的企业，又不超过国家的规定去增加税收，我们允许私人资本家在合法范围内、

在国家经济领导下经营他们的工商业，这就不是“左”。相反的，如果对资产阶级盗取国家财产的行为置之不理，对奸商投机违法、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熟视无睹，对奸商勾引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不法行为不敢予以惩罚，那么，右倾都是毫无疑问的了。

为了克服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使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获得全胜起见，应把党、政府和军队内部的力量与社会的力量结合起来，对资产阶级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犯罪行为，予以彻底揭露、处理。各城市必须迅速召开协商委员会、人民代表会和工商业者的会议，在掌握了一定的材料之后，号召他们限期坦白和检举；凡坦白彻底者，重者减罪，轻者免罪；检举他人者以功折罪，证据确凿而不坦白者，加重处罚。处理的原则是：一般的“回扣”等恶习，经过对资本家批评后加以废除，不作处罚；但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和国家经济情报等犯罪行为，则根据坦白或被检举的不同情况及对于国家的危害程度大小，认真严肃地依据国家的法律处理。

在这一运动之后，应当号召工商联按行业组织资本家订立以后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公约。

过去东北地区四个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有成绩的：打击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教育了干部、人民，节约了国家财富（机关经费开支减少约三分之一），惩处了少数不可救药的分子，挽救了一批干部。但运动的范围还只局限在机关内部，未成为广大群众参加的社会运动。运动发展不平衡。上面搞的好一点（但也有被动的），还未深入到下层，税局、商店、工厂、矿山、专卖机关、粮食机关、合作社、银行、修建机关、建筑公司和仓库、以及县、区、村各级政府和城市的派出所，有的只是动了一下，很多的单位还没有动。

总起来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比较彻底的；（二）不彻底的；（三）未动的。这三种类型的情况和任务如下：

（一）比较彻底的：首长带头，群众动了起来，贪污揭发的多，浪费和官僚主义揭发不甚彻底，已揭发的问题，有些还未处理。这种单位，要组织所有人员彻底揭发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严肃处理揭发出来的问题，在处理中继续发现漏网分子，并在思想上检查资产阶级影响，定出改进工作办法。

（二）不彻底的：首长被动，群众积极性未充分发挥，坦白和揭发了一些贪污现象，但很不够，大的贪污犯未动，或者已经发现，领导上畏首畏尾不作处理，以致运动陷于僵局。这种单位，行政首长，

必须在今天的会议之后（各省市在负责同志回到本地之后）两天之内动起来，否则不是手面不净，就是官僚主义，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

（三）未动的：各单位都由行政系统迅速布置，五天之内行动起来，否则那些单位的首长也一律撤职。地方党员对本地企业部门要负责领导和督促检查。这是今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重点。不论哪一种单位，都要召开党员大会、团员大会、工作人员大会党代表会议，讨论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并按照指示行动起来。压制民主，压制批评者和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者，不论担负什么职务，都要严予惩处。

各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应当带领一批得力的检查团进行检查，各省要抽出力量帮助和检查所属的县。要少发文件、少开会、少坐机关、深入下层，面向工厂、农村、商店等基层单位。各地运动进行的情况要经常向东北局作报告，通电话的地方，要用电话联络。

一、肃清各该部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对于贪污浪费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我们已将劳动部长唐员超撤职，开除党籍。沈阳工商局长韩永赞、卫生部药政处长李廷琳、医药公司经理罗惠春撤职送法院，东北盐务局长余坚、对外贸易局长杨勉、大连商业局长朱华撤职，其他人员正处理中。

二、积级领导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工作的，如军队的周桓、周赤萍、以及这一运动进行的比较好的单位，如军区政治部、政府办公厅等，生活艰苦朴素的干部如张子良、宋彦昌，较朴素的机关如公安部、东北日报社等，都要加以表扬。

三、经过实际斗争和宣传，树立一种新的道德，使正气上升，邪气敛迹。

四、贯彻最近规定的各种精简节约制度（与私商往来制度、财政审批与会计制度、生活制度、用房制度等）。

二 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

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右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对人民民主专政下经过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的认识错误。有的同志认为：在土地改革后，在经济发展中，既然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让其自发和分化好了，用不着去组织农民的生产互助、更用不着去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了。也有的同志认为：农民的自发势力，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加以适当的限制的。因此他们认为农村共产党员的现任不是提倡农业生产互助及用农业生产合作的示范作用，逐渐地吸引农民一步一步地走向集体化。相反，他们认为农村共产党员的现任是在经济上升之后带头雇工，使自己达到富农的地位，让农民感到有（奔头）。

这种说法实质何在？这是否认了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这是要工人阶级放弃对农民的领导；这是对农村中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表示软弱，表示投降。这就是说：让农民自流的发展吧，经济下降的让他们下降去吧，总之让我们的农村去走资本主义的老道路吧。

由于这种自发思想的支配，就发生了对党内某些剥削思想发展的放任（如龙江克山系十一区即有百分之四点三的党员雇工，其他省也有类似现象），对农村经济领导的自流。

这是一种“自发”论。因为几千年来农民都是走的个体经济的道路，他们所看惯的是高利贷者、投机商人以及后来的富农，这些人是当时社会最吃得开的。而对于经过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农民没有走过，所以也就不懂。我们的领导者，共产党人，就要教会他们走新的道路，而不要重复历史道路。这里的关键在于把互助合作的工作做好，使农民参加合作社真正可以得到利益，做到了这一点就能把几千万农民吸引到合作社来，而使它们抛弃资本主义的道路。

当前在一部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自流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

一、农村高利贷的迅速发展和商业投机的增长。据龙江、松江等地调查，发生借贷关系的户口，已占农村全部户口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借人户约占其中的三分之二。这些借贷绝大多数是高利贷，有的农民甚至把土地、马匹卖掉放高利贷，这些是对生产起破坏作用的。有一部分高利贷者转入了商业投机活动。有一些共产党员也参与放高利贷和农村的商业投机活动。

二、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党员雇用工人的发展，个别雇用工人的党员甚至于发表谬论说：“雇工就是互助。”因此对于农村雇佣劳动的过低的工资及很差的劳动条件没有很好注意。根据典型调查：雇工在龙江省海化、讷河等六村统计点总户数的百分之三点六，吉林省扶余县占百分之二点七。雇用工人的户数，龙江省肇源县的统计约占户数的百分之一点三（有的占百分之一点七），吉林省蛟河县井尚村的统计，竟占百分之六点三。

三、在合作互助组内人、马不等价换工，使无马户吃亏（主要是人马工交换，不按季节作合理分配）。互助组的领导没有充分的注意到如何协助贫困的无马户，使无马户在互助组中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此外，还有些党员不愿参加互助组，自己单干。

四、对劳动模范只重物质奖励（有的过多），缺乏经常的政治教育及必要的批评，使一些劳动模范脱离群众，失去示范作用。

五、在农村中不敢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们不懂得“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接受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纸命令可以达到的，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教育说服的工作。

六、对互助组领导的自流，致使有些互助组变质，发生雇人和放高利贷等剥削行为。

七、村干部经济上升后，滋长着单干情绪，对资本主义思想熟视无睹。部分区村干部的贪污腐化（村合作社不少人均贪污）倾向的增长。

具体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情况规定若干具体政策，我这里只讲思想上的一基本问题。

对于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必须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一方面继续帮助农民个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必须经过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坚决引导农民逐步走向集体化，反对各种自流论。这也就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在农村工作问题上的具体化。那种让农民自流发展，让农村经过深刻的阶级分化之后，再来一次大的革命，或者等到将来有了机器在一个早晨下个命令实行集体化的观点，是一种有害的思想。

如果不是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社的道路，而去积极发展富农经济，则农村政权必然蜕化成为富农政权。如果共产党员都去雇工，放高利贷，则农村的党必然蜕化成为富村党。这就将是人民政权和党的组织在农村资产阶级进攻前面的完全失败，而这当然是我们不能容许的。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之下，农民经济可能而且应当向着什么道路发展呢？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三年就说过：“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组织起来”）“共同纲领”第三十四条也规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

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共同纲领的规定，是完全符合于列宁和斯大林所提出的关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经济发展的原则的。

斯大林同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在我们国家里，农民经济可能而且应当按什么道路发展呢？农民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农民经济按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小商品经济。而小商品农

民经济又是什么呢？它是站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即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方面去，如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情形那样，也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方面去，如在我们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所要发生的情形一样。”（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一九四八年莫斯科中文版二一九页）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斯大林同志说：“列宁在他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正确指示说：我们俄国的农业应当按新道路去发展，即经过合作社吸收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将集本制原则逐渐灌输于农业，起初灌输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灌输于农产品生产方面的道路去发展。”（同上书七四页）

我们现在的情形，是无论在农产品销售方面和农产品生产方面，合作运动都有了发展。关于农村的供销合作中的问题，我这里暂时不谈，只谈农产品生产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的基本形式在目前还只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集体劳动，但是它的发展趋势，已经表明它是引导农民在生产上由个体经济逐步地过渡到集体经济的主要形式。因此，在东北地区，我们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在一九四八年的决议上，一九四九年冬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一九五〇年三月党代表会议上，都曾反复地强调提出过发展这种合作的问题。

但是一个到现在还有一些同志采取消极态度对待合作互助运动，甚至违反党的方针而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出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已经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中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错误的思想。

保证农村逐步走向集体化道路的根本力量是党的领导。我们党不仅要有计划地领导工业发展，而且要有步骤地领导农业实行社会化。而要实行社会化，其首要的任务就是逐步改变目前的小农经济为农业合作社的经济。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经济，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关于社会主义和集体化的教育，用农民自己办好农业合作社的切身经验，并且用各级政府大量办好国营农场的经验教育农民外，还必须要有计划地在五、六年之内，农民普遍使用新式马拉农具和部分的拖拉机，改变过去的耕作方法。由于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实现这个任务的条件已经开始具备。如果我们不认真进行这个工作，就会发生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就会发生跛足的现象。

因之，农村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在整党过程中，必须明确地认识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反对党内对组织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采取自流态度的右倾思想。农村的党员和党的工作

干部，必须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带头作用，兢兢业业地办好生产合作和供销合作，发展合作社的经济。为此，必须做到下列几点：

一、共产党员要积极参加和努力搞好当地的各种合作组织，并逐步加以提高，以便在条件具备时，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共产党员有责任说服单干的农民参加合作互助，共产党员的个体农民，原则上不能雇人。

二、共产党员有余钱余粮时，要投资在互助组、供销合作社和信贷部中，扩大生产和供销。共产党员不允许放高利贷，不允许做商业投机倒把的反动行为。

三、共产党员在实行劳动互助时，必须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并照顾生活困难经济上升慢的农民。共产党员不应该和旁的农民作人马不等价的交换，必须反对排斥和不照顾经济上困难的农民。

但是，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上，还有另一种错误的倾向，如违反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进行组织，歧视单干的农民，或者以急躁的态度，不愿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需的条件，不愿农民的政治觉悟程度，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认为现在在农村中就可以一蹴而达到大规模集体化。这些是“左”倾的错误思想，也是应该反对的。

总之，无论在城市工作中或农村工作中，我们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在我们党内必须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党农思想，必须反对在党内思想斗争中的非原则态度，反对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在社会上，我们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并不使一切国家领导机关和思想工作机关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至于在社会政策上，我们党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政策还是“节制资本”的政策。这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要尽可能地运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既不是消灭私人资本，也不是任其自由泛滥，而是实行“节制”的政策。目前在执行这个政策中的主要偏向，不是节制过多，而是对应该节制的缺乏必要的节制，以至造成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条件。毫无疑问，只有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击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严格整顿党的队伍，战胜党内的右倾危险，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开火，向资产阶级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犯罪行为开火，向农村某些党员的蜕化现象开火，我们才能争取一九五二年抗美援朝、增产节约的伟大任务的胜利完成。让我们一致动员起来，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向着新有胜利前进啊！

开展爱国生产竞赛，为完成国家

**工业生产计划与增产节约八百
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
**（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在东北一级机关、
各省市及厂矿的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今天的会，是一个全面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动员大会。不几天前，我们都热烈庆祝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家都很清楚，如果离开了劳动人民，如果我们不劳动，人类便不能够生存和发展，社会便不能够进步。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人民，正在为争取和平劳动、反对战争威胁，为争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反对法西斯政治奴役，为争取劳动人民做自己国家的主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而斗争。在我们国家里，劳动人民已经是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是为自己和为自己的伟大祖国而劳动，因此应当劳动得更好。去年我们东北的国营公营工业中的职工们开展了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为国家增产节约了价值一千六百万吨粮食的巨大财富。为了使今年能够开展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为国家增产节约更多的财富，我想说明以下四个问题：

一、我们今年在工业方面的任务

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东北区今年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就是基本上完成恢复工作，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与经济力量，并开始有重点的、有步骤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按照国家的计划，国营、公营工业的总产值，今年将比去年的实际产值提高百分之四十一一点五，其中工业部所属工业提高百分之三十三，其他各部局所属工业提高百分之四十三，地方公营工业提高百分之五十九。同志们！将总产值提高百分之四十一一点五，这是表示国营公营工业的巨大增长，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去年国营公营工业的总产值，比前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一，就是说，今年我们差不多以加倍于去年发展的速度在发展我们的工业。在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美国全部工业的生产量，从一八九零年开始到一九一零年，每五年平均每年的增长百分比是：八点二、五点二、二点六、三点六；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点二，每年平均增长不足百分之四点四；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到一九三七年，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零点三），这充分显示着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公营工业的优越性。因此，虽然就全国范围说，我们的工业比重还是很小的，我们还比那些工业先进国家在经济上落后很多年，但我们一定能够以最高的速度在较短的时期内赶上它们，这是毫无疑问的。

完成今年国家的工农业增产计划(农业总产值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二十点六,即今年计划产粮食两千万吨,棉花十万吨),有着多么重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意义,从下面几个数字上就可以看出:(一)东北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将超过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其中工业(包括私人工业)超过百分之十。一九四三年是伪满工业产量的最高水平,我们虽然在某些设备上和某些重要产品上还未完全恢复那时的水平,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某些新设备的添制,今年将要超过那时的总产值。(二)全区工农业总产值中的工业产值比重,将由去年的五十二点六提高到五十五点九,工业的比重进一步增长了。

(三)国营公营工业产值中,生产手段所占比重,将由去年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三提高到六十七点五,我们在工业中着重发展的是重工业。

(四)国营公营工业在全区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将由去年的百分之七十八点三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一.五(当然私人工业的绝对量也有相当的增长),工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的比重是更加强大了,更加成为占压倒优势的決定力量了。

不仅如此,今年国家在工业的基本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工业的基本建设工程总量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在工业的基本建设中,重工业的比重占百分之八十二强,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反对那种从局部观点出发的所谓“平衡发展”的理论。全部工业基本建设中,恢复部分占百分之二十九点六,改建部分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四,新建部分占百分之三十。这些,说明我们已开始有重点的有步骤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工业的基本建设是决定工业发展前途和发展速度的,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今年基本建设工程总量的迅速增长,显示着东北工业发展的新情况,我们必须把领导和管理基本建设的工作提到显著的重要地位上来。

随着工业的巨大发展,贸易、合作、运输、财政、税收都要大大的发展,这些方面也都有了计划。我们工人阶级的队伍,今年也要大大扩大,预计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七。企业职工的工资,今年提高百分之十,另外又发了工资百分之二十的房租水电费。可以预期,随着今年工业生产的发展,明年的职工生活还将进一步改善。

那么,今年东北区国营公营工业全体职工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呢?

(一)保证完成国家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比去年要增产百分之四十一.五,降低成本百分之六点七,这是一个比去年经过增产节约运动所达到的水平更加先进的计划,所以完成国家计划就是最大的增产节约。(二)超过国家的计划,开展一个广泛深入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国家的计划之外,为国家增产节约价值八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节约流动资金不计算在内),其中要求工业部完成五百万吨,其他各部局及省市工业完成三百万吨。增产节约的内容是增加产量,提高质量,

降低成本。我们的总目标，就是完成国家计划，并为增产节约价值八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

同志们！这是一个十分光荣的任务。关于今年国家计划的重大意义前面已经说到，现在我再说明一下八百万吨粮食具有多大的价值，使我们大家了解今年增产节约运动的意义。八百万吨粮食，将近东北全体农民去年粮食总产量的一半。若用以投资建设我们的工业，则可以建成发电能力十万千瓦的火力发电厂七个；或者建成年产母机两千六百五十台的新型机器厂十三个；或者建成年产五十万千瓦的透平发电机制造厂三个；或者建成年产三万辆拖拉机的工厂四个；或者建成具有五万纱锭和两千台布机的纺织厂十五个。若用以改善职工生活福利，则可以建成五百万平方米的住宅；或者修二百三十所每个有五百床位的医院；或者换一千四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匹灰斜纹布。如果用于充实国防力量，则可以购买战斗机三千三百架；或者购买大炮五千六百门。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工人阶级的伟大领导作用，中国工人阶级不仅能够领导与团结全体农民并依靠巩固的工农联盟进而团结其他民主阶级，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人民共和国，而且在将来也一定能够领导与团结全体农民及其他一切愿意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应当大张旗鼓地宣传今年的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的重大意义，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真正形成一个深入人心的群众运动。

铁路、贸易、合作等部门，也应当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增产节约计划，像工业部门一样的行动起来。我们要在全东北范围内普遍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以全东北劳动人民的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以巩固“三反”“五反”运动的成果，增强抗美援朝的力量，加速我们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并进一步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

二、实现这一光荣任务的条件

完成国家的计划，并超计划地增产节约价值八百万吨粮食的财富，我们有没有条件去实现呢？是完全有条件的，这是因为：

第一、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全体工人、技术人员、职员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劳动热情与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运动以前，有不少的工人划不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有些新从其他阶级参加到工人队伍来的，还保留着一些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经过运动的教育，划清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检讨与批判了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明确了工人阶级的地位与前途，坚定了走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念，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队伍中的影响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工人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劳动积极性大为增长。“三反”“五反”运动，同时也推动了技术人员和

职员的思想改造，不法资产阶级的种种严重违法行为，不能不在他们的思想上引起震动，这就更便于克服某些技术人员和职员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对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的严肃态度，使一些对共产党抱有误解的人也发生了转变，衷心地称赞共产党大公无私，称赞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的伟大，并相信我们能够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至于工厂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领导干部，在运动中都普遍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思想，改善了作风。这一切，就给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准备下极为有利的政治条件。

第二、“三反”运动从组织上巩固与加强了厂矿企业的领导。经过“三反”运动，清查出一批贪污盗窃分子，纯洁与巩固了企业的组织，增产节约的成果得以巩固。运动中新提拔的积极分子，都是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和思想纯洁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工作积极负责，虚心倾听群众意见，生气勃勃，即使业务一时不熟悉或不很熟悉，但只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也一定能够逐步提高并把工作做好，事实上，这些新人物接替了贪污分子的工作后，到处都表现了一种空前未有的新气象。工业方面的各级领导干部，领导作风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他们依靠工人阶级办好工业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了，或者说：“再也不敢官僚化了！”“三反”中暴露出来的企业内部各种管理制度上的漏洞，也正在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堵塞，以求得企业管理制度的日益完善。这样，就在企业的组织领导下，准备了有利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条件。

第三、全国物价的降低，以及职工工资的增加，劳动保险条例又做了补充规定，进一步改善了职工物质生活，提高了全体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现在全体职工已经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伟大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内，工人阶级的个人利益是如何同国家的利益联结在一起，他们已经进一步体会到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不仅巩固与壮大了我们的国家，而且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他们热爱祖国的思想是进，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劳动热忱更加提高，并精神百倍地迎接着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对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地估计到。

第四、去年增产节约运动中积累的经验，特别是运动以来出现的大量先进生产经验与先进工作方法，乃是我们今年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条件。应当承认，去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群众，都或多或少地积累了一些经验，学会了如何去制订增产节约计划，如何将计划变为群众的行动，如何引导群众挖潜力找窍门，并运用郭瓦廖夫的先进工作方法去综合群众的先进生产经验，推广群众的先进生产经验，开展群众性的劳动竞赛等等。这些经验都是很成功的，今年应当继续加以发扬。

第五、我们的企业内部仍然存在着极大的潜在力量，如设备运用率仍可提高（这种情况在地方工业更为显著），废品率仍可降低，产品的质量仍可改善，原材料的使用仍可节省，劳动力的浪费仍可大大减少，劳动组织仍可大大改善等。

最后，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苏联专家的帮助。依靠苏联专家的帮助，今年将要同去年一样，会使我们的工业生产取得巨大的成绩。

三、迅速地大规模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条件是充分具备了，那末，我们应当如何发挥这些有利的条件，抓紧时间，迅速地大规模地将增产节约运动开展起来呢？

第一、必须立即将我们工业战线上的工作重点转到组织生产及基本建设上来，“三反”的追赃结案工作应指定专人负责，并结合在完成总的增产节约任务的运动中进行。应使一切直接领导生产的企业干部与全体职工了解：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就将影响整个国家工业发展的速度，影响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影响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的进一步改善；如果我们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完成了增产节约价值八百万吨粮食的任务，又将如何改变着我们国家的面貌，使大家认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刻不容缓的意义，打破各种思想障碍，解决“三反”的追赃结案工作与组织增产节约运动的矛盾，迅速将运动发动起来。为此：（一）对贪污分子的追赃结案工作，应抽出部分干部专门进行。各省市应即将各方面主要干部调回到组织生产领导生产的岗位上来，厂矿企业的主要领导干部，除定期参加追赃定案的某些必要的会议和定期检查这一工作外，应集中全力领导生产，组织生产竞赛运动。对于一些大贪污案的主谋者，某些案情很重一时不易定案的大贪污分子，必要时还可采取集中整训的办法，以解除企业领导上的负担。（二）对厂矿企业内工人群众中所存在的某些占小便宜的行为，鉴于东北的工人群众经过了献纳器材运动，生产新纪录运动，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竞赛运动，质量检查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去年的增产节约运动以及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阶级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历史上遗留的偷盗与占小便宜现象已大为减少，因此不宜再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动普遍的坦白与检讨，进行普遍的交代，而应采取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加强爱护国家财产与反对浪费反对损害公物的教育，加强新劳动态度与反对纪律松懈的教育中求得解决。（三）工会与青年团基层组织中的“三反”补课工作，主要是整顿作风方面的工作。为了集中力量领导增产节约运动，不要专门普遍发动一个运动去解决，可以结合着增产节约运动，结合着传达工会二届代表大会决议，进行思想上的整顿和组织上的定期改选以及在正常的民主生活中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求得解决。（四）“三反”建设阶段的工作，应结合增产节约运动的思想教育进行，把批判资产阶

级思想，划清阶级界限的工作，做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直接的思想准备和政治上的推动力。（五）“三反”中清查贪污分子较多的部门，如经理部门、材料部门，必须迅速地提拔新的积极分子补足其缺额，以迎接增产节约运动的新任务。

第二、必须组织全体职工讨论今年的生产、财务、技术计划与讨论如何保证完成基本建设任务，提高工程质量、降低成本的计划，并制订出每个单位与个人的增产节约计划。为此：（一）应根据今年前四个月完成计划的情况，提出本企业单位和各车间今年在产量、质量以及成本上超过国家计划的具体奋斗目标，以及基本建设单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具体计划，指出每个厂矿车间与工程单位新的潜力所在；然后，发动与组织全体职工想办法找窍门，制定单位与个人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方面的措施计划（即本单位与个人的年季月的增产节约计划）。在讨论计划时，应当使职工特别注意到国家制定的产品的质量计划，研究出保证完成与超过国家制定的产品质量计划的具体办法，以求不断地改善我们产品的质量，在提高质量的前提下保证增产节约计划的实现。（二）根据增产计划，作好原材料、工具及其他消耗物料的供应计划与节约原材料的计划。企业的上级领导机关须协助厂矿及时解决困难，保证按增产计划进行供应。产品推销计划，亦须根据增产计划具体拟定，并注意加强经理部门的工作。（三）充分地研究企业内职工的各种劳动条件与福利事业的情况，特别是场房通风安全设备的情况，及其他可能解决的集体福利事业，并作出具体计划，认真加以解决，以改善工作条件，保护职工身体健康。此外，对于职工的奖励，亦须拟定计划。根据上述内容，企业行政与工会应签订合同，贯彻执行。

第三、必须大力推广先进生产经验，这是完成今年增产节约计划的主要方法。各省市各产业的领导机关，应将推广先进生产经验的工作，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做出比去年更大的成绩。在推广先进生产经验的工作中，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一）必须抓紧几个有决定意义的先进生产经验，大力加以推广。如机械工业中的高速快速切削与多刀多刃切削法，按生产指示图表有节奏地进行工作的方法，和杨守训翻砂造型法；煤矿工业中的崔国山掘进队的经验，马文治探钻经验，西安竖井平行作业法，施玉海安全生产经验；钢铁工业中的平炉快速炼钢法；电器工业中的劳动分工专业化；基本建设中的苏长有砌砖法及傅鸿宾的铺灰工具，杨德仲抹灰法，谢万福木工流水作业；纺织工业中的郝建秀工作法和一九五一织布法；电业中的调整负荷办法和快速检修以及燃烧劣煤经验；造纸工业中的快速蒸煮法；食品工业中的李川江车间和张文富小组的制油经验；被服业中的姜万寿经验等等，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先进生产经验，应当大张旗鼓地有计划有组

织地大力宣传与推广，并订出具体的推广步骤和目标，定期检查和总结。（二）要注意发现与推广各个部门、各种工种、各个方面新的先进生产经验与先进工作方法，重视工人群众的每一个合理化建议，工人创造的点滴经验、大小窍门，都应及时地给以鼓励与推广，以发扬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创造性，开展群众性的挖潜力找窍门运动。同时，应发动技术人员与老工人学习郭瓦廖夫工作方法，综合群众的多种多样的经验，去粗取精，给以提高，以便普遍推广。（三）要使推广先进生产经验的工作，成为有领导的经常性的工作，定期评议和奖励，召开专业会议，进行技术表演，举办短期训练班，组织参观和互教互学等等。（四）奖励是很重要的，每出现一个先进生产经验和先进工作方法，经过实用有效者，均应根据价值的不同，分别由厂矿、管理局、部和省市政府及时地给以奖励、重要者由东北人民政府给以奖励。

第四、必须注意改善劳动条件与集体福利事业，特别对于场房通风安全设备，必须作出具体计划，认真加以解决。今年的企业奖励基金，按照中央财委的规定，除了一部分用作技术措施费和奖励费（各占百分之二十五），主要的是用在集体福利事业（占百分之四十五），对于职工当中患慢性职业病因而生活特殊困难者亦应适当补助和救济（占百分之五）。工业部门与工会组织须根据企业奖励基金的使用原则，切实检查，严禁乱用。我们必须贯彻毛主席关于“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的生活”的指示，既要反对离开生产去空谈改善工人生活的作风，又要防止与反对只注意生产不注意工人福利的偏向。像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劳动保护部所反映的纺织管理局沈阳麻袋厂职工宿舍的严重现象必须纠正。今年除按照计划完成职工宿舍建筑外，沈阳市再修三千间简易平房，以解决职工住房困难。各个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应当经常到下面检查工厂的生产情况，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到车间去，到工人宿舍去，彻底转变“三反”中暴露出来的某些官僚主义作风。

第五、加强职工的政治、文化、技术教育，提高全体职工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将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经常化，在政治学习中普遍进行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去年已有的成功经验，应当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进行。

第六、党、行政、工会、青年团要步调一致，协力同心，共同把企业办好。这方面的问题，过去已讲的很多，同志们务须切实执行，这是每一个厂矿每一个车间能否完成自己任务的最重要的条件，需要再次提醒同志们注意。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应当起模范带头作用，党的组织与青年团的组织要善于很好地发挥党员与团员的作用。

四、政治工作方面的任务

最后，我还想讲一下政治工作方面的任务。

我不准备讲厂矿企业中政治工作的一般任务，如政治工作如何结合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如何以生动活泼的宣传鼓动活动组织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增产节约运动，等等，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我只讲一个问题，即关于在国营公营工业中同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作斗争的问题。

国营公营工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没有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企业的领导者之间，领导者与职工之间，职员与工人之间，他们的立场和任务完全是一致的，不应当有对立的现象发生，这是完全正确的。但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国营公营企业中已经没有思想的矛盾，不必要开展思想斗争了，不必要警惕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坐探”活动了。无数的事实证明，特别“三反”“五反”运动暴露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国营公营厂矿企业中，资产阶级的经济侵蚀、组织渗透、思想影响是相当普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在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中，在工人阶级的队伍内，当然不能容许同这些污毒和平共居。我们的国营公营厂矿企业中所以存在着这些污毒，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社会上资产阶级的影响，一个是企业内部职工们旧思想的残余。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制度，资产阶级是一个合法存在的阶级，他们必然会时时刻刻地有意无意地散布他们的思想影响，其中的不法分子并且派遣或收买个别人员直接对国营公营企业进行盗窃或坐探活动。国营公营厂矿企业不是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不可避免的要或多或少地受到外部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决不可认为经过“三反”“五反”运动，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再不会向国营公营厂矿企业侵袭，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必须时刻提高我们的阶级警惕性，谨防这种影响和侵袭。

我们企业内部职工中旧思想的残余，在外部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常常是比较顽固地保存起来；同时工人阶级队伍不断扩大，各种非工人出身的以至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不断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都带来了非工人阶级思想，直接影响着企业工作的改善。例如我们的技术人员，他们虽然对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有着很大的贡献，担负着光荣的任务，在政治上一天天进步，但严格说来，他们当中有不少的人，仍然不能无愧于工人阶级这个光荣的称号，其中一部分人，由于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者在过去受了较深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至今仍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倾向，影响着我国国家的工业建设和他们自己的进步。因此，必须结合着增产节约运动，大力开展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又如我们的企业领导干部（包括党、政、工、团各方面的干部）他们虽然也学会了一些对人民企业的管理知识，学到了一些苏联管理

工厂的先进经验，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也日益明确，因而完成与超过了国家所给予的巨大任务，但“三反”运动中暴露的事实证明，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官僚主义的作风是相当严重的，不依靠群众，不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不重视推广先进生产经验，不重视工人的合理化建议，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生活，不深入车间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不深入工人宿舍了解工人的疾苦；其中有些人（主要是旧的管理人员），甚至仍用旧的观点、作风与资产阶级管理工厂的方法管理工厂，不重视党的政治工作，不依靠党、工会、青年团的组织，轻视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这些显然都是错误的。必须经常同企业中的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作斗争，才能贯彻人民企业的管理方针，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企业的优越性。再如我们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们的无限劳动热情与创造活动，他们热爱祖国与热爱企业的精神，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与自我批评的精神，都是十分值得赞扬的；但他们当中也有些人，曾经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蒙蔽，带来了旧社会的不良影响，保留着旧的劳动态度，不爱护国家的公共财产，不能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划不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这些，也必须从加强政治教育中来解决，以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的力量。

企业中的政治工作，应当把同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作斗争的任务，当做一个带根本性质的经常任务。为了担负起这样的任务，党在企业中的领导骨干，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并经常总结企业中政治工作的经验，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我们工人阶级的队伍，这是完成今年增产节约计划的重要保证。

「榆林記憶」

钰钏文化公益項目
www.0912jy.com

